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

[杜章智·沈起予]主編



# 列寧



盧卡奇 / 著◎張翼星 / 譯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本好書。盧卡奇在這本書裡的用心，我們從他考察列寧思想的出發點、背景以及談論黨和組織的問題，可以看出一、二。對於想瞭解盧卡奇如何理解列寧的思想，又如何從列寧的思想中得到啓發的讀者，當不致於錯失掉從本書中得到「發人深省」的這一機會。

ISBN 957-32-1420-2 (549)



00120



L7004

NT\$120

# 列 寧

盧卡奇 / 著◎張翼星 / 譯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④

**列 寧——關於列寧思想統一性的研究**

---

作 者 盧卡奇  
譯 者 張翼星  
主 編 杜章智、沈起予  
責任編輯 簡旭裕

---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 0189456-1 電話 (02)365-3707  
傳真號碼 365-7979  
發行代理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365-4747

---

排 版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10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2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1420-2

## 主編總序

嚴謹的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事業。隨著解嚴和開放的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學校課堂傳授這門學科的老師是日漸增多，把研究和學習的對象擺在這個方向上來的研究生，現在亦不在少數。而坊間出售的這類書籍目前更是普遍獲得讀者的喜愛，供不應求。這些發展亦說明我們的社會裡，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著思想、關心著社會。但是在這樣朝氣蓬勃的發展背後，目前卻仍然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難題。這些問題和難題是許許多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有同感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首先問題最大的是：對於無法親炙這門學科或領域精彩內容的學生或讀者來說，這門學科或領域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讀書特權。他們或苦於沒有門徑進入這門領域，或是苦於進入這門領域後卻不知如何下手讀書。因此常令許許多多有心的讀者或學生對這門學問僅能「止於興趣」。對於比較想花精神深入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問題似乎也多。他們希望從事研究，希望這門學問能夠多少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瞭解問題。可是經典的接觸、二手詮釋資料的蒐集、研究題材的選取等等，在在都是他們的困擾，使他們在這個領域無法海闊

4/15/05

天空的馳騁，挫折感很重。但是對教學的人員來說，感觸還更大。上課教學資料與教材欠缺，學生的參考資料付之闕如，常常使他們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許多人都感覺到教學困難，手脚被綁施展不出學問來，可是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問題多年來卻沒有人出來為他們設想，為他們解決這樣急迫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裡，對於人文科學或是社會思想比較熟稔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多半只是負責研究。頂多做一些批評、介紹就已經了不起了。對於如何在各門領域「傳、幫、帶」以提昇社會的知識水平，好像熱心的程度還不是那麼的足夠。有鑒於此，我們不揣淺陋，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為一些有需求的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服務。

我們的做法是在這門學科上做了一些大的規劃，計劃分批、分類地出版六大類的叢書，設法分門別類為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分憂解勞，讓大家對這門學科和領域的要求與滿足俱無遺憾。我們要分批出版的這六大類叢書，分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新馬克思主義叢刊》、《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我們費盡心血網羅了海內外對於這門學問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名家來為大家服務，希望好好地將這六大叢書的工作做好，為大家略盡一點心意。

這六大類叢書的設計構想，主要是想讓每一位入門的讀者、學生、研究生或教學人員都能夠直接成套地、全盤地利用我們這批叢書進行讀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不假他求。我們的構想目標，是希望做到從入門的學徒到專業人士我們都能照顧，甚至希望最後做到從學徒到專家的養成也都能仰賴我們的地步。

這六大類叢書在《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方面，我們首先打算出齊所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國內目前這方面的中譯書籍非常的欠缺，已經出版的成品也是做得零零散散，譯筆又不算緊嚴，在學術運用上不太能派上用場。我們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做改進，使這樣的經典能夠成套成批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因此原來市面上已有的譯本不行的，我們改譯：不錯的，我們參考補譯。在譯本方面，我們儘量以原有經典的出版文字為主；情況不允許的話，我們在校訂的時候儘也可能地參考原外文版來補正。所有的版本，除非必要，否則我們絕對不做增補刪節的工作。這樣能夠讓原著以新的中文版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也能夠讓讀者放心地閱讀和進行學術的徵引。經典內的譯名、術語、地名或書名，我們是從習慣用法統一。如果無習慣用法，我們從已經有的專著和研究裡頭的用法，不另創新譯名滋生讀者的困擾。我們的要求是做到各種譯名能夠從俗統一，不但這套叢書裡頭所有的各類經典的各種譯名能夠統一，就是我們以下的其他五大類叢書內的各套書籍的譯名也能夠配合一起統一起來。這套叢書是所有以後各類叢書的構想得以成立和各類叢書能夠讓讀者順利應用的基礎，自然所有的格式從學術的慣例，在體例方面我們就不另做說明。

其次，我們想把現有在期刊或其他場合發表但未被收錄編纂成書的經典作品，以相關主題或思想人物作為一輯，有系統地加以整理，編譯出版。這種編譯出版品，我們也是以原有經典原發表的文字為編譯參考版本著手翻譯。情況不允許時，我們參考別種譯本校正。所有的譯文註明出處來源，格式悉遵照學術慣例。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是我們配合著經典的譯著要出版的第二類叢書。這類的叢書涵蓋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關新馬克思

主義的各種思想家或學派的思想概述，另一種是與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重要思想範疇的專門研究。這類的叢書我們打算翻譯出版論述各家和各派思想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談論專門思想範疇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配合著各類的經典的出版。在這類的叢書裡，我們打算把國外現在比較重要而且談得比較具體的相關作品，依次分批有系統完整地翻譯出版。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有系統地把主題相關但不易找到的各種期刊論文的資料，整理編譯成套出版。這類叢書的翻譯，主要作用是想以中文的方式提供資料，讓讀者比較容易瞭解前述的各種經典的重要內容、著述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裡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界，佔著什麼樣的地位。當然我們知道僅僅是這些譯作的出版，還不足以讓讀者全面的理解現有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研究和出版的方向、概況與素質。不過有了這些作品的譯述，讀者在閱讀經典時，至少可以有個方向摸索。不用說，我們也不會認為只仰賴這些作品，讀者就足以掌握所有經典裡的思想了。我們以為這些作品只是我們所提供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經典領域的「工具」而已，其他的認識和突破要靠讀者自己的努力。自然我們同樣期望著將來也能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類的譯著，出版更多成批成套齊全的作品，來幫助讀者，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掌握這類的資源。

第三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是針對著入門和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讀者而設計的，但是我們也想讓這類叢書能夠成為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人員的一本小手冊。這套叢書編輯的方向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編纂適合瞭解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介紹性書籍，另一是編纂適合於理解各類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範疇的介紹性書籍。這類叢書的編輯在材料來源上，我們不限是編譯或者是創作，我們主要



扣緊的東西，是要讓這類叢書的讀者能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住每一個相關的思想人物或者思想範疇的內容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資料。因此我們把這套叢書的主要格式都做了統一的設計，不管叢書內的各類書籍屬於那一種領域，都是這樣的格式。這套叢書內的每一種書籍，基本上都分為這五部份：思想家生平傳略(或思想範疇簡介)、思想重點研究、相關的書評、有關讀書入門建議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等。我們在這套入門叢書裡，主要是想讓讀者對於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一個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範疇有個大致的理解，知道思想的重點在那裡？以前是怎麼討論的？有那些東西可以研究？有那些題目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怎麼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可以怎麼入門和可以怎麼研究？又有那些重要的原始經典需要看？有那些二手的詮釋可以參考？有了這套叢書，讀者大致可以掌握每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的重要經典、思想重點、研究主題和方向、參考的資料等。有了這樣的一套叢書，至少讀者對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不會陌生，對於要想進一步深入的領域該讀什麼書、有什麼書可看，也不會摸不到。當然按這套叢書提供的資訊，有心想研究的讀者一定很容易理解到，我們在前面的兩類叢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什麼重要的經典或二手詮釋，剩下什麼東西是自己應該去補足的。不過我們稍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一直都是處在落後的狀況，我們無法為讀者再進一步的提供服務，指出那些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有那些先生或學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或研究的指導，不然這套叢書一定會更加完滿。我們只希望來日環境改善，有這個機會為讀者增加這一項服務。

在第四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叢刊》裡，我們打算出版討論新馬克

思主義各家和各派思想的研究各五種到十種，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範疇的研究書籍各五種到十種。這套叢書和前述第二類叢書《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第二類叢書，我們主要是以翻譯出版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我們在這類叢書是主要以出版國人的研究為主。但是我們在這套叢書裡出版的各種研究成果，在內容方面基本的要求是不和第二類叢書重複。我們要求作品的水準是起碼能夠站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地創作，同時要求作品的內容應能夠適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要求與需要。導論和簡介的書籍因而不是我們這套叢書主要的出版對象。

我們出版這類的叢書，主要的理由有兩點。首先是，我們都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成果都能適合我們國人的需要與現實，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毫無缺點不可超越。所以縱使我們在第二類的叢書裡推出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精挑細選出了比較可觀的成果，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說，這些研究成果所研究的課題無需再深入探索，進一步提昇。這也就是說，我們實在需要在中文世界再出版相關的各項足以提昇這些研究成果的作品，以廣國內讀者的認識和見識。就針對著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在中文世界出版這樣一類的研究成果，以合乎事實的需要。另外出版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出版在原有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那麼就能夠在中文世界對有心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起示範作用，知道問題也可以「這樣的看」。因此我們在構想上也是希望有這樣的叢書作為借鏡，刺激研究者利用我們前述提供的各類叢書的條件，再深入的探討其他的問題，帶動研究的空氣。

其次，西方至今所有出版過的這類叢書，對所有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不能說都完全照顧到了。儘管我們也精挑細選，希望我們能夠在前述的第二類叢書裡頭儘可能把所有的重點書，都挑出來編譯出版。但是所有我們能夠挑到的書，也不見得全部都把我們認為應該處理到的問題完全涵蓋在內討論，可能西方的出版界根本都沒有出版討論這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在現實上我們就有必要請學者專家針對這些被遺漏掉的主題，再撰寫一些書籍出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出版類似第二類叢書的一些書籍的根本原因。

在最後兩類的叢書《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裡頭，我們打算把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拿來編譯出版。其實我們想出版這兩類叢書的最大因素，是因為過去國內在這個領域無論是研究或出版都嫌不足，這種不足讓我們一般的讀書和研究工作者無法站在這個基礎上來深入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出版這類其實算是基礎知識的各種參考書籍，那麼我們花在新馬克思主義上的所有心血也都是白費。在這兩類的叢書裡頭，我們打算把跟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屬於詮釋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的各種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都放在「馬克思學」(Marxology)的這個項下來出版。在《馬克思學新知譯叢》裡面，我們希望就西方現有的各項相關研究在各項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的這個範圍內，各挑五本到十本分批的編譯出版。而西方的各項研究沒能照顧到的，的確又屬於國人自己的創見或新的詮釋，我們放在《馬克思學研究叢刊》這套叢書裡來出版。出版的數量與範圍，和《馬克思學新知譯叢》一樣。

這六大類叢書的出版和編譯，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做得盡善盡美了，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毫無愧色」地向讀者坦然交待。我們的編譯和出版請讀者支持，我們的缺失和舛錯也請讀者給我們指正。我們更歡迎有心得亦有志於這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的讀者，投入他的心血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這門領域的研究和出版能夠綻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來。

杜章智

沈起予

一九八九年六月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新橋譯叢

康樂博士主編

編輯委員：石守謙、吳乃德

梁其姿、章英華、張彬村、

黃應貴、葉新雲、錢永祥

|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2001 | 中國的宗教            | Weber        | 簡惠美     | 390 |
| L2002 | 韋伯選集 I：學術與政治     | Weber        | 錢永祥     | 280 |
| L2003 | 韋伯選集 II：宗教與世界    | Weber        | 康樂·簡惠美  | 170 |
| L2004 | 韋伯選集 III：支配的類型   | Weber        | 康樂      | 250 |
| L2005 |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      | Giddens      | 簡惠美     | 380 |
| L2006 | 鉅變               | Polanyi      | 黃樹民等    | 400 |
| L2007 | 史家的技藝            | Block        | 周婉窈     | 180 |
| L2008 | 文化變遷的理論          | Steward      | 張恭啓     | 280 |
| L2009 | 現代經濟理論危機         | Bell&Kristol | 張瑞猛     | 325 |
| L2010 | 集體行動的邏輯          | Olson        | 董安琪     | 190 |
| L2011 | 歐洲經濟史：中古篇        | Cipolla      | 夏伯嘉     | 340 |
| L2012 | 歐洲經濟史：工業革命       | Cipolla      | 張彬村     | 390 |
| L2013 | 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 I  | Cipolla      | 張彬村·林灑華 | 340 |
| L2014 | 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 II | Cipolla      | 張彬村·林灑華 | 390 |
| L2015 | 科學革命的結構          | Kuhn         | 王道選等    | 390 |
| L2016 | 青年路德             | Erikson      | 康綠島     | 295 |
| L2017 | 禮物               | Mauss        | 汪珍宜·何翠萍 | 190 |
| L2018 | 年鑑史學論文集          | Bloch等       | 梁其姿     | 250 |
| L2019 | 藝術與鑑賞            | Friedlander  | 梁春生     | 220 |
| L2020 | 權力與特權 I          | Lenski       | 王慶力     | 250 |
| L2021 | 權力與特權 II         | Lenski       | 王慶力     | 310 |
| L2022 | 經濟與歷史            | Weber        | 康樂      | 265 |
| L2023 | 南海紅人 I           | Malinowski   | 于嘉雲     | 300 |
| L2024 | 南海紅人 II          | Malinowski   | 于嘉雲     | 290 |
| L2025 | 社會的演化            | Parsons      | 章英華     | 295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西方文化叢書

高宣揚主編

編輯顧問：梁漱溟、洪謙

勞思光、劉述先、韋政通、  
葉啟政

|       |                |      |      |
|-------|----------------|------|------|
| L1001 | 解釋學簡論          | 高宣揚著 | 150元 |
| L1002 | 涂爾幹社會學引論       | 朱元發著 | 120元 |
| L1003 | 皮亞傑及其思想        | 杜聲鋒著 | 120元 |
| L1004 | 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    | 杜聲鋒著 | 130元 |
| L1005 | 戰後法國社會學的發展     | 胡偉著  | 130元 |
| L1006 | 法國當代史學主流       | 姚蒙著  | 140元 |
| L1007 | 當代法國經濟理論       | 林義相著 | 130元 |
| L1008 | 維特根斯坦          | 趙敦華著 | 140元 |
| L1009 | 作為哲學人類學的佛洛伊德理論 | 汪暉著  | 100元 |
| L1010 | 勞斯的《正義論》解說     | 趙敦華著 | 130元 |
| L1011 | 哲學人類學          | 高宣揚著 | 150元 |
| L1012 | 韋伯思想概論         | 朱元發著 | 130元 |
| L1013 | 西方大眾傳播學        | 劉昶著  | 130元 |
| L1014 | 阿爾貝·卡繆         | 張容著  | 140元 |
| L1015 | 佛洛姆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   | 王元明著 | 160元 |
| L1016 | 阿爾杜塞           | 曾枝盛著 | 130元 |
| L1017 | 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      | 洪謙著  | 160元 |
| L1018 | 雨果             | 鄭克魯著 | 130元 |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6001 | 結構主義             | 高宣揚     |         | 160 |
| L6002 | 阿多諾:藝術、意識形態與美學理論 | Jimenez | 樂棟·關寶艷  | 140 |
| L6003 | 美學               | Huisman | 樂棟·關寶艷  | 140 |
| L6004 | 馮友蘭與新理學          | 田文軍     |         | 170 |
| L6005 | 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       | 郭齊勇     |         | 160 |
| L6006 | 李克爾的解釋學          | 高宣揚     |         | 150 |
| L6007 | 新馬克思主義導引         | 高宣揚     |         | 180 |
| L6008 | 德國哲學的發展          | 高宣揚     |         | 180 |
| L6009 | 道德思維             | Hare    | 黃慧英·方子華 | 180 |
| L6010 | 歐洲共同體法概論         | 章鴻康     |         | 150 |

# 西方經典叢書

|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3001 | 西方的沒落     | Spengler     | 陳曉林 | 400 |
| L3002 | 歷史研究(上)   | Toynbee      | 陳曉林 | 400 |
| L3003 | 歷史研究(下)   | Toynbee      | 陳曉林 | 400 |
| L3004 |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 Nietzsche    | 林建國 | 220 |
| L3005 |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Schopenhauer | 林建國 | 350 |
| L3006 | 羣衆的反抗     | Ortega       | 蔡英文 | 140 |
| L3007 | 藝術論       | Tolstoy      | 耿濟之 | 140 |
| L3008 | 婚姻革命      | Russell      | 靳建國 | 140 |
| L3009 | 權力論       | Russell      | 靳建國 | 160 |
| L3010 | 我的信仰      | Russell      | 靳建國 | 160 |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歐洲百科文庫

吳錫德主編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4001 歐洲文明         | Delmas               | 吳錫德 | 95 |
| L4002 政治生活         | Braud                | 張台麟 | 95 |
| L4003 女權主義         | Michel               | 張南星 | 95 |
| L4004 脫軌           | Jaccard              | 許連高 | 95 |
| L4005 革命社會學        | Decouflé             | 賴金男 | 95 |
| L4006 迷信           | Askevis-Leherpeux    | 曾義治 | 95 |
| L4007 自由業          | Vagogne著             | 胡壘根 | 95 |
| L4008 勞工衝突社會觀      | Reynaud              | 尹沅  | 95 |
| L4009 生態主張         | Simonnet             | 方勝雄 | 95 |
| L4010 意識型態         | Servier              | 吳永昌 | 95 |
| L4011 歐洲青少年文學暨兒童文學 | Escarpit             | 黃雪霞 | 95 |
| L4012 羣體心態         | Mucchielli           | 張龍雄 | 95 |
| L4013 多國籍企業        | Ghertman             | 林銘勳 | 95 |
| L4014 社會主義         | Bourgin&Rimbert      | 陳三井 | 95 |
| L4015 電影美學         | Betton               | 劉俐  | 95 |
| L4016 壓力團體         | Basso                | 陳浩  | 95 |
| L4017 種族歧視         | Francois de Fontette | 王若璧 | 95 |
| L4018 文學社會學        | Escarpit             | 葉淑燕 | 95 |
| L4019 文化理念         | Hell                 | 翁德明 | 95 |
| L4020 居住條件與住宅      | Havel                | 黃發典 | 95 |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比較文化叢書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5001 生存及生存者       | Levinas   | 顧建光等 | 100 |
| L5002 薩摩亞人的成年      | Mead      | 周曉虹等 | 130 |
| L5003 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 | Mead      | 宋踐等  | 170 |
| L5004 文明經受著考驗      | Toynbee   | 沈輝等  | 180 |
| L5005 文化與自我        | Massella等 | 任鷹等  | 170 |
| L5006 文化科學         | White     | 曹錦清等 | 200 |

## 人與社會名著譯叢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5101 論人的天性      | Wilson       | 林和生等 | 140 |
| L5102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Jung         | 蘇克   | 170 |
| L5103 人類動物園      | Morris       | 周邦憲  | 140 |
| L5104 存在的勇氣      | Tillich      | 成顯聰等 | 130 |
| L5105 超越自由與尊嚴    | Skinner      | 王映橋  | 140 |
| L5106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Karen Horney | 馮川   | 160 |
| L5107 禪宗與精神分析    | Fromm等       | 王雷泉  | 150 |

---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

杜章智、沈起予主編

|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7001 | 盧卡奇自傳   | Lukács    | 杜章智     | 275 |
| L7002 | 列寧和哲學   | Althusser | 杜章智     | 215 |
| L7003 | 自我批評論文集 | Althusser | 杜章智·沈起予 | 200 |

#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

沈起予主編

|       |                 | 作者         | 譯者  | 售價  |
|-------|-----------------|------------|-----|-----|
| L7101 |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       | Callinicos | 杜章智 | 135 |
| L7102 | 政權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政權 | Therborn   | 陳璋津 | 125 |
| L7103 | 言說的理論           | Macdonell  | 陳璋津 | 145 |

---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自由主義名著譯叢

|       |          |        |      |      |
|-------|----------|--------|------|------|
| L7601 | 人的行爲 (上) | Mises著 | 夏道平譯 | 360元 |
| L7602 | 人的行爲 (下) | Mises著 | 夏道平譯 | 400元 |
| L7603 | 反資本主義的心境 | Mises著 | 夏道平譯 | 125元 |
| L7604 | 經濟學的最後基礎 | Mises著 | 夏道平譯 | 125元 |

## 比較社會主義叢書

周陽山主編

|       |             |           |      |
|-------|-------------|-----------|------|
| L8001 | 世界各國共黨:基本資料 | 韓國棟·張文美編譯 | 125元 |
| L8002 | 轉變中的共黨世界    | 周陽山著      | 135元 |
| L8003 | 波蘭          | 蔡源林編著     | 145元 |
| L8004 | 捷克斯洛伐克      | 張蔡舜編著     | 155元 |

---

# 辭書

**I 2001 大陸版辭源 1800元**

中國大陸傾盡舉國之力，動員學者千人，指定四個省份負責，歷時廿五年修訂這部規模宏大、內容詳實權威的國語辭典。全書收單字12890個，複詞84134個，共收辭條97024條。大陸版與台灣版最大的不同，在台灣版是朝一般辭書方向發展修訂，而大陸版的修訂目標，是使《辭源》成為閱讀中國古籍的專門辭書，也成為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參考書。

**I 2002 中國文化史大詞典 1500元**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集合數十位學者，以現代的眼光，為一般讀者編寫出這部100萬字，涵蓋古代文化各個層面的工具書。內分46個門類，包括民族、朝代、服飾、飲食、工喬、天文曆法、兵器戰具、體育武術等，包羅萬象，規模宏大。是一部權威、方便、新穎的好辭書。

**I 2003 台灣話大詞典 陳修編著**

陳修先生以「台灣文化誌」的觀點，寫成一部《台灣話大詞典》，廣收新舊名詞、兼採雅俗，上自漢唐詩詞，下迄童謠民歌、犁田歌、乞食調等，充分反映出台灣文化的豐富性，並為新生代台灣人留下一部完整的、可信賴的「台灣話資料大全」。(編印中)

---

---

## 遠流學術圖書特約書店

學術圖書銷量較小，一般書店不一定能夠供應。遠流特別在全省各地邀集下列特約書店，它們除了供應全部遠流學術圖書外，尚能為讀者作預訂、查詢、團購等服務。

金石堂書店 14 家全省分店 時報廣場 6 家全省分店

新學友書局 8 家全省分店 敦煌書局 4 家全省分店

聯經出版公司：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94 號

唐山門市部：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32 巷 9 號 B 1

三民書局：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61 號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北市和平東路 1 段 129-1 號

誠品 敦化南路 477 號 B 1 東成書苑：北市臨溪路 64-3 號

漢興書局：北市中華路 1 段 85 巷 16 號

政大書城：北市木柵指南路 2 段 64 號

文理學局：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56 號

驚聲書城(淡江大學校本部)：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151 號商管大樓

文興書坊：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4 巷 25 號

中原大學書城：中壢市普仁里 22 號

水木書苑：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

展書堂文化事業：新竹市中正路 34 號

古今集成事業有限公司：新竹市中正路 16 號

中央書局：中市中正路 125 號

光南圖書公司：中市三民路 3 段 92 號

華立書城：中縣烏日鄉中山路 95-20 號

三民書局：豐原市三民路 21 號

集祥書坊：中縣龍井鄉台中港路東園巷 6 號

文恩書坊：中縣龍井鄉台中港路東園巷 1 弄 5 號

大學生活廣場：中市台中港路 3 段 181 號

建彥書局企業(股)公司：彰化市光復路 177 號

墊腳石書店(來來書城)：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332 號

文明書城：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2 段 74 號

宏寶書局(成大書城)：台南東區大學路 6 號

台南書林書店：台南市長榮路 2 段 99 號

南一書局企業(股)公司：台南市北門路 1 段 76 號

復文書局：高雄市泉州街 5 號 東冠書報社：花蓮市國富九街 18 號

---

【遠流學術書編輯室】

# 沈默但堅定

每年出版學術圖書 100 種……

1989

年，遠流出版公司成立**第三編輯室**（負責學術性圖書與工具書的策劃、編輯工作），正式踏進**學術出版**的領域。

學術出版是無法急切求功的，我們深知這個特性，願意一點一滴匯聚中文世界的學術資源，與學術界密切合作，階段性地提出一部分成績給讀書界。

1991 年開始，我們已有能力每年出版學術圖書 100 種，我們還會不斷努力……

## 遠流學術圖書書訊暨郵購

如果您擔心錯過遠流出版的學術圖書，請填寄一張「讀書社群索閱單」，我們會經常將最新的出版消息提供給您。

### 《讀書社群》索閱單

我希望能獲得更多有關遠流學術書的出版消息，請寄贈 4 期《讀書社群》給我。

姓名：\_\_\_\_\_

姓別：男女 年齡：\_\_\_\_\_

住址：\_\_\_\_\_

學校或服務機關：\_\_\_\_\_

\* 請剪下或影印索閱單，填好各項後寄「台北市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遠流出版公司讀者服務部收」即可。

如果您在書店找不到書目上所列的書，可以利用郵撥 0189456-1 遠流出版公司帳戶郵購。請在劃撥單上填明所要的圖書暨寄書地址，書款在新台幣 200 元以下者，請依定價再加 20 元郵費暨手續費，書款在 200 元以上者，無需再付郵雜費。郵撥購書處理時間約需 2~4 週。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列寧：關於列寧思想統一性的研究／盧卡奇著；張翼

星譯。--初版。--臺北市：遠流，1991[民80]

面； 公分。--(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4)

譯自：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含索引

ISBN 957-32-1420-2(平裝)

1. 列寧(Lenin, Vladimir Ilyich, 1870-1924)--

學識--哲學 2. 列寧主義

549.35

80003542

# 目次

|                          |         |
|--------------------------|---------|
| 主編總序 .....               | 杜章智、沈起予 |
| 譯序 .....                 | 張翼星     |
| 前言 .....                 | 23      |
| 第一章 革命的現實性 .....         | 25      |
| 第二章 作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 .....    | 31      |
| 第三章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 .....      | 41      |
| 第四章 帝國主義：世界戰爭與國內戰爭 ..... | 55      |
| 第五章 作為武器的國家 .....        | 77      |
| 第六章 革命的現實政治 .....        | 89      |
| 一九六七年後記 .....            | 107     |
| 附錄：列寧的性格 .....           | 121     |
| 譯名索引 .....               | 127     |



## 譯 序

盧卡奇(Georg Lukács)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文藝評論家 and 政治活動家，是廿世紀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

盧卡奇因一九二三年出版《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而成名。此書出版後，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引起軒然大波，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內外引起廣泛爭議。一九二四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將書中的觀點斥責為與馬克思主義相背離的「理論上的修正主義」，並發動了對盧卡奇、科西(Karl Korsch)等人的思想的批判。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辯證法的歷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一書中，把《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一系列觀點與列寧主義、「當代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認為它開闢了「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思潮。從此，盧卡奇常被人們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

然而，盧卡奇的思想與列寧主義的關係究竟怎樣？能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這裡向中文世界的讀者奉獻的《列寧》(*Lenin*)一書，正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文獻。

誠然，《歷史與階級意識》是盧卡奇早期向馬克思主義轉變中的一部過渡性的著作，包含著思想的不成熟性和兩重性。一方面，在著重探索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黑格爾(George W. F. Hegel)來源、強調實踐的地位和主體、意識的能動作用，以及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思潮等方面，《歷史與階級意識》和列寧(Vladimir Lenin)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寫的《哲學筆記》(*Philosophical Notebooks*)有著基本相同或大致相近的傾向，說明兩位思想家站在時代的前列、反映時代精神趨勢的一致性。但是，盧卡奇對辯證法的性質、內容、核心的理解，對待黑格爾的態度，書中人本主義色彩和唯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某些影響，以及他對自然辯證法、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抨擊等方面，顯然又與列寧的哲學思想有著重大差別。

盧卡奇對列寧主義的接觸和理解有一個過程。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到《列寧》，盧卡奇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進展和轉變。收入《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八篇文章，寫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當時，在十月革命勝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幾年裡，歐洲革命浪潮尚在此起彼伏地發展，盧卡奇的思想正處於矛盾徘徊、激烈動盪的時期。作為一名年輕浪漫的革命家，他曾於一九一九年寫作〈策略和倫理〉(*Tactics and Ethics*)一文，作了一番內心的清算，並且談到列寧已經達到了「世界命運的改變」，即已經把社會主義理論變為現實。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失敗後，盧卡奇流亡維也納(Vienna)，獲得了進一步了解列寧的思想和著作的機會。但在起初，由於過份相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很快取得勝利，一度採取左傾激進的立場。一九二〇年，他在出版於維也納的《共產主義》(*Kommunismus*)刊物上發表

〈論議會制問題〉(*Zur Frage des Parlamentarismus*)一文，反對參加資產階級議會，拒絕一切不能立即取得勝利的策略。這種觀點受到列寧的尖銳批評。後來盧卡奇表示，列寧的批評使他邁出了脫離宗派主義的第一步，並在歷史觀上作出修正，使之更加靈活。隨後，他又從列寧發表的著名論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d Infantile Disorder)中進一步受到教益，從而更加加快了接受列寧主義的步伐，日益迫切地要求把列寧作為自己的政治導師。這些變化已經反映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表明盧卡奇在政治上正走向列寧主義。到一九二四年，歐洲的革命浪潮已明顯退落，資本主義進入相對穩定時期。盧卡奇面對現實，繼續利用流亡維也納的條件，對革命理論和實踐經驗進行了全面反思，並且更深入地學習、研究了列寧的著作，對列寧主義的理論與策略形成了全面而嶄新的理解。在列寧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逝世之後，他便以十分敏銳的洞察力，立即寫作、出版了《列寧》，標誌著他在政治理論上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列寧主義者。

### 一、和《歷史與階級意識》相比較，盧卡奇思想的進展與變化

《列寧》一書由於篇幅和當時文獻資料的限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不可能對列寧畢生的事業和思想作詳盡的論述。但是，作者確實抓住了列寧思想的一個基本特點——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圍繞這個特點，從革命的現實性出發，就無產階級與黨的領導、帝國主義與戰爭、國家學說與革命等列寧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說明列寧如何把俄國的具體實際跟社會歷史和時代的整體聯繫起來，

創造性地加以解決。作者處處把列寧的思想與機會主義者的思想進行對照，說明列寧「既不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是一個實踐的理論家，一個理論的實踐者。」<sup>①</sup>

《列寧》一書中的某些基本觀點和《歷史與階級意識》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繫，但克服了原來存在的某種抽象性、片面性的缺陷，闡述得更為切實而恰當。比如：

1. 盧卡奇堅持把作為方法論的革命辯證法看作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處處貫穿著辯證法的分析，並且始終把總體看作辯證法的基本範疇，把歷史過程的現實，即社會發展的整體，看得高於局部的、孤立的事實。但這種闡述已經擺脫了黑格爾式的某些抽象、思辨的語言，成為對列寧的一系列理論、策略的基本把握和實際分析了。

2. 盧卡奇繼續強調思想、主體的能動性和階級意識的歷史作用，但更緊密地結合了歷史和客觀現實的形勢。他在分析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黨的領導的思想、關於黨的組織概念時，指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決不能無中生有地幻想「製造革命」，但在一定的客觀形勢下，可以從事多方面的準備，加速革命趨勢的成熟。他把列寧關於黨組織的概念看作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體現，但它本身是辯證的：「就它**同時**也是**自身的產物和生產者**這個範圍而言，它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有意識的促進者。」<sup>②</sup>這顯然比《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某些論述更為確切而無片面性的弊病了。

3. 盧卡奇繼續將批判的鋒芒指向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傾向，進一步從辯證法的高度批判他們的機械宿命論觀點。

他認為列寧活動的特點，是始終如一地運用辯證法，而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特徵則在於公開譴責或實際背棄辯證法，以致「成為非歷史、

非辯證的和折衷主義的**現實政治的犧牲品**」<sup>③</sup>。而列寧的思想則意味著與機械宿命論的「**雙重決裂**」，即既反對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看作它的階級形勢的機械產物，又反對把革命本身看作注定要爆發的經濟力量的機械結果。實際上，在既定形勢下，黨能夠使它的階級目的具有很大的明晰度與活力。

和《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傾向相比較，《列寧》一書中的思想還有以下顯著的變化：

1. 唯心主義的某些影響已基本消失。如果說，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批判機械宿命論的歷史觀，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在辯證法的基礎上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和革命理論時，還受黑格爾的思維與存在同一論的影響比較深，有時是從這種同一論出發，來理解歷史過程的辯證統一；在強調總體範疇的哲學意義時，有忽視經濟因素決定作用的傾向；在強調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能動作用時，包含著誇大的成份，似乎意識是社會歷史的最後支配力量。到《列寧》一書中，這種唯心史觀的影響已基本克服。他在分析列寧的一系列觀點時，強調革命的現實性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列寧與馬克思的決定性聯繫。因此盧卡奇的分析具有強烈的現實感，他明確地表示：「光明正大不存幻想地面對事實，或許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神聖職責……。」<sup>④</sup>當然，在他看來，這種事實不是孤立的枝節，而是與整個歷史過程、社會發展的整體密切相關聯的。而且，他明確指出，辯證法要求「在發展的進程中全面考察有關的社會現象，從所有外部的、可見的表現中歸結到它們的基本動力——歸結到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sup>⑤</sup>他認為列寧作為一個辯證法家的偉大，就在於經常從最內在的本質上看到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

展，並總是把一切現象歸之於它們的最後基礎——按照人們實際的階級利益，歸之於具體(由**階級條件限制的**)人的具體活動。這顯然已經比較確切地表述了列寧所發揮的唯物史觀。盧卡奇明確地肯定歷史辯證法的客觀性，指出機會主義者企圖從馬克思主義中消除掉的歷史辯證法，仍然注定要在他們身上起到與他們的意志相反的作用。同時他還明確提到馬克思在吸取黑格爾的思想，使之結合到自己的理論中時，是「擺脫了一切神話和唯心主義的東西」。他已經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稱作「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把列寧主義看作這種辯證法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這種比較鮮明的唯物主義的態度和用語，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還是比較缺乏或不很清晰的。至於人們常說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化」的傾向，本來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就不占主導地位，不過是思想轉變過程中某種正在變動的東西，到這裡更可說是消失不見了。

2. 人本主義的成份已經淡化。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借助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Mind*)的總體和異化概念，著重闡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Capital*)中關於商品拜物教、關於「物化」的觀點。他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辯證法，喚起並宏揚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同時肯定階級鬥爭的各種合法與非法形式的必要性，但目的在於改變物化關係，使之復歸於人，從而結束「人類史前史」，使人類第一次有意識地把歷史掌握在自己手裡，使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個嚴肅地對待個人的自由。因此，《歷史與階級意識》包含著人本主義的理論色彩，這是它在理解馬克思學說方面的一個反傳統觀念的特點。到《列寧》一書中，可能是由於闡述列寧政治思想的主題比較集中，特別是由於矛盾分析、階級觀點的加強，人

本主義的觀念已經比較淡薄。

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來解釋所有的社會歷史現象，而修正主義則是從「整個社會」的利益出發，企圖模糊和鈍化階級差別，造成一種只存在於頭腦中的各階級的統一，因而只能是搞折衷主義，反對辯證法。這種理論色彩的變化推動著盧卡奇在政治理論上進一步接受列寧主義。

3. 辯證法觀念的進一步加深。辯證法思想是貫穿《列寧》全書的基本線索。盧卡奇仍然把辯證法看作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的方法，但是，他把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滲透在對列寧一系列理論、策略的分析上，抽象、晦澀的氣氛一掃而空，生動、具體的特性躍然紙上。這時，他雖然還不可能讀到列寧的《哲學筆記》，但通過對列寧一生的基本理論與實踐活動的分析，在與機會主義領袖（如伯恩施坦 Eduard Bernstein、考茨基 Karl Kautsky 等）的對照中，在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如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等）的比較中，把對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的理解和評價提到新的高度。盧卡奇指出，「列寧的實踐就使辯證法比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繼承時，具有了一種更廣濶、更完全和理論上更發展的形式。」<sup>⑥</sup>「列寧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被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弄成淺薄和曲解了幾十年之後，恢復了它的純潔性，而且他也使這一方法本身繼續發展、更加具體化和更加成熟。」<sup>⑦</sup>因此，他認為完全有理由說，列寧主義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

盧卡奇繼續強調總體範疇在辯證法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又進一步突出了矛盾在社會領域的意義。經歷戰爭與革命的風浪，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與機會主義的思潮相對立，盧卡奇得出的結論是：「辯

證法不過是對如下事實的概念表述：社會的發展本身事實上是矛盾的，這些矛盾（階級矛盾、它們經濟存在的對抗性等等）是一切事件的基礎與核心；「社會是通過矛盾過程得到發展的，是處在從一種矛盾向另一種矛盾轉化的狀態中，易言之是以一種**革命的方式**發展的……。」

⑧ 這已經在社會歷史領域接近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確定的對立統一學說是辯證法核心的這一思想。

但是，盧卡奇所論述的辯證法，仍然沒有超出社會歷史的領域，沒有從物質本體論的角度肯定客觀辯證法，自然辯證法仍然在他的視野之外。因此，在辯證法觀上，盧卡奇雖然已與列寧縮短了距離，但仍保持著較大的差別。

由上可見，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到《列寧》，在短短二、三年的時間裡，盧卡奇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從不成熟走向逐漸的成熟。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看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對革命實踐經驗教訓的反思；二是深入研究列寧的著作。《列寧》一書的醞釀與寫作本身，就推動了這種變化。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得出兩點看法：第一，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影響、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已經不占主導地位，而是盧卡奇思想轉變過程中逐漸克服的、次要的方面，因此在短短的二、三年內就能基本克服。第二，盧卡奇的思想發展趨向，不是與列寧主義相對立，而是逐漸地相接近、相一致，或相補充。在本體論、辯證法觀上保持著的差異，確實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不同線索，但盧卡奇思想與列寧主義的關係，不是兩峯對峙、雙水分流，而可能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地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和發展。



## 二、和史大林的觀點相比較，盧卡奇的思想顯示出對列寧主義的遠見卓識

列寧主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一條主脈，影響很大，而在國際社會思潮中又是分歧、爭議的焦點。

《列寧》一書中最有價值的方面，仍然是對列寧主義的內容、實質所做的評論。概括說來，主要涉及兩個基本問題：怎樣認識列寧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怎樣對待列寧主義？如何保持和發揚列寧主義的傳統？

### 1. 怎樣認識列寧主義？

列寧在世時對自己所代表的理論主張和思想體系，並沒有做過明確而全面的概括。列寧逝世後，由於形勢發展的要求，當時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內的一些主要領導者，如史大林(Joseph Stalin)、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等人，幾乎都從各個角度論述過列寧和列寧主義。他們對列寧主義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這種分歧，實際上也對以後的政治實踐發生過深刻影響。史大林在列寧逝世後，隨即發表過《悼列寧》(*On the Death of Lenin*)、《論列寧》(*Lenin*)、《論列寧主義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等三次演說。在前兩篇演說中，只是對列寧及其思想特點作過一般的描述和形象的比喻。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作的《論列寧主義基礎》的演說中，則論述了列寧主義學說的基本內容，並對列寧主義作出了一個著名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sup>①</sup> 這個定義曾經壓倒其他的

定義，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爲經典的解說而廣泛使用。應當說，它強調了列寧主義的時代性和國際意義，也指出了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有機聯繫，因而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幾十年來的歷史實踐說明，這個定義至少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嚴重缺陷：

第一，史大林的定義完全忽視了列寧主義的民族特點。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G. Chernyshevsky)曾經說過，任何一種先進的社會思潮，都既是產生它的那個時代的女兒，也是孕育它的那個民族的女兒。列寧主義應當是時代本質與民族特色的統一，它既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產物，又確是俄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與西歐各國的國情不同，俄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中多數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列寧從俄國的特殊國情出發所制定的理論、路線和策略，列寧主義的一些重要原理，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也無不打上俄國或東方民族的烙印。

史大林完全忽視和抹煞列寧主義的民族特點的一面，不適當地強調列寧思想的普遍性，片面地誇大了它的國際意義。他把列寧主義看作「對於世界各國——其中包括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是適用而且是必要的學說。」●這種傾向勢必把俄國革命和蘇聯建設的經驗絕對化，當作各國照抄照搬的模式，企圖在許多國家強制地推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實踐表明，這種觀點和做法，曾經使不少國家的革命和建設遭受這樣那樣的挫折和損失。

其實，史大林的這種觀點和做法是違背列寧主義的思想實質的。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就特別重視和專門闡述過一般與個別的辯證關係，在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又十分重視社會主義道路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關係。他曾經指出，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只是「按

最狹義說的」，只是就所反映的一般規律「具有在國際範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而言<sup>①</sup>，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國家都必然要做俄國已經做過的事情。」<sup>②</sup>同時，他又十分明確地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各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sup>③</sup>而且，十月革命之所以在俄國取得勝利，恰恰是列寧創造性地探索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俄國革命實踐，突破西歐社會主義模式的結果。第二國際的考茨基、普列漢諾夫(George Plekhanov)以及孟什維克蘇漢諾夫(Nikolai N. Sukhanov)等人，曾經把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絕對化，把西歐歷史發展的道路模式化，反對列寧的革命理論和策略。列寧在〈論我國革命〉(*Our Revolution*)這篇重要論文中，曾經針對他們的觀點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sup>④</sup>

與史大林的觀點和寫法不同，盧卡奇的《列寧》一書，並沒有給列寧主義下一個確定的定義。除了從整體上把握和闡述列寧的基本思想以外，更著重於從哲學的高度進行方法論的分析，從而對列寧主義作出了更為深刻而靈活的論斷。他認為列寧是從馬克思以來，由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所造就的最偉大的思想家，而機會主義者無法否認他的重要性，就往往徒勞地指責他對俄國和比較先進的國家之間的差別缺乏必要的洞察力，說他的歷史局限在於，他**不加鑑別**地把俄國現實中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一般化，普遍地加以應用。針對這種責難，盧卡奇指出，在馬克思的時代，也曾發生對馬克思類似的責難，似乎馬克思就是把對英國經濟生活和英國工廠制度的考察公式化，**不加鑑別**

地當作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實際上，馬克思和列寧這樣的天才人物決不是像一般的平庸學者那樣，只能理解和區分社會過程中某些孤立的現象，在引出一般結論時，不過是用一種抽象的方法，把受限於一定時間、空間的某些現象，解釋為「一般規律」，並加以應用。馬克思、列寧的天才是在於透過他們所處時代的具體事件，清楚地看到真實的本質，即這個時代中有生命有活力的主要趨向。因此，盧卡奇認為，列寧像馬克思那樣，從來沒有把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狹隘的俄國經驗一般化，而是從革命的現實性出發，洞察到時代的基本問題，從而理解並說明俄國和國際的所有事件。

盧卡奇十分深刻而頗有預見地指出：「那些只把列寧看作**現實政治**的一個聰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導者的人，完全誤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質。而那些以為能在他的決定中為正確而實際的行動找到可適用於任何地方的『公式』或『格言』的人，對他的誤解就更深了。列寧從來沒有規定過能夠『適用』於許多不同情況的『一般規則』。他的『真理』是從站在辯證地研究歷史的基礎上，對具體形勢進行具體分析產生出來的。只有笨拙的模仿、庸俗化的列寧主義，才會從對他的見識和決定進行機械的『一般化』中產生出來。」<sup>①</sup>

盧卡奇的這種分析，可以說把握了列寧主義的精髓，是比對列寧主義下任何一個確定的定義要遠為高明的，而且恰恰擊中「史大林主義模式」的要害。正如他在一九六七年的〈後記〉中所說，他從列寧那裡得到的看法產生了一些結論，在清除史大林主義的這些時候，「這些結論仍然具有某些方法論上的妥當性」，對列寧的行為所作的某些評論，實際上「隱約包含著對史大林後來的發展所做的某種正確的批評」<sup>②</sup>。

第二，史大林的定義對列寧主義基本內容的理解過於狹隘。按照

這個定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和實質就被限定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但是，列寧主義實質上是在新的時代、歷史條件下，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開闢了一條從民主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圍繞這個中心，列寧結合俄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不但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方針、政策和步驟，而且提出了若干富有深遠意義的構想。列寧主義不但在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在哲學方面，在唯物史觀，特別是在辯證法——認識論方面——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同時，列寧主義的思想是一個發展過程。不僅在十月革命前後，而且在十月革命後的短短七年裡，也經歷了若干重要的轉折，比如，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轉折。列寧是在試圖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他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然而却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而且，列寧主義的內容隨著時代、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如果把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僅僅概括為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不但不足以反映它的豐富性、開放性和過程性，難以揭示它的深刻內涵和實質，還容易把列寧主義的內容凝固化、狹窄化，造成人們對列寧和列寧思想的某些誤解。應當看到，這種片面、狹隘的理解也是某些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形成極「左」路線的一個重要根源。至今在一部份人中產生的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某種厭倦和冷漠的心理，也與此有關。

盧卡奇在《列寧》一書中對列寧基本思想的概略分析和論述，是把邏輯與歷史統一起來，並沒有把它固定在某一個方面，而是從動態的角度，著眼於方法論的意義，特別重視列寧對辯證法的運用和發展。

他指出，列寧整個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終如一地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運用到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中的這一不斷變化、永遠翻新的現象上。」●這樣，即使在非常變動的環境下，列寧像一切偉大人物一樣，他的言行，特別是他的方法，就仍能保持一種確定的同時代性。比如，列寧關於妥協的理論，就是革命現實性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生動運用。十月革命後，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列寧與黨內的「左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盧卡奇指出，左派激進主義的口號是原則上反對任何妥協，而列寧的主張則是從如下的認識得出的：「歷史總是在創造新的條件；歷史上不同傾向相互交叉的時刻永遠不會以相同的形式重新發生；那些對於明天的革命是一種致命危險的傾向，可能被判斷為對於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

盧卡奇還指出，由於歷史的發展，可能產生與原先接受的理論相矛盾的情況，列寧並不拘泥於某種固定的策略主張。比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列寧就曾正確地預見到，由於俄國的經濟落後，採取某些過渡的形式和中間環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迫使蘇維埃實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即實行餘糧徵集制和某些直接的產品分配的方式。這是列寧因現實的需要而作出的讓步，但他沒有放棄理論的原則和信念。因此一當國內戰爭和國外干涉結束，就立即回到理論上正確的新經濟政策的路線，即徵收糧食稅，並通過商品交易的環節來恢復和發展經濟。盧卡奇認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列寧都是使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指出，列寧在實踐中已經認識到，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包含著主觀上的某些錯誤，因而決定用新經濟政策來改正這種錯誤，並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裡進一

步建設社會主義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盧卡奇限於當時的實踐和認識水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他評論中的不足之處。但他在總的傾向上強調列寧善於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及時改變自己的政策、主張的觀點，仍然是十分中肯，符合列寧思想特點的。

盧卡奇的論述風格與史大林迥然相異。史大林論述列寧的理論、策略時，往往停留在這些理論、策略上，他在涉及列寧的方法時，往往把理論與方法分開，只談論某些具體的策略、方法，很少上升到作為理論基礎和靈魂的辯證法；盧卡奇則往往從理論、策略的論述，提煉、上升到辯證法的分析，因而總是顯得更開濶、更有深度。儘管如此，盧卡奇在一九六七年的〈後記〉中，仍然以自我解剖的精神講到，書中的思想不免受到那個時期概念的限制：「第一句話本身就證明了當時的偏見：『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毫無疑問，這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的表述。但同樣可以肯定，它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本質唯一的規定，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規定。而且列寧——對他來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形成思想和實踐的紅線——會因為這樣的『定義』，無論怎樣也要提出最激烈的抗議，反對任何想把歷史唯物主義真正的和方法論的財富——社會的普遍性——歸結成一種簡單的面向並加以束縛的嘗試。」●這既是盧卡奇關於列寧思想論述的一點自我反思，也是對史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定義的一種深刻批評。因為史大林在分析列寧的思想遺產時，正是忽視列寧主義思想的方法論意義，而把整個列寧主義的思想內容束縛在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單一尺度上。總的說來，在分析、闡述列寧主義方面，盧卡奇跟史大林的主要差別和分歧是在這裡。

## 2. 怎樣對待列寧主義？

與怎樣認識列寧主義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怎樣對待列寧主義？是固守列寧的某些具體結論，還是堅持運用列寧主義的辯證方法？隨著時代、歷史的向前發展，列寧主義的某些基本原理仍然保持著生命力，但要堅持這些原理，也必須同時重視列寧提出和運用這些原理的方法。列寧從來沒有拘泥於馬克思學說中某些現成的結論和詞句，而是在新的時代、歷史條件下，緊密結合俄國實際，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盧卡奇富有深意地強調，應當以列寧研究馬克思的精神來研究列寧，以列寧對待馬克思的態度來對待列寧。這就是說，不能把列寧的學說當做某種固定不變的教條，不能躺在列寧主義的現成內容和結論上，而要在研究和運用列寧主義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列寧主義。

什麼是列寧主義的傳統？在盧卡奇看來，列寧主義意味著使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變得比在馬克思的時代更具有實踐性。所謂列寧主義的傳統，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準確而靈活地保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生動活躍的特色和創造性的功能。因此，要繼承和發揚列寧主義的傳統，就必須深入研究列寧的思想，「以便學習如何運用辯證法；學習如何通過對具體形勢的具體分析來發現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學習在形勢的新環節中發現跟以前的發展有關聯的是什麼；學習在歷史發展的規律中發現總是不斷翻新的現象；學習在整體中發現部份和在部份中發現整體；學習在歷史必然性中發現能動性的環節和在能動性中發現跟歷史必然性的聯繫。」●

盧卡奇對列寧主義的研究和闡述，樹立了一面反教條主義的旗幟。他認為列寧主義展現了一種「具體、非公式化、非機械化、純粹以實踐為方向的思想」●，保持列寧主義的傳統，就是要保持這種特點。「但是，



在歷史的進程中，只有以生動的方式發展的東西才能保持得住。」●就是說，只有發展列寧主義，才能維護和堅持列寧主義。

在一九六七年的〈後記〉中，盧卡奇還談到以批判的態度研究列寧的著作這點。他認為列寧是屬於那種根本無意要從自己的著作中得出某種「一貫正確」的教條集成的人。因此，後人以批判的態度來研究他的著作，絲毫無損於他在現世的偉大。在盧卡奇看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所運用的辯證法，是不會過時的，而列寧論述的比如關於帝國主義發展必然導致世界戰爭的論點，則可能過時，現在已失去它一般的妥當性。看來盧卡奇提出這種見解，也正是要批評史大林主義，與史大林主義的那種「一貫正確的不朽事蹟這一官僚主義理想」●對立起來。

盧卡奇一生的道路，經歷過重大的曲折，他走向列寧主義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列寧》一書，是他在政治理論上完成轉變的一個標誌。總的來看，在歷次圍繞列寧主義的重大爭議中，他是一貫支持和維護列寧主義的。比如，在列寧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爭論中，在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孟什維克代表人物的爭論中，在列寧與羅莎·盧森堡之間發生某些理論、策略上的分歧時，以及後來在列寧主義與史大林主義的關係問題上，他都明確地維護列寧主義，要求站在列寧主義的一邊。甚至當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中把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列為與列寧主義相對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篇時，他認為這也是違背他的意願，因而表示不滿和抗議。跟西方某些尋求或鼓吹列寧與馬克思對立的學派相反，盧卡奇是盡力尋求和論證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統一。直到晚年，他還在強調，當代馬克思主義最迫切地需要具有列寧這樣政治天才的人物來建立新的理論和策略，以適

應時代、歷史的需要。

史大林在世時，盧卡奇於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在蘇聯生活，工作了十來年。在此期間，用他的說法，是爲了獲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入場券」，他寫過某些應景文章，或者在某些自我批評中包含違心的、過頭的成份。但總的理論傾向是與史大林主義相對立的。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他也曾支持史大林而反對托洛茨基，但他意在維護列寧主義。早在一九二九年所寫的《布洛姆論綱》(*Blum Theses*)中他就與史大林的策略不同，要求建立「人民陣線」，聯合社會民主黨人以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三〇年代，他認爲主要的國際鬥爭是民主力量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鬥爭，要求廣泛聯合民主力量以反對極權主義；在一九三八年寫成並曾被蘇聯官方扣壓的《青年黑格爾》(*The Young Hegel*)一書中，與史大林貶低黑格爾思想遺產的觀點相對立，他更深入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哲學思想的聯繫，並且高度評價了列寧的《哲學筆記》，進一步表明了他在哲學上與列寧主義的一致；在政治、文學和美學的領域，他堅決譴責極權主義對藝術和思想的控制；在國際關係方面，他堅決反對冷戰，要求實現東、西方之間的和平共處。可見在所有這些方面，他的思想是跟史大林主義針鋒相對或者存在原則上的分歧的。自五〇年代中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公開批評了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之後，他更積極地參與了對史大林主義的批判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革新的活動。

在盧卡奇看來，列寧主義是開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時代、歷史條件下的豐富和發展，而史大林主義則具有宗派主義的性質，它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爲特徵，並包含著極權主義的成份，它只能使列寧主義停滯、僵化和受到歪曲。所以，他認爲反對、

批評史大林主義，跟維護、發展列寧主義是一致的。

至於對本書的整個評估，盧卡奇本人在一九六七年為他的著作《盧卡奇全集》(Georg Lukács Werke)第二卷所寫的序言中有一段回顧，他說：「我過去的研究仍舊帶有二十年代的痕跡，它使我在描繪列寧的思想肖像時，做出了某些錯誤的側重，特別是，比之他的傳記作家，我在對列寧的評論中更深刻地探究了他的後期階段。然而，由於列寧的理論和實踐客觀上與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準備工作及其必然後果密不可分，我的著作的主要部份本質上依舊是正確的。在二十年代聚光燈的照耀下，我為說明這位偉大人物的獨特品質而進行的努力，使他顯得稍微有點陌生，但並不是完全不可辨認。」<sup>②</sup>這大致勾勒了全書的背景和傾向，可以作為我們閱讀時的一個總的參照。

我懷著激動的心情譯完盧卡奇的這本不同凡俗、具有遠見卓識的論著，與史大林的思想、評論相比較，我愈發感到盧卡奇不愧為一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讀著這本言簡意賅、議論風生的小書，仍可得到不少啓迪。我願鄭重地把它獻給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對列寧思想、盧卡奇思想以及對二者之間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和研究者，譯者序言和譯文中的不當之處，也深望得到他們的批評和指正。

最後，還必須提到，《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主編杜章智教授和沈起予先生始終關注本書的翻譯。杜章智教授為我審讀了初譯稿，沈起予先生又參考《盧卡奇全集》第二卷原德文發表文字對整個譯文作了不少精心的修正，並根據原德文版本把英譯文的內文意思譯得跟原德文版不同的地方，按照德文版改過來，使整個中譯本較能貼近原意。此外，書末附錄中的一篇由姜其煌先生精心翻譯的盧卡奇關於列寧的訪談，也是根據他們的建議加上的。這篇訪談以明白易曉的方式說明

了盧卡奇與列寧的關係，以及他對列寧思想的態度，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可以說為這個中譯本增色不少。我對他們所付出的辛勞，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是根據一九七四年麻省理工學院(MIT)出版的英譯本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譯的，書末增補的〈列寧的性格〉這篇附錄，是姜先生譯自 Gyorgy Lukács, "On the Personality of Lenin," in *Marxism Today*, Vol.15, No.9 (Sept. 1971) 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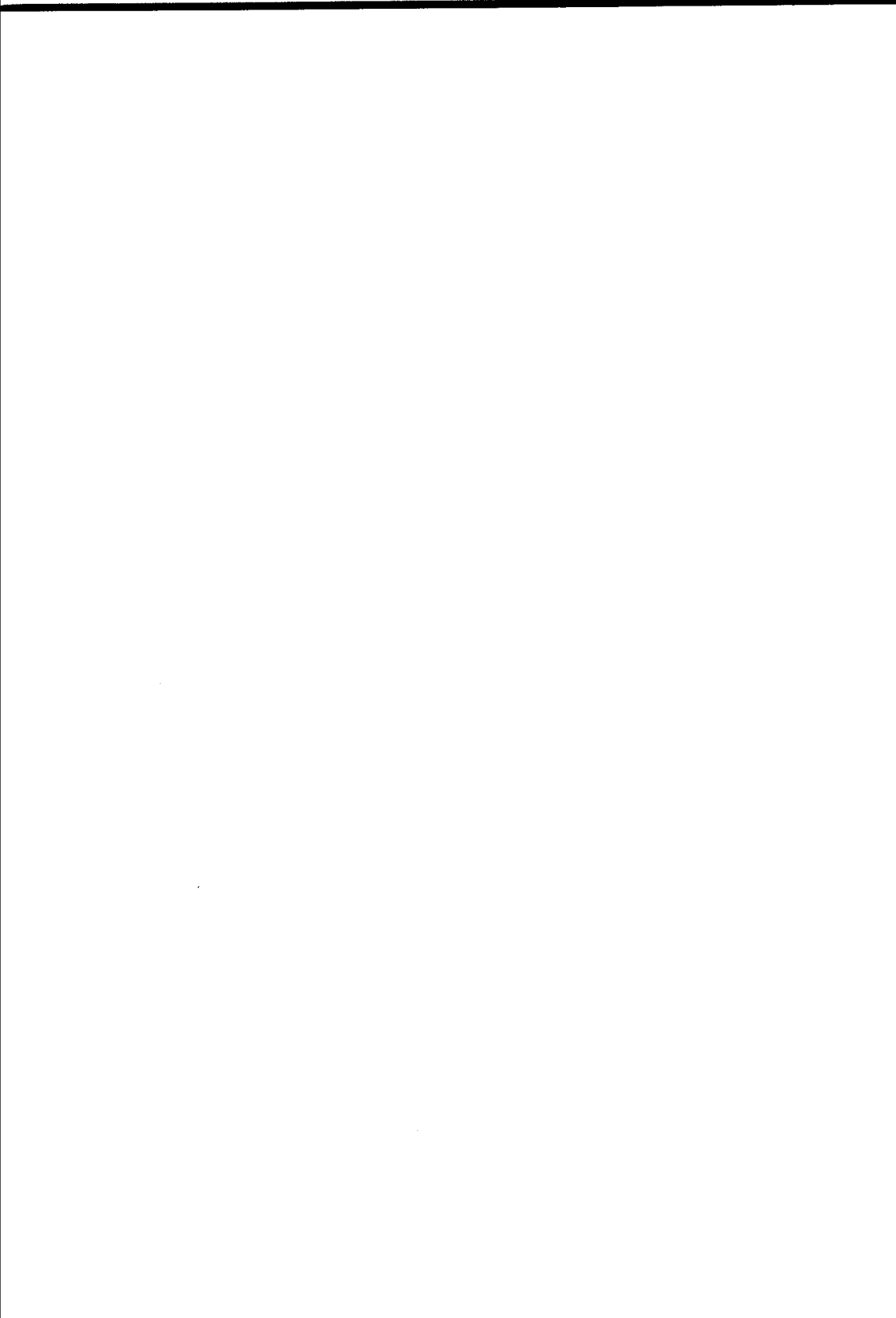
張翼星

一九八九年八月

於北京大學 蔚秀園

- 
- ①見本書，頁一一七。
  - ②見本書，頁五三。
  - ③見本書，頁七二。
  - ④見本書，頁三四。
  - ⑤見本書，頁九五。
  - ⑥見本書，頁一〇三～一〇四。
  - ⑦見本書，頁一〇四。
  - ⑧見本書，頁七〇。
  - ⑨史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史大林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一八五。

- ⑩同前揭書，頁三九九～四〇〇。
- ⑪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一七八。
- ⑫同前揭書，頁一八七。
- ⑬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六四～六五。
- ⑭列寧，〈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六九〇。
- ⑮見本書，頁一〇〇。
- ⑯見本書，頁一〇八。
- ⑰列寧，〈工會在新經濟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頁一五五。
- ⑱見本書，頁一〇三。
- ⑲見本書，頁九八。
- ⑳見本書，頁一〇八。
- ㉑見本書，頁一〇四。
- ㉒見本書，頁一〇四。
- ㉓見本書，頁一〇四。
- ㉔見本書，頁一一〇。
- ㉕盧卡奇，〈我向馬克思的發展〉（一九一八年～一九三〇年），《盧卡奇自傳》，杜章智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〇年），頁二七三～二七四。



## 前 言

下面的短論從來都沒有說，它想對列寧的理論與實踐作鉅細靡遺的論述。由於有恰恰是列寧的理論與列寧實踐之間的關係顯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許多共產黨人的頭腦裡也一樣的這種想法，所以它只想粗略地表明他的理論與他的實踐之間的關係。要徹底地論述所有這些問題，不僅要有比這幾頁還要大得多的篇幅，而且也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可以用來這樣說明列寧畢生的事業。這對於那些只能通過譯文來接觸相關的俄國文獻的人來說，尤其是如此。列寧的一生經歷至少需有最近三十至四十年的歷史作為架構。我們希望相稱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可以看到。這些引導性評述的作者本身深知，在個別問題所屬的這個整體性問題未獲得澄清之前，要討論這些個別的問題是有多麼困難；而在應該加以普及、知識上毫無疑義的確定下來的個別問題普及之前，要使這些個別問題普及起來同樣是有多麼困難。因此在這裡根本不探討列寧一生所充滿著的整個問題，也不探討這些問題在歷史上出現的正確先後順序、問題的選擇、前後順序和開展。同樣，書中所做的引證也是根據這一點而有選擇地進行的，並沒有遵照精確的年月順序。





# 第 1 章

---

## 革命的現實性

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因為它的本質是關於產生無產階級的這一社會存在並從根本上規定無產階級的這一社會存在的一種理性綜合；而且因為為解放而鬥爭的無產階級在其中找到它明確的自覺。一個無產階級思想家的境界，一個歷史唯物主義代表人的境界，可以根據他對這點和由此產生的問題掌握到的深度和廣度，根據他能夠精確地探查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現象下底沈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傾向（這些傾向本身在無產階級革命裡頭產生作用，而且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讓自己得以實際存在、具有獨特的意識）的程度來衡量。

以這些標準來衡量，列寧是從馬克思以來由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所造就的最偉大的思想家。無法否認或忽略列寧重要性的機會主義者們夸夸其談地說，列寧是俄國偉大的政治人物，但他對俄國和比較先進的國家之間的差別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因而不能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他們認為，他的歷史局限性是他不加鑑別地就把俄國現實中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一般化，普遍地加以應用。他們忘記今天完完全全被人忘掉的這一事實：在馬克思的時代，有人也對馬克思提出同樣的責備。那時是說，他對英國經濟生活和英國工廠制度的觀察，不加鑑別地就把它當作一切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的觀察本身可能是十

分正確，但是正因為這些觀察被曲解成一般規律，它們就變成不正確了。現在不需要詳細批駁這種錯誤，指明馬克思從來都沒有把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特殊經驗「一般化」。恰恰相反，馬克思確實是以真正歷史和政治天才的方法，從理論和歷史兩個方面在英國工廠制度的微觀世界、它的社會前提、它的條件與後果以及造成它的發展最後因而威脅到它的發展的這些歷史趨向當中，確實探察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宏觀世界。

這正是在科學或政治上使得天才區別於平庸學者的東西。後者只能理解社會過程中直接既有的、孤立的環節，並加以區分。當他想取得一般結論時，實際上他只不過是用一種確實抽象的方法，把在時間和空間方面受到限制的現象的某些方面解釋為「一般規律」，然後加以應用。但是，對於天才來說，真實的本質，即一個時代中有生命的和活動的主要趨向是一清二楚的。即使在他自己認為他只是在討論日常事務的時候，他也是在他所處時代的每一事件背後看到這些主要趨勢在產生著作用，而且不斷地寫到有關整個時代具有決定意義的那些基本問題。

現在我們知道，這就是馬克思的偉大之處。根據英國工廠制度的結構，他指出並說明了現代資本主義所有決定性的傾向。他總是把資本主義的發展描述為一個整體。這就使他既能夠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任何一種現象中看到它的總體，也看到它結構的動力。

然而，今天知道列寧為我們時代做過馬克思為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做過的那些事情的人，寥寥無幾。在現代俄國發展的諸多問題——從資本主義出現在一個半封建專制主義國家中的這些問題，到在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這些問題——中，列寧總是看到整個時

代的這些問題：**關於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攻擊以及把現在避免不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最後鬥爭轉為對無產階級有利、對人類的拯救有利的可能性。**

像馬克思那樣，列寧從來都沒有把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狹隘的俄國經驗一般化。然而，列寧以天才的直覺在問題首次出現的時空狀態中馬上看出我們——這一逼近革命的——時代的基本問題。從那時起，列寧就是從這個觀點——從革命的現實性的觀點——出發，理解和說明俄國的和國際的所有事件。

**革命的現實性：這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他與馬克思的決定性聯繫。因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為解放而鬥爭的概念表述，只有當革命已經作為一種實際的現實出現在歷史的議事日程上，只有當（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人們在無產階級的苦難當中，不僅僅是看到苦難本身而且也看到「將摧毀舊秩序」的革命因素時，才能夠在理論上加以思考並且把它提出來。而即使在那時，也必須要有無畏的天才洞見，才能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一般人只是當工人群眾已經在街壘戰鬥時，才能看到無產階級革命，而如果他所受過的恰巧是一種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的話，甚至到那時也不會看到。因為，在一個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是固若金湯，因此即使我們看來它是處在風雨飄搖當中，他也只希望並祈求回到「正常狀態」，他也只把這一社會的危機看作短暫的插曲，而且即使在這個時候，他還是認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是對不可戰勝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無理和不負責任的造反。對於他來說，街壘上的鬥士都是瘋子，失敗了的革命是一種錯誤，而在革命中獲得勝利（在機會主義者眼裡這種成功只是暫時的）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乃是徹頭徹尾的罪犯。

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現實性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整個時代客觀基礎以及認識這個時代鑰匙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構成馬克思主義起作用的核心。雖然有在完全拒絕一切沒有事實根據的幻想和嚴厲譴責一切盲動主義當中表現出來的這種分界線，可是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還是緊緊地抓住所謂馬克思個人預見的錯誤不放，以便拐彎抹角地從整個馬克思主義內部把革命完完全全地剔除掉。而且，捍衛馬克思的「正統」的人跟批評馬克思的人妥協：考茨基對伯恩斯坦解釋說，我們可以很容易悄悄地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移到未來——一個非常遙遠的未來——來解決。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思考得更清楚、更具體。不是說他想用某種方法來提昇馬克思。他只是把馬克思逝世以來歷史過程的進一步發展放進理論裡頭。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不再只是設定在工人階級自我解放上面的世界史眼界，而它也是已經提上工人運動議事日程上的**革命**。要列寧承受因這種地位帶給他的布朗癸主義(Blanquism)等的罪名，容易得很，這不僅是因為他完全一致——就他必須分擔這些扣在馬克思身上的(扣在馬克思「某些方面」上的)罪名來說——而且也因為跟這種一致性一道他恰如其份贏得了他的地位。一方面，無論馬克思還是列寧都不曾把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和它的目的，認為是在任何一定時刻都是能夠輕易實現的東西。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通過這種現實性，他們兩人才取得評估當代一切問題的可靠的試金石。革命的現實性訂下了整個時代的基調。個別的行動只有與革命的中心問題聯繫起來，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這個中心問題只有通

過對社會歷史整體的精確分析才能找到。因此，革命的現實性就意味著把跟社會歷史整體有具體關聯的每個個別的日常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中的契機來研究。因此馬克思主義通過列寧所經歷的發展，僅僅——僅僅！——存在於它越來越理解到個別行動與一般命運——整個工人階級的革命命運——之間密切的、可見的和重要的聯繫這裡頭。這僅僅意味著每一個日常的問題——正是作為日常的問題——同時也變成是一個革命的基本問題。

資本主義的發展把無產階級的革命變成一種日常的問題。看到這場迫在眉睫的革命的人不僅限於列寧一人。可是，列寧從那些本身在理論上大聲疾呼無產階級革命迫在眉睫，可是這一革命已經變成現實時卻懦怯地打退堂鼓的人裡頭脫穎而出，不只是因為他勇於自我犧牲、奉獻，能夠自我犧牲而已。他的理論清晰透澈，也使他從他同時代人中那些最優秀的、最有奉獻精神的和最有遠見的人裡頭突顯出來。儘管他們只像馬克思在他那時代能夠做的那樣解釋革命的現實性——把它解釋成整個時代的基本問題。籠統地說，他們的解釋也還是正確的。但是，他們不能把它應用來和用來為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確立穩固的指導路線，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唯獨列寧朝著使馬克思主義（現在十分注重實踐的力量）變成具體的方向往前邁進了這一步。正是因為如此，從世界史的意義來說，他才是已經由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造就出來**唯一可以與馬克思並駕齊驅的理論家。**



## 第 2 章

# 作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

遠在資本主義在俄國實際發展和工業無產階級產生以前，俄國形勢的不穩定性就已經變得十分顯著了。農村封建主義的瓦解和官僚專制主義的腐敗，不但早已成為俄國現實中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且也已經促成一些不時起來反對沙皇制度的階層，即使這種反抗仍然是以一種不明確的、混亂的和僅僅是本能的方式表示出來——而且已經導致農民騷動和所謂沒有階級之分的知識階級的激進化。我們看得出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它實際存在到什麼樣的程度，意義有多大，就是敏銳的觀察者也還是不清楚——急劇地增強了客觀的騷亂和它的革命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一八四八年還是歐洲反動勢力可靠避難所的俄國，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越來越明顯是在逐漸地朝向革命的方向發展。唯一的問題是：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哪個階級應該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

為什麼第一代革命家們對於如何提出這種問題還很不清楚，這是容易理解的。他們在首先起來反對沙皇的集團中看到的是一個同質的因素：人民。知識份子與體力勞動者的分野即使在這個階段還是很明顯的，但這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在「人民」中階級的劃分並不明確，而在知識份子中只有確實忠誠的革命家投身於運動之中。這些革命家

認為，與人民相結合，並且只代表人民的利益，乃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職責。

但即使在革命運動的這個階段，歐洲的發展也必然要影響事態，從而影響革命家們藉以評估事態的這一歷史思考角度。在這裡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歐洲發展的進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也是俄國不可避免的命運？俄國在社會主義裡找得到救贖之前，是否也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的苦境？或者，由於她的情況與眾不同，由於她還有農村公社，她能夠跳過這個階段而找到一條從原始的共產主義直接向發達的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當時絕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清楚。恩格斯不是直到一八八二年還在回答說，如果俄國革命同時引起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嗎？

關於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即使要概略說明這裡的篇幅也不夠。它只是使我們不得不選擇我們的出發點，因為由此產生了這一問題：哪個階級是未來俄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可以看得出來，承認農村公社是未來俄國革命的出發點和經濟基礎，就必然使農民變成社會變革的領導階級。而且與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有別於歐洲的這個差異相一致，革命就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之外尋求其他的理論基礎，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是關於社會必然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表述。爭論俄國是不是處於沿着資本主義路線發展的過程中——俄國資本主義是不是能夠發展——進而，在理論方法上爭論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一種社會發展普遍妥當的理論，以及最後，把討論集中在社會中要派定哪一個階級使它成為俄國革命的真正動力



——所有的這些，關鍵都是在同一個問題上面。它們都是俄國無產階級的演變的這一意識形態反映，都是它在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策略、組織）上獨立於其他社會階級的這一演變的各階段的意識形態反映。

這是每次工人運動都必須經歷的一個持久而又痛苦的過程。只有包含著本身表現出階級狀況的特殊性和無產階級階級利益自主性的這些個別問題，才構成工人運動特殊的俄國組成成份。（德國工人階級在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倍倍爾 August Bebel—施韋澤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時期曾有過一個類似的階段，德國的統一成為它的決定性問題之一①。）但是如果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要取得它行動上的獨立性，就必須明確地針對這些局部性的問題本身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最好的理論訓練，如果只限於作出通則、概括，也是絕對沒有價值的：要想在實踐中有效，它就必須通過明確地解決這些特殊問題的方式把自己表現出來。（比如，威廉·李卜克內西 Wilhelm Liebknecht，雖然是一個熱情的國際主義者和馬克思的嫡傳弟子，却也決不比那些在純粹理論水平上更為混亂的拉薩爾主義者②更能經常、可靠地作出正確的決定。）但這裏對於俄國更為特殊的是，這種為無產階級獨立、為承認它在未來革命的領導角色而進行的理論鬥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確實在俄國那樣取得如此清楚而明確的解決。因此，俄國無產階級在很大程度上不致於有毫無例外地可以在所有先進國家的經驗中發現到的那些猶豫和倒退——不是在猶豫和倒退是免不了的那種成功的階級鬥爭進程中的猶豫和倒退，而是在理論明晰透徹和策略、組織自信心上面的猶豫和倒退。至少它最有自覺的階層，能夠在理論上和組織上像它的客觀階級狀況從俄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直接和明確地發展出來那樣發展出來。

列寧並不是第一個從事這種鬥爭的人。但只有他把每一個問題透徹地思考到底：透徹地把他的理論洞察轉變為實踐。

列寧是其他的理論代言人當中唯一投入反對「原始的」俄國社會主義，反對民粹派(Narodniks)鬥爭的人。他從事理論鬥爭的目的，旨在決定俄國的命運當中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獨立和領導角色，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由於這種論證的進程和實質只在於證明，像馬克思所概括的那樣，資本主義發展所走過的典型道路(即原始積累)跟俄國也有關係的——即一種有活力的資本主義在那裏也能夠存在而且必須存在——因此這種爭論就必定把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代言人和新興的俄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家們暫時納入一個陣營。把無產階級與混沌一片的「人民」在理論上區分開來，決不會跟著自動產生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和領導角色的知識與認知。相反地，證明俄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朝向資本主義的這一簡單、機械和非辯證的結論，顯然是無條件接受這種現實並甚至促使它盡快到來。確實不祇對於進步的資產階級來說是如此。在資產階級記住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說明資本主義必然從資本主義以前世界的解體中出現的經濟理論時，它的——暫時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不難理解的。對於所有機械地而不是辯證地解釋馬克思，對所有不理解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學得並體現在他自己擺脫一切神話和唯心主義的理論裡的東西的那些「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它必定看來更是必然如此：承認一個事實或趨向確實是存在的，絕不意味着說一定要把它當做是構成我們自己行動準則的一種現實接受下來。光明正大不存幻想地面對事實，或許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神聖職責，但是對於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總是有一種比**孤立**的事實和趨向更為真實因而也更為重要的現實——這就

是整個過程的現實，即社會發展的總體。因此，列寧寫道：「資產階級的事情就是發展托拉斯(trusts)，把兒童和婦女趕進工廠，在那裏折磨他們，腐蝕他們，使他們過着極端貧困的生活。我們不『要求』這種發展，我們不『支持』這種發展，我們反對這種發展。但是怎樣反對呢？我們知道，托拉斯和婦女在工廠中勞動是進步的。我們不願意倒退到手工業，倒退到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和婦女從事家庭勞動的時代。要通過托拉斯等等前進，並且要超過它們走向社會主義！」

這就為列寧主義解決這整個一系列問題提供了立足點。可見，承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承認在這種發展中包含着歷史的進步，決非迫使無產階級支持它。無產階級一定會歡迎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奠定無產階級自己出現作為決定性力量的這一基礎，但是無產階級一定會歡迎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它當作是它自己對資本主義真正的主人翁——對資產階級——進行艱苦鬥爭的條件和前提。

只有這種歷史趨向必然因素的辯證理解，才為無產階級在階級戰爭中自動出現創造了理論的空間。如果按照俄國資產階級和隨後的孟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先驅者的方式，不分青紅皂白地就把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接受下來，那麼俄國就一定首先要完成它的資本主義發展。這種發展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按照這種公式，只有在資產階級前進了一段很長的路程之後，在資產階級已經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掃除了封建主義的障礙，在它的位置上建立起現代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之後，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鬥爭才能開始。帶有獨立的階級目的的無產階級過早出現不但是無用(因為它在這一資產階級與沙皇制度之間的戰爭中幾乎不值得被看作是一支自主的力量)，而且對無產階級

本身也是有害。因為這會嚇壞資產階級，削弱資產階級對沙皇制度的打擊力量，並把它逕自趕入沙皇的懷抱。按照這種解釋，只能暫時把無產階級看成是為現代俄國鬥爭的進步資產階級的一種附屬力量。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在當時看不清楚)，這整個辯論是紮根在革命的現實性這一問題之中。對於那些沒有多少自覺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家來說，道路是這樣劃分的：按照是把革命看作工人運動議事日程中的當前問題，還是把它看成為一個當前的決定似乎還不適合發揮任何明確影響力的遙遠「終極目標」。確實更有問題的是，就算我們能夠認為孟什維克的歷史觀點是正確的，是不是無產階級決會接受孟什維克的立場；是不是這種資產階級的忠實奴僕不願完全搞混階級意識，以致使無產階級在甚至就是孟什維克的理論也認為合適的歷史時刻，從意識形態上還是無法像一次獨立行動那樣脫離資產階級，或者至少要比較困難得多(這裏我們只需要想想英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這是眾所公認的空虛的思辨。機會主義者企圖從馬克思主義中消除掉的歷史辯證法，仍然注定要在他們身上起到跟他們的意志相反的作用，把他們趕入資產階級陣營，而且在他們看來，還會把無產階級的獨立出現推遲到無人可知遙遠、遙遠、實際上也不存在的未來。

歷史證明列寧和少數公開宣佈革命現實性的人是正確的。與進步資產階級聯盟(在為德國統一而鬥爭的時期就已經證明是一種妄想)只有當無產階級可能作為一個階級而跟隨資產階級與沙皇結成聯盟時，才得以倖存。因為，革命的現實性意味着資產階級不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毫無疑問，與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相比較，以資產階級為領導者和受益者的經濟制度代表着進步。但資產階級的這種進步特性又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前提和它所要求的政治民主或法治之間的必

然聯繫，已變得比較鬆散（這種政治民主或法治原是——儘管只是部份地——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封建專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日益迅速地迫近，使得**資產階級與封建專制主義之間有可能建立使資產階級的經濟生存和成長條件獲得舊統治力量的政治霸權保證的聯盟**。另一方面，由於這種聯盟而**思想墮落的資產階級把實現它自己以前革命要求的事委之於無產階級革命**。

資產階級與舊統治力量之間的聯盟不管或許有多大的問題，因為它當然是出於互相害怕更大的邪惡而產生的一種妥協，而不是一個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階級聯盟，所以它還是一個新的重要事實。跟這一事實比較起來，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之間「必然聯繫」的這一公式化的和機械的「證據」，必定呈現出來，說明它是一種徹底的幻想。列寧說：「一般說，政治民主僅僅是一種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可能形式。（雖然在理論上對『純粹』資本主義來說是一種正常形式）。正如事實所表明的，不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都是在各種政治形式下發展的，並且使所有這些形式服從於自己。」特別是在俄國，資產階級從一種——表面——激烈反對沙皇制度的立場極為迅速地轉變為支持沙皇制度，其根本原因在於嫁接於俄國的資本主義「非有機的」發展。這一資本主義非有機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壟斷特徵（大規模工業的支配地位，金融資本的角色）。由此可見，與那些經歷過一種更為「有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相比，俄國資產階級是一個數量上較小、社會力量較弱的階層。然而同時，革命無產階級發展的物質基礎在大規模的工廠中奠定下來，速度比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在純粹統計上的估計所講的更快。

但是，如果跟進步資產階級的結盟證明是一種幻想，如果無產階

級在它朝向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與渾沌的「人民」概念斷然決裂，難道它不會（正是因為這種得來不易的獨立）完全孤立並陷入一場肯定是毫無希望的鬥爭裡頭嗎？假如對於民粹派農業理論的否定，對於農業共產主義殘餘必然消亡的認識同樣都不是辯證的，那麼對列寧的歷史觀點的這種常有而十分明顯的反對意見倒是站得住腳。這種消亡過程的辯證——因為辯證的理解永遠都只是一種真正辯證事實的概念形式——是在這些舊形式的消亡不可避免性上面，而就這些舊形式的消亡是一個消亡的過程，換句話說，僅僅是否定的這個範圍來說，它是只有一種明確的、一定的方向。它實際的方向絕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這一方向端視社會環境的演變，端視對整個歷史環境背景的評估而定。更具體地說：舊的農業形式在經濟上不可避免的消亡——包括大的和小的莊園——是按著兩條不同的道路進行的。列寧說：「這兩種解決辦法都按不同方式加速向更高的技術的過渡，都朝著耕作技術進步前進。」一條道路是從農民生活中掃清中世紀的和更早時期的全部習慣作風的殘餘。另一條道路——列寧稱之為普魯士的道路——「它的特點是，中世紀的土地占有關係不是一下子被消滅掉，而是慢慢地適應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都是可能的。與原先的情況相比較，二者在經濟上都是進步的。但是，如果二者都同樣可能而且從某種意義上都是同樣進步的，那麼，由什麼來決定二者之中的哪一種注定會變為現實呢？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像對其他問題的回答一樣，是明確而毫不含糊的：階段鬥爭。

這樣，有關要求無產階級獨立地起領導作用的這一基本形勢的概括，就變得日益尖銳而具體了。因為，在為俄國指出從中世紀向現代轉變這一方向的這場階級鬥爭中，**決定性的力量只能是無產階級。**農

民，不但由於他們文化上的極端落後，而且首先由於他們客觀的階級地位，只可能對他們越來越不堪忍受的狀況作出本能的反抗。由於他們客觀的階級地位，他們注定要在政治上成爲搖擺不定的階層——這個階級的命運最終要由都市的階級鬥爭、城鎮的命運、大工業以及國家機器來決定。

只有這種背景才把決定權交到無產階級手中。假如資產階級自身能夠成功地消滅農業的封建制度，那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一定的歷史時刻就不能有什麼指望了。沙皇制度使資產階級難以做到這一點，是資產階級暫時採取革命姿態，或至少是對立姿態的主要原因。但是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農村中千百萬受奴役的和極端窮困人口的自發暴動就隨時有可能發生：這是一種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爲它指出方向的自發暴動。只有無產階級能領導這種群眾運動達到使農民獲得實際利益的目標，從而創造出無產階級可望勝利地向沙皇制度展開鬥爭的這些條件。

因此，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爲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奠定了客觀基礎。它們的階級目的是不同的。正因爲如此，它們的力量，在諸如「人民」之類含混的民粹派概念名義下實現的天然結合，終將注定崩潰。然而，只有通過聯合的鬥爭，才能實現它們不同的目的。於是，舊民粹派的思想在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描述中經過辯證的改造又再提出來了。但僅僅只要革命的、有差別的「人民」概念——**一切被壓迫者的革命聯盟**——能夠從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具體理解裡發展出來，就必須否定含混的、抽象的「人民」概念。正是因爲如此，列寧的黨才可以正正當當地把自己看作是真正民粹主義革命傳統的繼承人。但是由於領導這場鬥爭的意識和能力——用客觀的階級術語說——**只存在於**

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才必須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成爲社會變革的領導階級。

---

- ①(第三三頁)拉薩爾、倍倍爾和施韋澤是德國一八七一年統一前時期德國重要的社會主義者。
- ②(第三三頁)拉薩爾主義者是拉薩爾的追隨者，形成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派別。他們相信可以通過國家援助的合作社和其他改良主義的手段來達到社會主義，而他們的對手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主張一個更富於戰鬥性的綱領。威廉·李卜克內西，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之父，是愛森納赫派的一個領導者。一八七五年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聯合組成社會民主黨。



## 第 3 章

#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

我們已經看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是既要從它與其他階級的全部意識形態的聯繫中解放出來，也要在它獨有的階級立場和由此而來的階級利益獨立性的基礎上確立它自身的階級意識。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反對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壓迫者的共同鬥爭中領導資產階級社會中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無產階級領導角色的客觀基礎，是它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內部的立場。但是，如果歸結說，正確——能夠跟無產階級領導角色相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沒有摩擦和挫折就能夠獨立地逐步發展出來，**好像無產階級能夠在意識形態上逐步地形成跟它的階級相稱的革命志業**，那麼這就是機械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因而也是一種完全不符合歷史的幻想。伯恩施坦的論戰，已經清楚證明，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不可能長入社會主義的。但是，它的意識形態的對應物卻沒遭到反駁，繼續存留在許多誠實的歐洲革命家的思想中，而且甚至沒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問題或一種危險。這並不是說，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完全忽視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不是說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取得最終勝利的道路是漫長的，而且要經歷許多失敗。在這條道路上，實際的挫折和意識形態上的倒退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知道——用羅莎·盧森堡的話說——由於社會的前提，不再會「過

早]地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就維繫政權(意識形態政權)而言，不管怎樣一定會「過早」地爆發。但是假如說(儘管有關於無產階級解放道路的這一歷史觀點)還有人認為，由理論健全的黨鼓動和宣傳所補充的群眾自生的革命自我教育(通過群眾行動和其他經歷)足以保證必要的發展的話，那麼確實就不能說已經克服了關於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逐步發展出它的革命志業這一觀念了。

列寧是第一位也是長時期來從理論的根本因而也是在決定性的、實踐的方面(即**組織的方面**)，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的唯一重要領袖和理論家。

一九〇三年在布魯塞爾(Brussels)—倫敦(London)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現在已是大家熟悉的了。它針對著是否只因為支持黨並且在黨的監督下工作(如孟什維克所想的)就有可能成為黨員呢，還是否黨員必須參加非法的活動，全心全意為黨工作，並遵守最嚴格的黨紀這一問題。關於組織的其他問題——比如說，集中制問題——只是這上述第二種列寧主義的觀點必然的技術性結論。

我們也只有提到關於革命的可能性、大致進程和特點的兩種基本不同態度之間的衝突，才能夠理解這場爭論，雖然在當時只有列寧看到所有的這些關聯。

布爾什維克關於黨組織的概念，內容包含從整個階級多少有些混亂的群眾中選擇一群準備作出任何犧牲的專業革命家。但是，這樣一來，豈不是存在著這些「職業革命家」脫離其現實的階級環境，從而發生分化、墮落為宗派的危險？這種黨的概念，不正是那些「聰明的」修正主義者宣稱他們甚至在馬克思身上都已發現過的這一布朗癸主義的

實際結果嗎？即使在談到布朗癸(Auguste Blanqui)本人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篇幅可以用來討論這一評論離題有多遠。它並沒有觸及列寧黨組織的概念核心，完全是因為如列寧所說，職業革命家團體就是一刻也沒有這樣的任務：或者是「創造」革命或者——靠他們獨立的、大膽的行動——驅趕遲鈍的群眾，使他們面對革命的**既成事實**。**列寧黨組織的概念是以革命的事實即現實性為前提的**。假如孟什維克的歷史預言是正確的，假如接著會有一個繁榮和民主遲緩進展的相對平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至少是在落後國家——「人民」的封建殘餘已被「進步的」階級掃除乾淨，那些職業革命家就必然會陷入宗派主義的困境，或者變成單純的宣傳俱樂部。黨，作為無產階級最有意識的份子的集中化組織——而只有以這樣的身份出現——**是被看成革命時期的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列寧說：「政治問題不能與組織問題機械地分開」，「任何人如果不考慮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接受或拒絕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那他就完全誤解了它。」

但是，從正好相反的觀點也能夠提出這樣的反對意見：正是革命的現實性才使這種組織變成多餘。在革命運動處於停頓時期，把職業革命家組織並結合起來也許有用。但是在革命本身的年代裏，如果深入地發動群眾，如果在幾周——甚至在幾天——之內群眾經歷了較多的革命經驗，變得比以前的數十年更為成熟，如果甚至連這個階級迄今仍在與他們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上拒絕跟該運動聯繫的那些部份的人也變得革命起來，那這種黨組織就是多餘，就沒有意義。它浪費必要的精力，而且如果它發揮影響力的話，也限制了群眾自發的革命創造性。

這種反對意見很明顯地又轉回到意識形態的發展逐步發展成社會

主義的那個問題。《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與整個階級之間的關係規定得很清楚。「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所以，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世界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鼓舞大家前進的一部份；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更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換句話說，他們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明確體現**。他們的組織問題是由他們關於這一方式的看法來決定，即按照這種方式無產階級將確實取得自己的階級意識，並且自己能夠掌握和充分占自己的階級意識。任何不是無條件地否認黨的革命作用的人都會承認，不管是經由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機械演變，或者是經由群眾自發性純粹有機成長，黨的革命作用都不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列寧的黨的概念跟其他人的概念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在他對無產階級內部不同的經濟上的細微差別(工人貴族的成長，等等)了解得比較深刻、比較透徹，另一方面主要是在我們已經概述過的新歷史觀點上，他有無產階級跟其他階級進行革命合作的遠見。無產階級在革命的準備和領導方面當然越來越重要，從而黨領導工人階級也當然越來越重要。

按照這種觀點來看，工人貴族的出現和越來越重要，是意味著特殊的工人階級團體直接的日常利益和整個工人階級的那些真實利益之間始終存在的——相對的——分歧是擴大了，並終於固定化了。通過強制拉平差別並把事實上被地域、行會等分割開來的工人階級統一起來才開始有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劃分形

式。這不僅意味著無產階級不再以團結一致的敵對態度面對資產階級，同時也產生了這樣的危險：這些團體能夠對達到小資產階級生活水準的整個階級產生反動的影響力，而且盤據黨內或工會官僚機構，而且有時是地方行政機關等等裡頭的職務，就使他們——儘管，或者說得明確一點，是因為他們越來越抱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缺乏成熟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正規教育和管理無產階級的其他部份人的經驗上占有一種優勢；換句話說，他們在無產階級組織中的影響，因此是有模糊所有工人的階級意識，並且引導工人走向跟資產階級實行心照不宣的聯盟的這種傾向。

理論的理解、有意識的革命團體所做的相對映的鼓動與宣傳，本身不足以對付這種危險。因為這些利益衝突本身是以長時間內工人都還無所知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就是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即使是工人自己的意識形態代言人有時也沒想到他們本身已經拋棄了整個階級的利益。因此，這些差別能夠很容易在「理論上的意見差別」和僅僅是「策略上的差別」的紅字標題下隱藏起來，使工人看不出來，而不時地在群眾偉大而自發的行動中爆發出來的那種工人的革命本能，這時就不能保持這種活躍的階級意識的自然高度，作為整個階級持久占有的東西。

這就使具有充分意識的份子的組織獨立性成為無產階級不可少的東西。正是這一點才證明了**列寧主義的組織形式是跟預見即將來臨的革命的能力有著不可分離的聯繫**。因為僅僅就此而論，每一種正確道路的偏向對無產階級才是致命的、有災難性的；僅僅就此而論，對於看來是日常瑣細問題所做的決定，對無產階級才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僅僅就此而論，無產階級具有確實跟自己面前明擺著的階級形勢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動，才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然而，革命的現實性也意味著社會的騷動——舊結構的瓦解——遠不限於無產階級，而是包括所有的階級。畢竟列寧不是說過嗎？「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才真正表明出現了革命形勢。「沒有全國性的（既觸動被剝削者又觸動剝削者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危機越深，革命就越有希望。但是，危機越深，它所涉及的社會階層也越多，盤根錯節的本能運動也越是多種多樣，以鬥爭最終決定整個結局的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越加混亂和可變。假如無產階級想要贏得這種鬥爭，就必須鼓動和支持有益於打碎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傾向，並盡最大努力將各種高潮——不論它們是多麼本能的或混亂的——爭取到整個革命過程之中。一個革命時期的迫近，也可以通過所有想聯合或至少跟無產階級接觸的不滿舊社會的份子得到預示。但正是這種情形會隨之帶來隱藏的危險。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組織起來使正確和適當的階級政策得到保證，那麼這些同盟者——在革命形勢中總是加倍增多——就會產生混亂，而不是支持。因為社會上其他被壓迫的那些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自然不會為跟無產階級相同的那些目的努力。工人階級倘若知道它所要的東西是什麼，它的階級利益所支配的是什麼，那麼它就能夠將自己和這些別的團體從社會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但是，如果黨這個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黨員代表，不確定這個階級應當採取的方向，如果它的無產階級性質甚至不能在制度上得到保護，那麼這些別的團體就會湧入它的內部，並使它偏離自己的道路。假如無產階級政黨對自己的階級組織有充分的把握，那麼有益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聯盟反倒會是黨最大的危險。

因此，列寧的黨組織思想包含可說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因素：根據

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盡量嚴格地挑選黨員，以及全面聯合並支持資本主義社會內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者。這樣，他辯證地把目的的單一性與普遍性(即嚴格地按照無產階級的角度來說的革命領導和無產階級一般的民族及國際特性)統一起來。孟什維克的黨組織概念把這些因素削弱了，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使它們變成折衷物，因此在黨自身的內部把它們統一起來。孟什維克使自己與被剝削群眾(比如，與農民)的主要階層隔離開來，而把利益極不一致的團體聯合在黨內，因此使思想和行動無法協調一致。在階級鬥爭混戰時——因為一切革命時期都以深入激盪人心的、整個社會的混亂狀態為特徵的——不協助建立對於勝利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統一體，並且把其他搖擺不定的被壓迫團體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這樣組織起來的黨就變成是一種不同利益團體的糾結。只有通過內部的妥協，黨才能確實設法採取任何一種行動，而且即使在那時候，黨也或者要尾隨在它內部更聰明或更具本能的團體的後面走，或者不能不矜足觀望悲慘的重大事件發生。

因此，列寧的組織概念意味著，**跟機械的宿命論進行雙重決裂：**既跟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看作是其階級形勢的機械產物的觀念決裂，又跟這種看法決裂，即認為革命本身只是注定要爆發——假如客觀的革命條件完全「成熟」——在各方面「自動地」促成無產階級勝利的經濟力量的機械作用。如果各種重大事件一定都得等無產階級統一起來並且清楚地參加這一決定性的鬥爭，那就永遠不會有革命的形勢。一方面，總會有消極旁觀並觀望他們本階級的解放鬥爭，甚至投誠到另一邊的無產階級階層——越是這樣，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在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本身的態度、它的果敢和階級意識的程度，絕不是注定

不可避免地要從它的經濟形勢中產生出來的。

當然，即使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大、最好的黨，也不能「創造」一種革命。但是，無產階級對於一定形勢的反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有能力針對它的階級目的提出這項理解，並付出心力。**當革命是一種現實性時，那麼革命是不是能夠加以「創造」的問題，就取得了一種全新的意義。**這種已經變化了的意義就會使黨與階級之間的關係產生變化，使黨和整個無產階級的組織問題的意義產生變化。關於「創造」革命這一問題，老舊的提法是以歷史必然性與相關的黨的活動之間固定的、非辯證的劃分為基礎的。從「創造」革命就意味著是無中生有，把革命用魔法變出來這角度來說，就必須完全拒絕這一提法。但是，黨在革命時期的活動是指根本不同的東西。如果時代的基本特點是革命的，那麼尖銳的革命形勢任何時刻都會爆出來。確實的時間和環境總是難以精確規定的。不過，導致革命的趨勢和在革命開始時採取正確行動進程的基本路線，因此越發可以加以確定。黨的活動是以這種歷史的理解為基礎的。**黨必須準備革命。**換言之，它一方面必須試圖以行動加緊促使這些革命趨勢成熟（通過它對無產階級和其它被壓迫團體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必須使無產階級對在尖銳的革命形勢中必然產生的思想、策略、物質和組織任務作好準備。

這也把黨組織這一固有的問題擺在一個新的思考角度上了。考茨基等人主張的老舊的觀念以為：組織是革命行動的**前提**。羅莎·盧森堡所主張的認為，組織是革命群眾運動的**產物**。這兩種看法顯然都是片面的，非辯證的。因為正是黨準備革命的作用，才使組織同時而且同樣既是**生產者**又是**產物**，既是革命群眾運動的**前提**又是**結果**。因為黨的自覺活動是以清楚地認識經濟過程的客觀必然性為基礎的；它嚴



格的組織獨特性是在於與群眾本能的鬥爭和苦難始終維持有成效的互動關係。羅莎·盧森堡有時近乎激賞這種相互作用的成份，但她忽視了其中的**自覺和能動的成份**。正因為如此，她不能理解列寧主義黨概念極其重要的要點——黨的準備角色——而且正是因為如此，總的來說她就不能不誤解隨之而來的全部組織原則了。

革命形勢本身自然不是黨活動的產物。黨的角色是預見客觀經濟力量採取什麼方向，預示工人階級合適的行動方式是在那裡經得起這樣產生出來的形勢的考驗。與這種高瞻遠矚相一致的是，它也必須盡可能地使無產階級群眾在知識上、物質上和組織上對擺在他們眼前的東西和跟黨相關的他們的利益做好準備。然而，實際的事件本身和隨之出現的形勢，是本身盲目地並按照自己自然規律產生作用的資本主義生產這些經濟力量的產物——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按照機械主義宿命論產生作用。例如俄國農業封建制度的經濟衰敗已經向我們表明，這個衰敗的過程本身如何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從階級的角度來說，它的作用——從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新的階級聯盟——決不是完全取決於這種孤立的發展或者因而只是從這種孤立的發展就可以加以決定。它們是受到它們的環境制約的；歸根到底，是受到整個社會（它的各部份構成了這種發展）的命運制約的。但在這種總體裡頭，自發地爆發出來和從意識上領導的階級行動起著決定作用。而且，社會越是動盪不安，它的「正常」結構越是完全不能發揮作用，它的社會經濟穩定性越是受到動搖——換言之，形勢越是革命——他們的角色就越是具有決定性。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的整個發展決不是沿著簡單的、直線的路線走的。形勢往往是由整個社會各種力量的結合所造成的，其中特殊傾向本身就能夠成爲一種形勢——如

果形勢得到正確的認識並相應地得到了正確評價的話。但如果錯失了這種機會，沒有引出正確的結論，看來要往特定方向前進的各種經濟力量的發展，就決不會以不可改變的姿態往前繼續前進，而總是以跟它截然相反的方面變化。（假如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沒取得政權，完成土地革命，想想看俄國的形勢。在一個反革命但比革命前的沙皇制度較為現代化的資本主義政權下，以「普魯士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便不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了。）

只有具有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行動的這一歷史背景的知識，才能真正理解到黨組織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取決於資本主義衰落時期，放在無產階級面前的巨大的、世界史的任務，取決於這些任務放在無產階級自覺的領袖肩上的巨大的、世界史的職責。因為黨根據社會總體的知識呈現著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並由此呈現著所有被壓迫者的利益、呈現著人類的未來），所以它就必須在它內部把所有矛盾（其中從這社會總體性深處產生出來的任務表現出來了）都統一起來。我們已經強調過，必須把按照對階級意識的瞭解、對革命事業無條件的奉獻來嚴格地挑選黨員這件事，跟黨員本身同樣能夠完全投入正在進行鬥爭和遭受苦難的群眾生活中的這項能力配合在一起。沒有取得其必然成果就想滿足這些要求的前一項的一切努力，必定會因為宗派主義而化為泡影。（這是列寧領導進行反對從召回派 Otzovism ①到共產主義工人黨 ②等「左派」以及除此之外的一些人的這一鬥爭的基礎）。因為對黨員的要求嚴格，只是讓整個無產階級（以及所有被資本主義剝削的階層）清楚地看到他們真正利益之所在，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迄今未意識到的行動、模糊思想和混亂感覺的這種真實基礎的一種方式。

但是群眾只有通過行動才能學到；他們只有通過鬥爭——一種

社會經濟基礎經常改變，因而**條件和武器也經常改變的鬥爭**——才能認識到自己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只有在它**總是比鬥爭中的群眾先走一步**，為群眾指明道路時，才能在這種衝突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這是為了始終能夠保持不變，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者**，才能先走一步。因此，它的理論理解只有當它不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不停留在單純從理論上看來理論是正確的這上面，而是在具體形勢的具體分析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換言之，在理論的正確性只是表達對於具體形勢的見識時，才是有價值的。因此，為了防止群眾有任何的動搖，即使冒著暫時孤立的危險，黨一方面也必須對理論足夠理解、足夠堅定，以便堅持正確的方向，另一方面，黨也必須有彈性而且能夠向群眾學習，才能從群眾的每一種表現(不管是多麼混亂)中指出群眾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革命可能性。

對群眾生活的這種調適，**如果沒有極其嚴格的黨的紀律是不可能的**。如果黨不能立即調整它對不斷變化的形勢的認識，它就會落後，就不是領導而是隨波逐流，就會失去與群眾的聯繫並陷於分裂。因此，黨組織就必須極為嚴格和精確地運轉，以便在必要時立即把這種調整付諸實施。但是同時，這意味著彈性的要求也必須不斷地運用於黨組織本身。在一定形勢中對一定目的有用的組織形式，當鬥爭條件發生變化時，會變成是一種障礙。

因為歷史的本質就在於不斷地創造**新事物**。這種新事物是不能借助任何一貫正確的理論預見到的。它必須通過鬥爭，從它最初出現的萌芽清楚地辨別出來，並且清楚地加以認識。黨的責任決不是在把任何一種抽象的、挖空心思設計出來的策略強加在群眾身上。相反地，黨必須不斷地向群眾的鬥爭和群眾鬥爭的方法學習。但在它學習的時

候必須保持主動，爲下一次的革命行動作好準備。黨必須把群眾從其正確的階級本能產生出來的自發的發現，跟革命鬥爭的總體統一起來，並讓他們意識到。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爲要不僅維繫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的連續性，而且也要自覺、主動地促進這些經驗進一步的發展，黨就必須向群眾解釋他們自身的行動。黨組織必須使自己既適合作爲這種認識的總體的工具，也適合作爲從這種總體產生出來的行動的工具。如果它不能做到這一點，它就會破壞它尚未理解因而也無法控制的發展。所以，一切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組織上的僵化對黨都是有害的。因爲正如列寧所說：「任何一種新的鬥爭形式，都會遇到新的危險，遭到新的犧牲，因而不免會使對這種新的鬥爭形式準備不足的組織受到『破壞』。黨的任務就是公開地和自覺地——首先是對自身而言——尋求它的必然途徑，以便可以在破壞的危險變成現實以前改造自身，並通過這種改造促進群眾的改造和前進。」

策略和組織只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的兩個方面。只有兩方面一起才能取得實際的結果。爲此，黨在頑強堅持它的原則時必須既始終如一又有彈性，同時看清楚每一個新的日常發展。無論就策略上或組織上而言，本身都沒有所謂的好壞。只有它跟整體的關係，跟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關係，才使一種思想、一種政策決定等等，有正確或錯誤之分。正是因爲如此，比如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後，列寧才會無情地反對那些想放棄所謂無用和宗派主義的非法活動的人，也才會無情地反對那些無條件地爲非法活動獻身、否認有進行合法活動可能性的人；正是因爲如此，他對那些向議會主義投降和在原則上反對議會主義的人才同樣憤慨，打從心眼裡就瞧不起。

列寧不但從來都沒有變成政治上的烏托邦主義者，而且對他周圍

的人物也從來都沒有抱過任何幻想。在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個冒險時期，他說，「我們要與那些人一起建設社會主義，他們雖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培植起來的，受過扭曲和腐蝕，但也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經受了戰鬥鑄煉。」列寧黨組織的概念對職業革命家異常的要求，本身並不是烏托邦，自然跟普通生活、當下的事實、單純經驗的表面現象也都沒有任何關聯。列寧的組織概念本身是辯證的：就它**同時也是自身的產物和生產者**這個範圍而言，它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有意識的促進者。人本身創造了一個黨，想要而且能夠在一個黨組織內工作，就要有高度的階級意識和獻身精神。然而，只有經過這樣組織起來，通過黨而工作，人才能變成真正的職業革命家。參加革命階級的個別雅克賓(Jacobin)派成員，通過他的決心、戰鬥性、知識和熱情，賦予了階級形式的行動與理解。但是，這個階級的社會存在和它由此產生的階級意識，必定總是決定著他行動的內容和方向。這些行動不是他代表該階級的行動，而是階級活動本身的極致。

接受請求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因此不是現成的就可以面對著它的領導志業的：**它現在也不是可以面對，而是以後才變成可以面對。**而且黨與階級之間富有成果的互動過程，在黨和它的成員之間的關係中也是在——儘管是不同地——不斷地重演著。因為正如馬克思在他關於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提綱中所說：「有一種唯物主義的學說涉及環境和教育的改變，却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列寧主義黨的概念是跟馬克思主義機械論的和宿命論的庸俗化所做的最徹底的決裂。它是馬克思主義真正本質和最深含義的實際表現：「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①(第五〇頁)召回派(Otzovists)，也被稱為「抵制主義者」(Boycotters)，屬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的一段時期，他們反對在合法組織——如工會、合作社等——內工作，要求從議會召回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反動時期黨只應該從事非法工作。
- ②(第五〇頁)KAP(共產主義勞動黨——〔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在策略上與德國共產黨(KPD)發生分裂後，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KAP主張「直接」行動，指責KPD的議會主義和被動的領導。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第五章評論了這一分化。

## 第 4 章

# 帝國主義：世界戰爭與國內戰爭

但是我們是否已進入決定性的革命鬥爭時期了呢？無產階級因為害怕自己遭到毀滅，被迫接受它改變世界的任務這一時刻是否已經到來了呢？因為可以看得出來，即使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思想或組織，也不能造成這樣一種危機，除非這種成熟性和戰鬥力是自身要求解決的這一客觀世界社會經濟形勢的結果。任何一個簡單孤立的事件，不論它是勝利還是失敗，也都不可能決定這一點。我們甚至於不可能說這樣一個事件是勝利還是失敗的；只有涉及到社會歷史的總體，才能以一種世界歷史的意義把一個重大事件說成是勝利還是失敗。

正是因為如此，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派（當時包括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內關於要跟一八四七年（決定性的革命之前）相互比較或跟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之後）相互比較的這一問題的爭論——這場爭論在第一次革命時爆發出來，在革命失敗後達到高潮——範圍必然會超出狹隘意義上的這一俄國的問題。這一點只有當我們時代基本性質的問題得到確定，才能加以確定。有關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以及由工人們所採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這個狹隘的、特殊的俄國問題，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才能夠得到解答。自然，這麼有力的把問題提出來，就說明我們要在什麼方向

尋找答案。因為在俄國以外的地方，工人運動中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分野，也日益開始採取有關我們時代的一般性質是什麼的一種討論的形式。這場討論是有關：特殊的、日益明顯的經濟現象（資本的集中、大銀行越來越重要、殖民地化）是否僅僅標誌著「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內部的量的變化，或者，是否能夠從這些現象中推論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時期——正在迫近？越來越頻繁地在一段相對和平時期之後發生的戰爭（布爾戰爭 Boer War、西美戰爭、俄日戰爭），是否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偶然事件」或「插曲」？或者是否我們在這些戰爭裡頭看到了規模越來越大的戰爭時期的初步迹象？最後——如果這都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級——在新的條件中是否無產階級鬥爭的舊形式能夠充分地表達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因此，那些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之前或革命當中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形式（群眾罷工、武裝起義），是否只是具有地方性特殊意義——甚至是「錯誤」或「脫離正軌」——的現象？或者，我們是否應當把它們看作是群眾憑著正確的階級本能來調整自己的行動，以適合世界形勢的初步自發的嘗試？

列寧對這些相互關聯的一系列問題所做的實事求是的回答，是人們所熟悉的。他的回答正是在第一次革命遭到失敗之後，正當孟什維克對俄國工人們「走得太遠了」的錯誤發出哀號之聲尚未消失之時，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列寧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Stuttgart Congress）上開始展開鬥爭，使第二國際採取明確而強有力的立場，以對抗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直接威脅的危險，並且提出這個問題：**要採取什麼行動來制止這種戰爭？**

列寧—羅莎·盧森堡修正案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獲得接受，隨



後又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塞爾(Basle)代表會議上獲得批准。世界戰爭臨近的危險和無產階級要進行革命鬥爭來制止它的這一必要性，於是得到第二國際正式的承認。這樣，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的主張就顯然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才在經濟上把帝國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第二國際中的整個左派，甚至中間派和右派的許多成員，都認識到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希法亭試圖提出有關這些新現象的新經濟理論，羅莎·盧森堡走得甚至更遠，她成功地把帝國主義的整個經濟體系表述為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種必然的結果——即有機地把帝國主義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因而賦予「資本主義崩潰理論」一個具體的經濟基礎。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和隨後的一段長時間內，對戰爭有自己看法的列寧十分孤立，這種孤立絕不是偶然。認為說，原先對帝國主義作過同樣「正確」評價的其他許多人現在或許因為「膽怯」而變得躊躇起來，這是難從心理上或道德上得到解釋的。不是這樣，**一九一四年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不同態度，是他們到那時為止的理論、策略和其他立場直接的、實際的結果。**

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概念一方面是一種重大的理論成就，同時另一方面作為經濟理論卻包含很少真正新鮮的東西，看來是很奇怪。它部份是以希法亭的思想為基礎，但純粹作為經濟理論，在深度和出色的程度上是不能跟羅莎·盧森堡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所做的漂亮引申相比。列寧的過人之處——而且這是無與倫比的理論成就——在於他把帝國主義的經濟理論與目前時代的各種政治問題具體地結合起來，從而使這個新階段的經濟學成為這種關鍵場合中的一切具體行動的準則。正是因為如此，比如說，在戰爭期間他才駁斥某些波蘭共產主義者的極左觀點，把它說成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也

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反對考茨基的「極端的帝國主義」<sup>②</sup>概念（這是一種理論，希望建立一種和平的國際信任，對這種理論來說，世界戰爭是一種「意外的」，甚至不是「正確的」道路），最後昇高到指責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經濟學跟它的政治學割裂開來。確實，羅莎·盧森堡（以及潘涅庫克 Anton Pannekoek <sup>③</sup> 和其他左派）的帝國主義理論，以狹隘的、原來的意義來說，未受到經濟主義的損害。他們所有人——特別是羅莎·盧森堡——剛好都強調帝國主義的經濟學裡頭必定向政治學（殖民地化、軍火工業等）轉化的這一契機。但是這種聯繫並不具體。也就是說，羅莎·盧森堡卓越地證明，由於積累的過程，帝國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原料和資本輸出的可能性等鬥爭的時期，已經不可避免的到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必定是一個世界戰爭的時期。然而，在這樣考察當中她只建立有關這整個時期的理論——尤其是現代帝國主義的理論。她也無法看出從這種理論到當代具體要求的這一轉化：要把《資本的積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與《雅努斯手冊》（*Juniusbroschüre*）<sup>④</sup>的具體章節聯繫起來的必然連續建立起來是不可能的。她對整個時代從理論上所做的正確評估，沒有具體闡明為對那些具體變化的動力所做的清楚認識，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加以評估並且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實際任務。

但是，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過人之處，無論如何無法用「政治上的天才」或「實踐上的機智」一類的陳詞濫調來解釋清楚。這其實是在整個過程評估當中的純粹理論上的過人之處。因為列寧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作出的實際決定，無一不是他的理論觀點的合理的和合乎邏輯的成果。這種觀點的基本原理是要求對具體形勢做具體分析，這一點只有在那

些不辯證思考的人的眼裡才變成是一個**現實政治**——實際——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並不是「純」理論的對立物；相反地，這是**道道地地的理論最精彩的部份**，是理論在現實中實現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論在實踐中產生轉變的所在。

這種理論的優越性是在這裡：在馬克思所有的追隨者中，列寧的眼光是最少受到其資本主義環境的拜物教範疇所矇蔽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超出其所有先驅和後繼者的重要優越性，是在於它處在顯然必須以最純粹的經濟（因此，也是最純粹的拜物教）範疇來處理的這些最複雜的問題當中，卻能夠從方法上對這一問題取得這種理解，因而在這些**純粹經濟範疇**的後面那些發展過程中的階級——這些經濟範疇所表現的社會存在——就變得明顯可見了。（試思考一下跟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古典的劃分相反的那種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間的劃分。通過這種劃分，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就顯露出來了。馬克思主義對剩餘價值的解釋已經揭露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層化。不變資本的附加概念表明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能動聯繫的這些關係，同時，也揭露了不同的資本家利益集團為瓜分剩餘價值而展開的鬥爭。）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不像羅莎·盧森堡的理論，他的這一理論比較上不是關於帝國主義必然的經濟生殖和限制的理論，而是關於具體的階級力量的理論，即關於通過帝國主義策動在帝國主義內部產生作用的這些階級力量的理論：**也就是關於通過帝國主義而產生出來的具體世界形勢的理論**。列寧在研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時，首先使他感興趣的，就是這種具體世界形勢以及它所產生出來的階級層化：世界事實上是怎麼通過殖民勢力來瓜分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內在的階

級層化是怎麼通過資本的集中產生變化的(純粹寄生**食利者**、工人貴族等等)。而最首要的是，因為每個國家的速度不一致，壟斷資本主義內在的運動又怎麼使得「不同利益範圍」的暫時和平分配和其他妥協失去效力，而驅使它走向只有通過武力——換言之，通過戰爭——才能解決的衝突中。

因為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它的戰爭是朝著更大規模的集中和絕對壟斷的這種傾向的必然發展和表現，在社會層化跟戰爭的關係裡頭，社會的這一層化就很清楚了。按照考茨基的方式來看，以為能夠動員對帝國主義「並沒有直接感到興趣」，甚至受到帝國主義「欺騙」的資產階級各部份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本身表明這種觀念是一種幼稚的幻想。壟斷的發展完全控制住整個資產階級，甚至不僅在本來本身已經總是搖擺不定的小資產階級中而且也還在(但是暫時地)無產階級的各部份中得到幫助。但是，假如半信半疑的人以為，由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毫不留情地反對帝國主義，它就會在社會上陷於孤立地位，這就錯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是充滿矛盾，總是處在運動著的對立當中。壟斷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本來的意義創立了一種世界經濟。可見，它的戰爭，帝國主義戰爭，是世界戰爭這個詞語最精確意義來說的第一次世界戰爭。首先，這意味著被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各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不再是孤立地與壓迫他們的人作戰，而是整個被捲進世界戰爭的大漩渦中。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不像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那樣以乾脆掠奪的方式來剝削殖民地人民，而是**同時既改變他們的社會結構，又使他們資本主義化**。自然，為了更大剝削(資本輸出，等等)而發生的這些事情也會有這一後果——自然對帝國主義來說，是在完全沒料想到的方式下——這一後果就是：獨特

的資產階級的發展在殖民地的開拓工作被打斷了，例如，像**開始進行民族獨立鬥爭**的這樣一種必然的意識形態後果。這整個過程還在進一步加強，因為帝國主義戰爭一面動員帝國主義國家內一切可用的人類資源，一面同時把殖民地的人民積極地拉入戰鬥，並加速他們的工業發展；它是既從經濟上也從意識形態上加速了這一過程。

但是，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僅只是壟斷資本主義跟對他們進行的剝削這之間關係的一種極端形式。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歷史轉變從來不是機械的；不是機械的，這是說，不是被一個生產方式取代了它特有的生產方式的前一個生產方式已經到處完成了歷史變革的任務後，接下來的那一個生產方式才能登場，才能起著歷史的作用。互相交替的生產方式跟與之相應的社會形態和階級層化，在歷史上往往是以交互的方式和以使對方不利的方式登場。正是這樣，從抽象的角度觀之，看來彼此都一樣的發展（例如，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因為是在整個已經完全改變的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因此才取得了跟社會歷史整體完全不同的關係，而且因而也才在它們本身擁有全新的作用和意義。

竄升起來的資本主義是以締造國家的因素這一姿態登場的。在深刻的革命鬥爭之後，它在一些大的國家裡把中世紀小規模的封建政體混亂的狀態，轉變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部份。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客觀上是這些革命鬥爭中的最後部份。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裡繼續發展為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如果它甚至在某些較為落後的國家（俄國，日本）也開始採取這種形式，那並不意味著它對於整個世界其餘地區不具有締造國家的意義。相反，**不斷往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所有迄今「沒有歷史的」民族中創造了建國的運動。**

只不過他們進行的「為民族解放的鬥爭」本身現在不只是以反對內部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這一方式進行(那是說,是隱約的往前推進),它們本身必然也是回應世界強國帝國主義競爭的這一歷史環境。它們的歷史意義,它們的價值,因此取決於它們在這個具體整體中起著什麼具體作用。

這一問題的意義馬克思已經認識得非常清楚。在他那個時代無疑主要是英國的問題:英格蘭(England)與愛爾蘭(Ireland)的關係這一問題。馬克思大力強調,「撇開國際正義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改變目前的強制聯合,——換言之,對愛爾蘭的奴役——是英國工人階級解放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可能的話,就形成平等的自由的聯盟,或者,如果必要,就完全分離。」因為他已經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對愛爾蘭的剝削是已經具有壟斷特徵的(當時還是唯一的)英國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堡壘,另一方面,英國工人階級在這個問題上的含糊態度,分裂了被壓迫者,激起了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而不是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剝削者的鬥爭。因此,只有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鬥爭才能在英國無產階級反對英國自身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創造一個真正產生作用的戰線。

馬克思的這個看法不但在當代英國工人運動內部一直未能產生作用,就是在第二國際的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也始終未能有生命的活力。在這個問題上,使理論恢復新的生命活力——一種甚至比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更生氣勃勃的、更具體的生命活力的任務——也就留給列寧來處理。因為它已經從一個單純的世界史的現實變成了一個日常生活的問題,而且與此相適應的,列寧不再持著理論的態度,而是持著純粹實踐的態度。因為,就此而論,每一個人一定都知道,在這裡呈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整個重大的問題——全世界範圍內所有被壓迫者而不僅是工人的造反——是這同一個問題，即列寧始終堅持宣稱是俄國土地問題(反對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主義者)核心的這一個問題。在全部這些情況中牽涉到的，就是羅莎·盧森堡稱之為資本主義「外部」市場的東西，對於這點是要理解非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否它是位於政治疆界的內部還是外部這都一樣。一方面，擴張開來的資本主義沒有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對於這一市場資本主義的社會作用是在於打破其原始的社會結構，使它成為資本主義的，把它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內部」市場，從而又取得它自己的獨立趨向。所以這裡的關係也是辯證的。只是羅莎·盧森堡沒有從這個正確的、廣濶的歷史思考角度找到具體解決由世界戰爭所引起的這些具體問題的途徑。她堅持了一種歷史的思考角度、一種正確的而且出色的關於整個時代的描繪。只不過這一時代是以整體的姿態出現的。而只有列寧才有能力踏出從理論到實踐的這一步；這一步同時也是——這一點永遠不應當忘記——一種理論上的前進。因為它是從抽象到具體的一步。

從關於實際歷史現實抽象的正確評估，從被證實的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一般革命特徵到具體的這一轉變，最後越來越把問題集中在革命的特殊性質上面。馬克思最偉大的理論成就之一，就是清楚地區別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這種區別，由他同時代人不成熟的自欺這一角度來看，是具有極大的實踐和策略上的重要性。因為它為在那個時代一般的革命運動內部認識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份子提供了唯一的方法論工具。然而，在庸俗的馬克思主義那裡，這種區別就淪為一種機械的區別。對於機會主義者來說，這種區別的實際效果就是概

括性地綜合了經驗上正確的這一觀察：實際上近代的每次革命都是以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開始的，然而許多無產階級的行動和要求可以從裡頭產生出來。機會主義者由此得出結論，革命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支持**這種**革命。由於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這種區別，使得**無產階級放棄了它自己革命的階級目的**。

可是輕而易舉地看穿了這種理論的機械論謬誤，並意識到是時的無產階級革命性質的這一激進的左派分析，却反過來也接受同樣危險的機械論解釋。鑒於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普遍的革命作用既已終結，於是就認為——也是從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機械論的區別出發——**我們現在最終進入了純粹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種態度實際危險後果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必然發生的所有那些導致瓦解、發酵的趨向（農民的、殖民地的和民族的問題等等），雖然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背景中客觀上是革命的**，可是也被忽視，甚至看輕和斷然否定了。這些純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們，自願拒絕他們最有力、最重要的同盟者；他們正好忽視使得無產階級革命從具體上來說是有機會、有希望的那種革命環境，而憑空認為，他們正在準備一次「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列寧說：「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誰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因為，現實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辯證的轉變。過去偉大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或受益者，客觀上變成了反革命，這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並不意味著，革命涉及到的那些客觀問題已經找到它們的社會解決方法——即與通過革命解決這些問題利害攸關的那些社會階層已經得到了滿足。相反地，資產階級仰賴反革命，不僅表明它敵視無產階級，同時也表明它背棄自身的革命傳統。它把自



已過去的革命遺產丟給了無產階級。從現在起無產階級是唯一有能力把資產階級革命推向其邏輯結論的階級。換言之，資產階級革命遺留下來的重大要求，只能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架構內部實現，而這些要求連貫地得到實現，就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於是，無產階級革命現在意味著同時實現和揚棄資產階級革命。

對這種形勢的正確評估，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與可能性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但是同時，它對革命無產階級和領導它的黨也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因為要達到這種辯證的轉變，無產階級不但必須正確地洞察適當的歷史環境，而且也必須實際克服它自身所有迄今阻礙這種洞察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和思想習慣（譬如，民族偏見）。**無產階級必須克服它自身的局限，上升為一切被壓迫者的領導者。**被壓迫民族為民族獨立的鬥爭，對於壓迫別人的那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和被人壓迫的那個民族的無產階級來說都是一種最偉大的革命自我教育的事業，前者通過為別的民族的充分民族獨立進行鬥爭，克服它自身的民族主義；後者通過提出相應的聯邦制——國際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超越它自身的民族主義。因為正如列寧所說，「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並反對自身的弱點。」為革命而進行鬥爭，利用世界形勢中的客觀機會，和無產階級為它自身革命階級意識的成熟而進行國內鬥爭，都是同一個辯證過程的不可分離的因素。

因此，**如果說無產階級展開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話**，那麼帝國主義戰爭是處處在為無產階級創造盟友。但是，如果無產階級一直意識不到自己的地位和面臨的任務，那麼戰爭就會迫使無產階級步著資產階級的後塵災情慘重自取滅亡。帝國主義戰爭創造了一種世界形勢，使無產階級能夠成為被壓迫、被剝削者的真正領導，使它的解放

鬥爭能夠成爲所有那些被資本主義統治的人們解放的信號和路標。但是同時，它也創造了一種世界形勢，使千百萬的無產者必須以最刻毒的殘酷手法來互相殘殺，以便加強和擴大剝削他們的人的壟斷權。這兩種命運，無產階級究竟要接受那一種，**取決於它對自身歷史狀況的洞察——取決於它的階級意識。**因爲「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雖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所以可供選擇的，**不是是否無產階級願意或者不願意鬥爭，而是它應當爲著誰的利益鬥爭：**是爲自身的還是爲資產階級的。歷史擺在無產階級面前的問題，**不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用戰爭——國內戰爭——反對這種戰爭之間做出選擇。**

在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像無產階級所有的鬥爭形式一樣，是由於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強加於無產階級身上的這些鬥爭條件，才使國內戰爭有其必要性。黨的活動和正確的理論預見，只是賦予無產階級一種抵抗或攻擊的力量，由於存在著階級聯盟，無產階級已經客觀地具有這種力量，但由於理論上或組織上的不成熟性，所以它才不能提升到擺在它面前的這些可能性的水平。因此，還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前，群眾性的罷工就作爲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這一自發反應出現了，而第二國際的右派和中派竭力加以掩蓋的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就逐漸變成爲激進派共同的理論財富了。

但是在這裡也一樣，只有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才認識到，群眾罷工對於決定性的鬥爭是一種不充足的武器。通過把莫斯科起義(Moscow Uprising)——儘管它失敗了——評價爲鬥爭中一個極其重要的

階段，通過試圖確立它的具體成份，列寧跟普列漢諾夫認為「本來不應該採用武力」的觀點相反，他已經從理論上奠定了無產階級在世界戰爭中的必要策略。因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特別因為它在世界戰爭中達到頂點，表明資本主義進入了決定其存在命運的關鍵階段。它憑藉著統治階級慣有的正確本能意識到，隨著它的統治程度的提高和權力機器的加強，它的權威的真正社會基礎正在縮小，於是便盡最大努力既擴展這種基礎（在它背後有中產階級的結盟、工人貴族的腐化，等等），又在它的主要敵人組織起來實行真正的反抗以前，果決地擊垮它們。因此，基於暫時性的考慮（即使整個修正主義的理論也是建立在這一非常有問題的作用上），到處消滅進行階級鬥爭的「和平」手段的，寧願選擇「更有力的」武器（只需考慮一下美國的情況⑤）的，正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日益成功地控制國家機器，自己日益成功地跟國家機器完美地合為一體，因而即使表面上看來只是經濟的那些工人階級的要求，也日益被這種國家機器所封鎖。因此，只要是要防止工人經濟條件的惡化和失掉既得的有力地位，工人們就不能不進行反對國家權力的鬥爭（換言之，採取雖是無意識地卻是奪取國家權力的鬥爭）。這就迫使無產階級運用群眾罷工的策略，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由於害怕革命，機會主義者總是寧願放棄已經獲得的地位，而不願根據形勢引出革命的結論。但是群眾罷工就其真正性質來說，是一種客觀的革命武器。每一次群眾罷工都創造一種革命的形勢，在這種革命形勢中得到國家機器支持的資產階級只要有可能就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對付罷工。無產階級沒有能力反對這種措施。如果無產階級面對資產階級的武裝不也武裝起來的話，群眾罷工的武器在這些措施面前也注定要失敗。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必須試圖把自己裝備起來，瓦解資產階級的軍

隊——這種軍隊當然主要是由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把資產階級的武器轉過頭來對付資產階級（在這方面，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提供了許多恰當的階級本能的例子，但也只是本能的例子而已。）

帝國主義戰爭意味著這種形勢尖銳化到極點。資產階級使無產階級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或者爲了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殘殺其他國家的階級兄弟，並爲這種利益奉獻生命；或者通過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除此之外，所有反對這種大規模屠殺的鬥爭方法都是無濟於事；都會毫無例外地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機器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如果無產階級想避免這場最後的屠殺，就必須把自己武裝起來，反對這個機器，從內部削弱它的基礎，把資產階級不得不發給人民的武器調過頭來反對資產階級自身，並且利用這些武器來摧毀帝國主義。

所以這裡也一樣，在理論上講也是毫無先例的。相反地，形勢的核心就在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關係。戰爭，正如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定義的，只是政治的延續；但在**一切方面**都是這樣。換言之，不僅僅就國際事務而論，戰爭只不過是一個國家到目前爲止「和平」地奉行著的一種政策的最終和最積極的頂點。一個國家的內部階級關係（乃至整個世界的）也是這樣，它只是表明在「和平時期」社會內部已經在起作用的那些傾向增強和達到最高點。因此無論對於一個國家，還是對於一個國家內的階級來說，戰爭都絕不是在創造一種完全新的形勢。所謂新，只是說所有問題空前的量的增長包含著質的變化，而且就這一緣故——也只是這一緣故——才創造了一種新形勢。

所以，從社會—經濟的意義上看，戰爭只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因此也只是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中的一個必要階段。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是重要的，因為只有列寧以理論上的一貫性，建立了世界戰爭與整體歷史發展之間的這種關係，並以戰爭產生的具體問題為基礎作了清楚的證明。但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理論，**假如帝國主義的理論沒有同時成為帝國主義時代的工人運動內部不同流派所共有的一種理論**，這種關係的確立就會仍然是不完全的。這不僅是一個在由戰爭造成的新的世界形勢中清楚地看到什麼樣的行動符合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在理論上證明其他「無產階級」對待帝國主義及其戰爭的態度有沒有根據的問題——無產階級內什麼樣的社會變更，會使這些理論獲得足夠的追隨者而成為政治流派。

首先，必須指出，這些不同的流派本身確實是存在着的；必須指出，社會民主黨人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一時脫軌或胆怯的結果，而是他們不久前的一個必然結果，必須指出，**這是在工人運動史的前後關係中取得理解的**，並把它與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等等）內原先的「意見分歧」相聯繫起來。然而，儘管這種思想本應自然地取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見《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同時代各種流派的論述），它也還只是艱難地深入到了這場運動中革命的一派。因為連羅莎·盧森堡—梅林（Franz Mehring）的**國際團體**①也未能徹底思索和堅持一貫地應用它。但是顯然，機會主義的任何譴責以及未能把它解釋為工人運動中一種可以得到歷史承認的流派，未能把它目前的存在看成為它過去有機發展的成果的這一對待戰爭的態度，是既沒有達到一種真正有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討論的水平，也沒有從譴責中得出實踐—具體的和策略—組織的結論，而這卻是行動時機到來時必要取得的。

列寧，而且還是只有列寧，才從世界戰爭一爆發時就看清楚謝德

曼(Philipp Scheidemann)、普列漢諾夫或者王德威爾德(Émile Vandervelde)對待世界戰爭的態度只不過是**新形勢下修正主義原則的一貫應用**。

簡言之，是什麼構成了修正主義的本質？首先，就是它試圖克服歷史唯物主義的「片面性」——那就是**單單**從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來解釋**所有**社會—歷史現象。修正主義以「整個社會」的利益作為它的立場。但因為這種集體利益——具體地看來——是不存在的，因為看來這樣一種利益只是相互鬥爭中的不同階級力量相互作用的暫時結果，因此**修正主義者就拿歷史過程不斷變化的結果來當作固定的理論出發點**。這樣，他在理論上也同樣是把事情顛倒過來了。其實在本質上他始終是一個妥協的人：必然如此，因為有這種理論的出發點。修正主義總是折衷的。即使在理論上它也試圖模糊和鈍化階級差別，促成一種各階級的統一體——一種只是存在於自己頭腦中的亂七八糟的統一體——來作為判斷事件的標準。

因此，修正主義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譴責辯證法**。因為辯證法不過是對如下事實的概念表述：社會的發展本身事實上是矛盾的，這些矛盾(階級矛盾、它們經濟存在的對抗性等等)是一切事件的基礎與核心；因為就社會是以階級分化為基礎這點來說，有關它的「統一體」的觀念都只能是抽象的——這些矛盾相互作用的一種永遠暫時的結果。但由於辯證法作為一種方法只是如下事實的理論提法：即社會是通過矛盾過程得到發展的，是處在從一種矛盾向另一種矛盾轉化的狀態中，易言之，是以一種**革命的方式**發展的，因而理論上反對辯證法就必然意味着從本質上跟整個革命觀點斷絕關係。

第三，因為修正主義者們這樣拒絕承認辯證法的現實存在，這樣

拒絕承認它的矛盾的因而是永恒**創造性**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就總是缺少歷史的、具體的和創造性的面向。他們的現實是受——按照不同屬性——不斷地產生**同一現象**的公式化和機械化的「永恒、固定規律」所支配，人類事實上也注定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在修正主義者看來，爲了認識什麼是無產階級將來的命運，只要一勞永逸地認識這些規律就足夠了。他們認爲設想可能存在這些規律所不包括的新形勢，或者可能存在其結果依賴於無產階級意志的形勢，都是不科學的。（過份強調偉人或倫理思想，只是這種態度必然有的正面現象。）

然而，第四，把這些規律看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而且修正主義者強調這些規律超歷史、無時間性的這一妥當性，就意味着他們是像資產階級一樣把社會看成是本質上不能改變的**現實**。他們不再把資產階級社會看成是從歷史上創造出來的因而注定是要走向歷史末路。他們也不把知識看成是認識這個末路時期和爲促進這種末路而努力的手段，而——充其量——是看成為改進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的條件**的手段。對於修正主義來說，任何以實際的方式力圖超出資產階級社會眼界的思想都是虛幻的和烏托邦的。

因此，第五，修正主義是受**現實政治**約束。它總是犧牲整個階級的**真正利益**，始終一貫地爲它稱之爲烏托邦的東西辯護，以便維護**特殊集團的直接利益**。

這幾點就足以表明，修正主義只能夠變成工人運動內部的一個現實的流派，因爲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使得工人階級中的有些集團暫時可能從中獲得經濟利益，並且因爲工人階級黨的組織結構保證了這些集團和他們的知識份子代表比無產階級內部的那些本能而混亂的廣大革命群眾有着更大的影響。

所有機會主義流派共同特徵，就是他們從來不從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來看待各種事件，因而就成為非歷史、非辯證的和折衷主義的**現實政治**的犧牲品。正是這一特徵把他們對戰爭的不同解釋統一起來，同時毫無例外地作為到現今為止的機會主義的必然結果顯露出來。右翼給它「本」國的帝國主義勢力提供的無條件支持，是從一種觀點有機地發展出來的，不管這種觀點從一開始是多麼有條件，它都是把資產階級看作未來歷史發展的領導階級，而給無產階級分派支持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這一任務。如果考茨基把國際稱為和平的工具因而不適合於戰爭，那麼他跟孟什維克徹拉瓦寧(Menshevik Chervanin)有什麼分別呢？徹拉瓦寧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後痛惜地說：「當革命的目的如此接近於完成的時候，要在革命的行動中間為孟什維克的明智策略找到一個位置，的確是困難的。」

機會主義依照它想求得支持並試圖藉以讓無產階級取得某種東西的資產階級各個階層而有所不同。對於右翼來說，這可能是重工業與金融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是無條件地被視為必然而得到承認。無產階級應該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在宏偉聲勢中，在它「自己」民族的勝利中實現它自身的利益。或者，也可以想辦法跟那些雖然被迫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但又覺得自己是被擠到次要地位，因此雖然給（而且必然給）帝國主義提供支持，卻又對來自帝國主義的壓力叫苦不迭，「企望」事件會發生不同的轉變，因而渴望和平、自由貿易，盡可能回到「正常」狀態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但是這些份子自然絕對不會採取跟帝國主義積極對立的立場；的確，他們只不過在展開一場不成功的戰役以保證他們在分贓中的份額（輕工業和小資產階級的某些部份屬於這個範疇）。對於他們，帝國主義只是一種「意外的事」。他們試圖尋



求一種和平的解決辦法，並且鈍化這種解決辦法的矛盾性。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中間派想使它依附於這個階層）也不應該積極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雖然不這樣就意味着實際上參加戰爭），而應該只是鼓吹一種「應有的」和平的必要性，等等。

國際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共同利益在組織上的表現。此刻大家在理論上承認工人們能跟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人們作戰，那麼國際實際上就不再存在了。而且此刻我們必須體認到，這種爲了帝國主義大國競爭的利益而進行的工人反對工人的流血鬥爭是國際內部決策部門過去所態度的一種必然結果，否則也就用不著再談重建國際，把它引回正確的道路，或者恢復它。把機會主義看成是國際內的一種流派，意味着**機會主義是無產階級自己陣營內的階級敵人**。因此，從工人運動中清除機會主義，是成功地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鬥爭的先決條件。所以，它對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以便使工人們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擺脫這種毀滅性的影響，是極爲重要的事。同時因爲這種鬥爭恰恰是整個階級反對世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必然會導致建立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國際。

舊的國際陷入機會主義的泥沼，是一段時期無法從表面上看出其革命特徵的結果。它的瓦解以及建立一個新國際的必要性，是現在無法避免的國內戰爭時期開始的標誌。這並不意味着從現在起每天都要在街壘上戰鬥。但它意味着要這樣做的必然性每天都會直接出現：歷史已經把國內戰爭提上議事日程。因此，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更不用說一個國際，只有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必然性，並且決心使無產階級從思想上和物質上、從理論上和組織上作好準備，它才能生存下來。

這種準備必須從了解時代的特徵開始。只有當工人階級承認世界

戰爭是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當它清楚地看到**國內戰爭**是它自己在替帝國主義服務當中免於毀滅的**唯一可能的抵抗行動**時，才能開始為這種反抗進行物質和組織的準備。只有當這種反抗成為卓有成效時，一切被壓迫者被壓抑着的激動才會與無產階級為自身解放的鬥爭聯繫起來。因此，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必須在此之前有它自己確實正確的階級意識，這樣它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解放鬥爭——現實的世界革命——的領導者。因此，從這種鬥爭中並因為這種鬥爭成長起來，而且理論清晰並具有戰鬥力量的國際，是工人階級真正革命組成份子的聯盟。它同時也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為解放而鬥爭的機關和焦點。**按照列寧的黨的概念，它就是世界範圍的布爾什維克黨。**正像世界戰爭顯露了沒落的資本主義勢力以及有可能在整個巨大的世界性毀滅的領域來反對它們一樣，列寧也在初生的俄國資本主義小世界中清楚地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可能性。

---

①(第五八頁)列寧把這個術語與有關帝國主義的學說——特別是由羅莎·盧森堡加以闡述的——與包含在羅莎·盧森堡的觀點中的(另一種)理論聯繫起來。前者把帝國主義的崩潰歸因於純經濟的、客觀的因素，並集中談它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情況；後者認為處於帝國主義奴役之下的國家，會在帝國主義中心地帶的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參看列寧的論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帝國主義經濟主義」〉(*A Caricature of Maxism—'Imperialist Economism'*,1916)。

②(第五八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預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實行國際聯合

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來代替各國金融資本的相互鬥爭，…。]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第九章中摘錄了這段話，並且對考茨基的立場進行了批判。

- ③(第五八頁)潘涅庫克是荷蘭人，戰前活動於荷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隨後他參加了 KAP(見第三章註②)。後來成了荷蘭共產黨的一名領導者。
- ④(第五八頁)《資本的積累》(一九一三年)是羅莎·盧森堡主要的理論著作，《雅努斯手冊》(一九一六年)是她最重要的爭論文章之一。
- ⑤(第六七頁)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在美國有大規模的警察鎮壓被用來反對新創立的共產黨。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公誼會教友司法部長帕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組織武裝搜捕行動，結果使六千名黨員和黨的全部領導人被捕。在波士頓，被捕者像古代羅馬(*Rome*)時那樣帶着鐐銬在街上走過。
- ⑥(第六九頁)《國際》(*Die Internationale*)是羅莎·盧森堡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主辦的一份理論刊物。「國際團體」(*Gruppe Internationale*)包括李卜克內西和批評家、歷史學家、馬克思傳記的作者梅林。這個組織後來變成爲「斯巴達卡斯聯盟」(*Spartacus League*)，即德國共產黨的初期組織。



## 第 5 章

# 作爲武器的國家

在階級鬥爭和黨內鬥爭不再局限於現有國家制度的範圍內，而開始衝破國家秩序的屏障並超出這些屏障時，一個時期的革命本質就最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一方面這些鬥爭表現爲**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另一方面，國家本身也同時被迫公開地**參與**鬥爭。不僅有**反對**國家的鬥爭，而且國家本身作爲**階級鬥爭的武器**，即維持階級統治最重要的一種工具這種面貌，也暴露出來了。

國家的這種性質一向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認，他們從它的各個方面考察了它與歷史發展和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他們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架構內，以清晰明白的措詞爲國家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機會主義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背離這些理論基礎最遠，這是十分合乎邏輯的。在所有其他問題上，是有可能提出（像伯恩斯坦）對特定經濟理論的「修正」(revision)，即使這些理論的基礎——終究——仍然跟馬克思的方法的本質相一致，或者賦予（像考茨基）「正統」(orthodox)堅實的經濟理論一種機械論和宿命論的歪曲。不過，單是提出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他們國家理論基礎的那些問題，本身就涉及到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第二國際中所有主流派的机会主義，最清楚不過地表現在：其中沒有一個流派嚴肅地討論過國家問題。在這個有決定意義的

問題上，考茨基與伯恩施坦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他們都毫無例外地簡單接受資產階級國家。如果他們確實批評過這種國家，他們也只是爲了反對它有害於無產階級的這些僅僅是個別的方面和表現，才這樣做。他們完全只是從具體的日常問題的角度來看待國家，從來不曾從整個無產階級的角度來考察和評估國家的性質。第二國際中左翼革命的未成熟性和混亂，也表現在他們同樣不能闡明國家的問題上面。有時，他們也深入討論到革命的問題，深入討論到向國家挑戰的問題，但却不能具體概括國家本身的問題，哪怕是在一個純粹理論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說指出它在歷史現實中具體實踐的結果了。

這裏又只有列寧才重新達到馬克思的概念的理論高度——澄清了無產階級對待國家的態度。即使他的成就只限於這一點，那它也已經是最高的理論成就了。但是，對他來說，馬克思國家理論的這種復活，既不是從語言學上重現馬克思的原始教義，也不是對它真正的原理從哲學上加以系統的說明。像列寧經常所做的那樣，這是理論擴展到具體，在日常實踐中把它具體化。**列寧認識到國家問題現在是戰爭的無產階級直接的任務之一**，而且也以這種方式把它展現出來。這樣，他就已經在使這個問題具體化的方向上前進了一步（這裏我們只是表明他單單提出問題的意義）。在他之前，歷史唯物主義的國家理論，儘管十分鮮明而清晰，也只是被理解爲一般的理論——當作關於國家的一種歷史、經濟或哲學的說明。因此在客觀上就有被機會主義者搞混的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時代的具體革命事件（比如巴黎公社）上面，看到了無產階級國家觀念的真正進步，而且，他們也即時指出了謬誤的國家理論在無產階級鬥爭的進程中所引起的那些錯誤。（見《哥達綱領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但是，即

使是他們的直接追隨者，即那個時代傑出的社會主義領袖們，也未能理解國家問題與他們自己日常活動之間的關係。把這種僅僅從一種普遍的意義上說是實際存在的歷史條件中的東西，與細小的日常鬥爭結合起來，需要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天才。很清楚，無產階級自身甚至還不大能夠在這個中心問題以及它自己日常鬥爭中顯而易見的直接問題之間建立有機的聯繫。所以，國家問題結果就日益被看作不過是跟留待未來實現的「最終目的」相關的事而已。

也只有列寧使這個「未來」在理論的意義上變為現在的東西。但是，只有承認國家問題是日常的問題，無產階級才有可能以具體的方式來考察資本主義國家，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自己不可改變的自然環境和自己目前生活唯一可能的社會秩序。只有關於資產階級國家的這種態度，才能使無產階級在理論上得到不受國家束縛的自由，使它對國家的態度成爲一個純粹策略的問題。比如說，很明顯，不惜任何代價的合法性策略和某種浪漫式非法性策略的背後，都隱含著在理論上同樣得不到不受資產階級國家束縛的自由。不能把資產階級國家看作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也就是認真看成爲一種真正的權力因素，而且只這樣來看待；必須把對於這點的看重，歸結成爲一個單純權宜之計的問題。

但是，列寧把國家當成爲一種階級鬥爭武器的這種分析，使問題變得更爲具體了。不僅使關於資產階級國家正確歷史知識的直接實踐（策略的或思想的）結果變成很清楚，而且也使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輪廓跟無產階級所採取的其他鬥爭方法顯出具體而有機的聯繫。工人階級運動內部傳統的分工（黨、工會、合作社）對當前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現在顯得不適合了。有必要創立能夠包括整個無產階級的機構，把

所有那些資本主義統治下的被壓迫者(農民和士兵)聯結成一個巨大的總體，並且領導他們投入戰鬥。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這些機構——蘇維埃(Soviets)——已經是無產階級把自己組織成一個階級的重要武器。一旦有了這些機構，革命就會提上議事日程了。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革命因素之組成爲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爲前提的。」

這整個階級的組織，必須從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鬥爭——不管它是否願意。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瓦解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或者後者使蘇維埃腐敗成虛有其表，從而將其毀滅。或者資產階級對革命群眾運動進行反革命鎮壓，重建「秩序」「正常」的情況，或者無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它的國家機器——同樣是它鬥爭的工具——從蘇維埃，從那個鬥爭的工具產生。即使在一九一五年，在蘇維埃最早和最不發達的形態下，工人蘇維埃也顯示出這種特徵：**它們是一種對立的政府(anti-government)**。階級鬥爭的其他工具即使在資產階級無可爭議的統治下，也可以進行策略上的調整——也就是說，能夠在這種條件下以某種革命的方式起作用——而工人蘇維埃則是本質上跟以一種相互競爭的**双重政府**姿態出現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相對立。所以，比如說，當馬爾托夫(J. A. Martov)承認蘇維埃是鬥爭工具，但却否認蘇維埃能夠合理地成爲一種國家機構時，他正是從他的理論中取消了革命本身——無產階級真正奪取政權。另一方面，極左的個別理論家把工人蘇維埃看作一種永久的階級組織，想用它們來代替黨和工會，因而暴露出他們不瞭解革命和非革命形勢之間的差別，混淆了工人蘇維埃的實際作用。因為雖然單純對蘇維埃的具體可能性的這一認知是遠超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限界，而走向了無產階級



的革命(因此必須在無產階級中不斷宣傳工人蘇維埃的思想,必須使無產階級經常地爲進行革命做好這種準備),但它的真實存在——如果不讓它成爲一場鬧劇的話——還是直接涉及到奪取國家政權的嚴酷鬥爭,也就是國內戰爭。

工人蘇維埃以一種國家機器的方式出現：**這種機器就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作爲武器的國家。**因爲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並且努力創造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於是機會主義非辯證的因而是非歷史和非革命的分析就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必須反對所有的階級統治；換言之，它自己的宰制形式決不應當是一種階級統治、階級壓迫的機關。從抽象的觀點看來，這種基本觀點是烏托邦的，因爲無產階級的統治以這種方式永遠都不會變成現實；然而以具體的觀點看來，同時把它應用到當前的情況，它本身就暴露出是**在意識形態上向資產階級投降**。按照這種觀點，最先進的資產階級統治形式——民主——至少看來是無產階級民主的一種早期形式。然而充其量它看來不過是這種民主本身的具體化，在這種情況下，所需要保證的僅僅是通過和平的鼓動，爲社會民主的「理想」贏得絕大多數人。由此可見，從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的轉變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倒是只保留供落後形式的社會向民主轉變之用。以革命手段捍衛民主謹防社會反動，只是在某些環境下才是必要的。(社會民主黨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認真的抵抗過法西斯反動勢力，並且以革命方式捍衛民主，這一事實實際證明這樣機械地把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分離開來是何等錯誤，又是何等反革命。)

這些由形形色色的粗糙或細膩論證——例如「長入」社會主義的論證——所呈現出來的觀點，不祇從歷史發展取消了革命，還對無產階

級掩蓋了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這種欺騙的要害之處就在於**非辯證的「多數」的概念**。因為代表絕大多數人口的利益是工人階級統治的本質，許多工人便產生錯覺，以為每個公民的聲音在其中都同等有效的純粹形式的民主是表達和體現整個社會利益最合適的工具。但這種觀點却沒有考慮這一簡單的——簡單的！——細節，即人並不只是國家整體內抽象的個體、抽象的公民或孤立的原子而已，他還總是具體的人，在社會生產中占有特定的地位，人們的社會存在（以及通過其媒介的思想）是由這種地位決定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純粹民主排除了這種媒介。它把無掩飾的、抽象的個體直接與在這種環境中顯然同樣抽象的國家的整體性聯繫起來。單是由於純粹民主的這種基本上屬於形式上的特徵，在政治上就足以**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社會**。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並不意味著純粹民主是一種唯一有利的條件，不過它卻完全是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決定性先決條件。

因為，不管階級統治歸根到底是多麼仰賴武力，終究沒有任何一個階級能夠單獨仰賴武力長久地維持它的統治。塔列蘭德(Charles M. Talleyrand)說過，「用刺刀做許多事情是可能的，但誰也不能坐在刺刀上。」因此，**每一種少數人的統治都是在社會上組織起來，以集中統治階級，為統一和緊密結合的行動做好準備，同時分裂和瓦解被壓迫階級**。就現代資產階級的少數人統治來說，必須始終牢記，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在階級鬥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兩個階級中的任何一個，既不屬於無產階級，也不屬於資產階級；另外，純粹的民主，從社會和階級的角度來說，都是設計來保證資產階級統治者對這些中間階層的統治的。（不用說，從意識形態上來瓦解無產階級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份。在英國和美國可以看得最清楚，一個國家的民主越是古老，它

的發展越是純粹，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瓦解也就越嚴重。)這種政治民主本身當然不足以達成這一目的。不過，這只是一種社會制度的政治極致，這種社會制度的其他因素還包括：在意識形態上劃分經濟與政治、建立在國家穩定的狀態中賦予多數小資產階級物質和道德利益的那一種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資產階級政黨體系、出版、教育制度、宗教等等。隨著一種多少有意識的分工，所有這一切就促成了以下目的：防止人口中被壓迫階級形成與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相一致的獨立意識形態；把這些階級的個別成員以單獨的個體、單純的「公民」的方式跟支配和凌駕於所有階級之上的抽象國家結合在一起；**瓦解這些階級使之不成其為階級**，並把它們徹底粉碎為資產階級容易擺佈的原子。

承認蘇維埃(工人的和農民及士兵的蘇維埃)代表無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意味著作為革命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試圖抵制這種瓦解過程**。它必須首先使自己組成爲一個階級。但是，它也必須在本能地反抗資產階級統治、同時正在衝破資產階級對他們的物質和思想影響的中間階級中，動員那些活躍的成員。比較敏銳的機會主義者，比如鮑威爾(Otto Bauer)●，也已經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專政的社會意義主要是在於，**堅決地從資產階級那裏抓住在意識形態上領導這些階級——特別是農民——的可能性**，並在過渡時期由無產階級取得這種領導權。粉碎資產階級，摧毀它的國家機器，破壞它的新聞出版部門，等等，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資產階級在首次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中失敗以後，一點也沒有放棄它重建經濟和政治統治的努力，而且在一段長時間內它仍然是比較強大的階級，即使在所造成的階級鬥爭新條件下也是如此。

所以，借助於構成國家的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是執行著它早先

奪取國家政權同樣的那種反對資本主義政權的鬥爭。它必須從經濟上摧毀資產階級，從政治上孤立它，並從意識形態上削弱和推翻它。但是同時它必須將從資產階級領導下拉過來的社會所有其他階層引向自由。換言之，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只是**客觀地**為其他被剝削階層的**利益而鬥爭**是不夠的。它的國家還必須努力通過教育來克服這些階層的習慣勢力和分散性，**培養他們積極而獨立地參與國家生活**。蘇維埃制度最崇高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社會生活中那些被資本主義所分裂的環節結合在一起。這種分裂的關鍵所在僅僅在於被壓迫階級的意識上面，但必須使他們注意到這些環節的統一。比方說，蘇維埃制度經常通過把人的具體存在——他們直接的日常利益等——與整個社會的基本問題聯繫起來的方式，來確立經濟和政治不可分割的統一性。它也在資產階級利益創造的「分工」的客觀現實中確立統一性；尤其是權力「機器」（軍隊、警察、政府、法律，等等）與「人民」的統一性。因為武裝的農民和工人作為國家權力的體現，同時也是蘇維埃鬥爭的產物和它們存在的前提。蘇維埃制度在一切地方盡最大努力把人的積極性與涉及國家、經濟、文化等等的一般問題聯繫起來，同時努力保證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規章不致成為與整個社會生活脫離的特殊官僚主義集團的特權。因為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國家使社會知道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之間的真實聯繫（而且後來還客觀地把那些當前還客觀地分離的環節，例如城市與鄉村、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等統一起來），那麼在把無產階級組織為一個階級時，它就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作為一種可能性存在於無產階級裡的東西，現在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無產階級真正的生產活力，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能夠產生出來**。不過凡是適用於無產階級的，也適用於資產階

級社會其他被壓迫階層。他們也只能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才得到發展，即使他們在新國家裡還是由人來領導。不過，跟他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因為他們不能意識到他們自身在社會經濟方面所受的損害、剝削和壓迫而由人來領導不同，相反的，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他們不僅能按照自身的利益生活，而且能夠發揮他們迄今潛藏著和受殘損的能力。只有在他們發展的界限和方向是受到能夠作為革命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決定的這個意義上，他們才是由人來領導。

所以，在無產階級國家裡頭對於非無產階級的中間階層進行領導，實質上跟在資產階級國家裡頭對於他們進行領導完全不同。這裡也有一個重要的形式上的差別：**無產階級國家是歷史上第一個這樣的階級國家，它完全公開而且真摯地承認它是一個階級國家、一個鎮壓的機器和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這種無情的誠實和坦率是首先使得無產階級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得到真正理解的東西。但除此之外，它還是無產階級自我教育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因為不管促使無產階級意識到決定性的革命鬥爭時期已經來臨——奪取國家政權、奪取社會領導權的鬥爭已經爆發——這一點已變得如何重要，讓這點成爲一種僵化的、非辯證的真理也會是危險的。要是已經擺脫了和平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而且已掌握住武力的歷史意義和必要性的無產階級，現在居然相信有關它統治的**全部問題**無論如何都可以**通過武力**來解決，那麼結果會是非常危險。不過要是無產階級幻想在它奪取國家政權之後階級鬥爭就結束了，或者至少是停止了，那就會更加危險。無產階級必須懂得，奪取國家政權**只是這種鬥爭的一個階段**。在奪取政權後，鬥爭反而會變得更加激烈，堅持認爲力量對比馬上而且在關鍵上會朝著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方向轉移，那是完全錯誤的。列寧反覆地

論述過，即使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起來的時候，即使在資產階級自己在經濟上被剝奪了所有權、在政治上受到壓制以後，資產階級還會是一個比較強大的階級。可是在無產階級掌握了**新而有力的階級鬥爭武器**即國家這個範圍來說，力量對比確實是轉變了。確實這個武器的價值——它有能力瓦解、孤立和摧毀資產階級，爭取和教育其他社會階層在工人和農民的國家裡合作，並且真正把無產階級自身組織成爲領導階級——決不是全然自動地從奪取國家權力中出現的。國家也不會僅僅因爲奪取了政權，就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爲一種鬥爭工具。國家作爲無產階級的一個武器的價值，取決於無產階級能夠從國家裡頭**得到**什麼東西。

革命的現實性對無產階級來說，本身表現在國家問題的現實性上。就這點來說，社會主義的問題本身馬上就不再只是一個極爲遙遠的目標，而是擺在無產階級面前的一項直接任務。但是，這種確實即將實現社會主義的關口，還是仍然包含著一種辯證的關係：要是無產階級想以一種機械的和烏托邦的方式來解釋這種接近社會主義的方式，就像社會主義只是通過奪取政權（剝奪資本家的所有權、社會化等等）就得到實現一樣，那麼對於無產階級就有嚴重的後果。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作過精闢的分析，指出只能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步地消滅許多資產階級的結構形式。列寧在這裡也盡可能堅決地與烏托邦主義劃清界線。他說：「……我也不認爲任何共產主義者已否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詞隱含著把蘇維埃政權轉變爲社會主義的決心，但這不是說新經濟制度被看作是一種社會主義秩序。」所以，革命的現實性無疑意味著社會主義現在是工人運動的一項直接的任務；但這只是說，現在必須每天爲確立它的先決條件展開鬥爭，而這種日常

鬥爭的某些具體措施已經意味著是具體地走向革命的實現了。

正是在這一點上——在它批評蘇維埃與社會主義之間關係上面——機會主義暴露出它終於加入了資產階級而成爲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因爲一方面，它把一時驚慌失措或陷於混亂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所做出的一切虛假讓步，都看作是確實往社會主義前進。（譬如，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在德國和奧地利建立過的現早已不復存在的「社會化委員會」Socialization Commissions ②）。另一方面，它嘲笑蘇維埃共和國，因爲它沒有實際上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因爲它在無產階級的形式下也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只創造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譴責「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共和國」、「重新引進資本主義」，如此等等。）在這兩種情況下，可以看得出來，對於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來說，要鬥爭的**真正敵人正是無產階級革命本身**。這也只是機會主義者對待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一如既往的擴展。同樣的，這也只是列寧在戰前和戰時，即他實際上把機會主義代表人物看作蘇維埃共和國裡的工人階級的敵人這時候，對機會主義所做的批判一如既往的擴展。

因爲**機會主義屬於資產階級**——屬於必須通過專政摧毀其思想與物質手段，瓦解其整個結構的這一資產階級——所以不應當讓它影響到那些由於其客觀階級狀況而表現不穩定的社會階層。這一社會主義的現實性使得這種鬥爭比起過去，比如說，關於伯恩斯坦論戰的時期，更激烈得多。國家作為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鎮壓資產階級的一種武器，對於根除機會主義對無產階級必須以專政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的那種階級鬥爭所造成的威脅而言，也是它的武器。

- ①(第八三頁)鮑威爾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之一。
- ②(第八七頁)德國社會化委員會是考茨基領導的。為安撫左派而建立，受到全體公務員的抵制，它並未因反對行政機構而得到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支持，考茨基於一九一九年四月提出辭呈。



## 第 6 章

---

# 革命的現實政治

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並且建立其革命的專政：社會主義的實現現在是一個實際的任務——也是無產階級最缺乏準備的一個問題。因為一向把當前所有問題只是當作當前問題這樣看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現實政治**，是跟整個歷史過程沒有關聯的，而且也不涉及階級鬥爭的最後問題，因此從不實際地和具體地超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在工人心目中這就又一次使社會主義帶有一種烏托邦的性質。最終目的與運動的分離不但曲解了對日常——關於運動的那些——問題的評估，而且也使最終目的本身成為烏托邦。這種向烏托邦主義的倒退，本身以極不相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首先，烏托邦主義者不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個「轉化」的過程，而看成是一種「存在」的狀態。在社會主義的問題整個產生出來的這個範圍，當社會主義已經進入其實際實現的階段時，他們也只是把這些問題當作未來經濟、文化和其他問題，並且按照可能提出的技術或其他解決方法來研究。至於社會主義如何首先在社會上變成有可能，如何達到或構成，或者在無產階級承擔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這一歷史時刻，無產階級必須面對什麼階級關係和經濟形式，他們是不聞不問的。（就像傅立葉 François-Charles Fourier 在他那個時代對法倫斯泰爾 Phalanstères 的組織作了詳細的分析，

却不能具體指明應當如何建立這種組織一樣)。機會主義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在社會主義思想中排除了辯證法，就使社會主義本身離開了階級鬥爭的歷史過程。結果，那些受它毒害的人必定要從歪曲了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實現的前提和這一實現的問題。這個基本的錯誤陷入之深，不僅影響到機會主義者——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無論怎麼說也永遠是一個距離遙遠的最終目的——而且也使得一些誠實的革命者陷入迷途。後者——第二國際中多數的「左派」——在實際日常問題的這一環境中對於革命過程、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都看得很清楚；但他們却不能從一個類似的思考角度看清在奪取政權之後的無產階級——以及由此產生的具體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們也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列寧用以闡述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全部社會主義問題，而且甚至必定為他在他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手方面贏得尊敬的這一令人佩服的現實主義，因而不過是把馬克思主義、把歷史辯證法思想一貫地應用到從此以後已成為話題的社會主義諸問題上面而已。在列寧的著作和演說中——就像偶爾也可以在馬克思那裏看到的一樣——關於以一種完成了的情況出現的社會主義，講得很少。但是，關於能引向建立社會主義的步驟，論述得却格外的多。因為對我們來說，還不可能具體地想像以一種完成了的情況出現的社會主義的細節。與在理論上準確的社會主義基本結構的知識同樣重要的是，這種知識的意義首先在於它建立了我們能夠判斷我們走向社會主義所採取的這些步驟的標準。社會主義的具體知識——像社會主義本身一樣——是為社會主義鬥爭的產物；它只能在這種鬥爭中，並通過這種鬥爭取得。一切取得社會主義知識的嘗試，如果不遵循這條與階級鬥爭的日常問題辯證地

互動的道路，就會得出一種社會主義的形而上學、一種烏托邦，也就是某種純粹冥思苦想不切實際的東西。

因此，列寧的現實主義的目的，他的**現實政治**，就是**最終排除一切烏托邦主義**，具體完成馬克思綱領的內容，也是一種變為實踐的理論，一種關於實踐的理論。列寧處理社會主義的問題，像他在國家問題上所做的那樣，他把它從原先形而上學的割裂和資產階級的方向下扳正過來，**並把它放在階級鬥爭問題的整個歷史條件之中**。他在活生生的歷史中檢驗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別處提出的天才預見，使之更加具體，而且比不管怎麼天縱英明的馬克思在他那時代所做的還要更加完整地補充它們。

所以說，社會主義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候這個階段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的問題。它們是在工人階級建立其專政的形勢下直接提出的，因而只有聯繫工人階級專政的問題才能夠得到理解和解決。然而，由於同樣的原因，就當前和所有以前的形勢而論，它們還包含着一種嶄新的性質。即使它們的組成成份全都是過去產生的，但它們跟維持和鞏固無產階級統治的相互聯繫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馬克思或其他較早的理論家那裏**都還不存在**，只有放在這種全新形勢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獲得理解和解決。

因此列寧的**現實政治**，追溯其歷史環境和基礎，經證明是**唯物辯證法迄今所達到的最高階段**。一方面，它深刻而具體地分析了既定形勢，分析了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就其質樸和謹嚴而論，它是嚴謹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它清醒地意識到從這種形勢產生的所有新的傾向，並撥開了任何理論偏見和烏托邦式幻想的迷霧。這些顯然非常質樸的性質，根本上是來源於唯物辯證法——本身是一種歷史學

說——的性質，絕不是輕而易舉便可獲得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習慣思維方式使每一個人——特別是那些愛做系統研究的人——具有想完全按舊事物說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來說明今天的一種傾向。（革命的烏托邦主義是想讓人們拉着自己鞋子上的搭扣帶來拔高自己，一躍而登上一個全新的世界，而不是藉助於辯證法來認識從舊事物到新事物的辯證發展的一種嘗試。）列寧說，「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被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引上歧途，爲了避免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基本事實，即我們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是任何理論、任何書本所沒有涉及的，原因很簡單，所有與這個術語相關的通常概念，都是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統治相聯繫的。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遺留着資本主義軌道的社會，還沒有走上新的軌道。」❶

但是俄國無產階級一旦發現它取得政權，取得社會主義的實際具體環境又是怎樣呢？首先，由於世界戰爭，相當先進的壟斷資本主義處於崩潰狀態，在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裏，農民只有跟無產階級革命結成聯盟才能從封建殘餘的枷鎖中解放自己。其次，在俄國外部準備傾其全力撲向新生的工人和農民國家的一個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倘若其本身不是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間日益增大的矛盾所分割，便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強大到足以從軍事上或經濟上粉碎這個國家，因此這就爲無產階級提供了持久的機會來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和其他的競爭，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當然這裏所指出的僅是兩個主要的問題地帶；但即使是對這兩個問題，也不可能利用這幾頁做詳盡的討論。）

作爲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較高的經濟形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能由工業的改組和更高的發展、由它爲根據工人階級的需要所進行的調整，以及它向着意義更加深遠的生活方式的方向轉變（消滅城鄉之

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等等)來提供。這種物質基礎的條件因此決定了它具體實現的可能性和道路。在這個方面——早在奪取政權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列寧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它所產生出來的經濟形勢和無產階級的任務：「戰爭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從而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因為戰爭帶來的災難促成了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而且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又進一步寫道：「……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就真正能夠保證社會主義一年以後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立於不敗之地。」

特別詳盡地引證這些段落，目的是駁斥廣泛流傳的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人的神話。按照那種神話，似乎在「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企圖「一舉」引向共產主義的嘗試失敗之後，列寧妥協了，「作為聰明的現實主義者」，他離開了原來的政治路綫。歷史的真理恰恰相反。關於所謂「戰時共產主義」，列寧說：「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它「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按照列寧的理論前提，它本身是背離了社會主義本該走上的發展道路。當然，它是由國內外的內戰決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種臨時的辦法。而且，按照列寧的看法，如果無產階級忽視戰時共產主義的這種性質，更不用說把它看作是走向社

會主義現實的一步——就像許多達不到列寧那個理論高度的真誠的革命家所認為的那樣——那麼對無產階級就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經濟的外在形式本身有多大程度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而完全是在於無產階級**實際上**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控制住了大工業——它在掌握政權時所占有的，同時也是它本身社會存在的基礎的這一經濟機器——真正又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運用這種控制來推進自己的階級目的。不管實現這些階級目的的客觀環境與實現它們的相應手段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它們總的基礎始終應該是保持不變的：通過領導動搖的中間階層（尤其是農民）的方式，在決定性的戰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線——繼續進行階級鬥爭。而且，這裏絕不應該忘記，儘管取得了初步勝利，無產階級仍然是並在一個長時期內將仍然是較弱的階級——直到革命在世界範圍內勝利。因此在經濟上它的鬥爭必須建立在兩個原則上：首先，要盡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停止世界和國內戰爭對大工業的破壞，因為沒有這種物質基礎，無產階級就必定會被摧毀；其次，調整所有有關生產和分配的問題，以便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的物質需要，這樣，通過以革命方式解決土地問題，就能夠堅持農民與無產階級建立的聯盟。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會因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然而，逐步完成這些目的却是堅持無產階級統治——社會主義的首要前提——的唯一道路。

因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在國內經濟戰線上的激烈程度也絲毫沒有降低。小規模的工業——在這個階段消滅小規模的工業或進行「社會化」(socialization)，都是純粹的烏托邦想法——「自發地、每日每時地，在基本的意義上和廣濶的範圍內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問題就在於二者誰占上風：是這個重新出現和重

新積聚的資產階級，還是由無產階級所掌握的國家大工業？如果從長遠來看，無產階級不希望冒由於扼殺小規模的工業、商業等（實際上這純粹是一種幻想）而失去自己與農民聯盟的危險的話，那麼它就必須冒這種競爭的風險。此外，資產階級以外國資本或租讓的形式提供了甚至更多的競爭。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發展（不論資產階級的意圖是什麼）由於加強了大工業的經濟力量，能夠在客觀上變成無產階級經濟的助力。於是「產生了一種與小規模的工業相對立的聯盟。」當然，同時也必須堅決反對租讓資本逐漸使無產階級國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常規傾向（通過限制租讓、對外貿易壟斷等）。

這些貧乏的評論要概括列寧的經濟政策，即使只是粗略地，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把它們當作例子，讓他的政治原則的理論基礎比較清晰地顯露出來。他的原則是：在一個存在着公開和秘密的敵人與動搖的同盟者的世界中，要不惜任何代價地堅持無產階級的統治。同樣地，他在奪取政權前的基本政治原則是，在衰頹的資本主義相互糾纏、千萬頭緒的社會傾向中發現那些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來把自己轉變為社會的領導——統治——階級的因素。列寧在他整個的一生中毫不動搖和毫不妥協地堅持這個原則。以同樣不能改變的方式，他把這看作是一種辯證法的原則，意思是說，「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是：自然和歷史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和可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不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因此，辯證法要求「在發展的進程中全面考察有關的社會現象，從所有外部的、可見的表現中歸結到它們的基本的動力——歸結到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列寧作為一個辯證法家，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夠清楚地看到辯證法的基本原則，總是具體地看出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內在本質的發展，不

帶有抽象的偏見，也沒有因為表面現象而在盲目崇拜的這方面搞混。他總是把一切現象跟它們的最後基礎聯繫起來——按照人們實際的階級利益，跟具體（換句話說受階級條件限制的）人的具體活動聯繫起來。僅僅以這個原則而論，有關列寧是「精明的權力政治家」和「妥協的大師」的神話便不攻自破，使人們看到真實的列寧，看到一貫發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這個理論家。

首先，在為妥協這一概念下定義時，任何使人想到它是一個技巧、聰明或狡詐的詭計問題的說法，都必須加以反對。列寧說，「我們必須堅決駁斥那些把政治說成小的詭計，有時是近乎欺詐的人。**階級是不能被欺騙的。**」因此，對列寧來說，妥協意味着我們利用處在特殊環境下以及在某些時期處在確定的領域當中跟無產階級的利益對應的不同階級（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比如說，當涉及到一個被壓迫民族時）的現實的發展傾向，使雙方都獲得好處。

自然，妥協也能夠是對抗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資產階級（我們只需要考慮蘇維埃俄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階級鬥爭形式。機會主義的理論家們也牢牢地抓住這種妥協的特殊形式不放，這部份是為抬舉列寧，或者貶抑他，說他是一個「非教條的權力政治家」，部份是以此為他們自己的妥協找到一種偽裝。我們已經指出第一種論據的弱點。要評估第二種論據——就像要評估每一個辯證法的問題一樣——必須考慮到妥協的整個具體環境。現在馬上一目瞭然，列寧的妥協與機會主義的妥協是建立在截然相反的設想之上的。不論自覺或不自覺地，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根據是認為真正的革命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社會革命的客觀前提還不存在，無產階級對革命在思想上還不夠成熟，黨與工會還太弱小，由於這些原因，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



級妥協。換句話說，社會革命的主觀和客觀條件越是呈現出來，無產階級就越是能夠「純粹地」實現它的階級目的。所以在實踐中妥協的反面經常是十足的激進主義——跟「最終目標」有關的原則的絕對「純粹性」。（不言而喻，就此而論我們只能考察那些仍然在某種程度上相信階級鬥爭概念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對那些不相信的人來說，妥協顯然就不再是妥協，而是各種職業階層爲了整個共同體的好處而自然進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對列寧來說，妥協是革命現實性的一種直接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如果這種現實性規定了整個時代的基本特徵，如果革命——在個別國家或者是在世界範圍——在任何時刻都可能爆發（迄今還不能精確地說明這種時刻）；如果整個時代的革命特徵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日益式微中顯示出來，不斷地交替而且盤根錯節地產生多種多樣的傾向，那麼無產階級就不能在它自己選擇的「有利」條件下開始並完成它的革命，它總是必須利用所有那些推動革命或者至少能夠削弱敵人的傾向——不管是多麼暫時性地。前面，我們從列寧的作品中引用過一些段落，這些段落表明——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前——他對實現社會主義的速度並不抱任何幻想。下面的段落是引自列寧所寫的最後幾篇文章其中的一篇，這篇文章寫於「妥協」時期之後，它仍然很清楚地表明，對於列寧來說，這種預言並不意味着推遲革命行動：「記得拿破侖這樣寫過：『*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譯出來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再看分曉』。我們也是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投入了真正的戰鬥，然後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約或新經濟政策等等這樣的發展中的細節（就世界歷史來說，這當然是細節）。」

因此列寧主義的妥協理論和策略不過是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辯

證的——歷史認識客觀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儘管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能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這一點是通過如下的認識得來的：歷史總是在創造新的條件；歷史上不同傾向相互交叉的時刻永遠不會以相同的形式重新發生；那些對於明天的革命是一種致命危險的傾向，可能被判斷為對於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列寧曾經想依據布爾什維克的一個舊的口號：「一切政權轉歸蘇維埃」，提出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達成一種妥協，採取共同的行動。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七日他已經寫道：「……也許提出一種妥協已經太晚了。也許還有和平發展可能的少數日子也已經過去了。是的，顯然它們已經過去了。」這種理論在布列斯特和約和經濟租讓制方面的運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整個列寧主義的妥協理論有多大的程度是以列寧革命現實性的基本概念為基礎，可以從列寧跟自己黨內左派的理論論戰（關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後和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俄國形勢、關於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歐洲形勢）中看得更為清楚。在所有這些論戰中，**左派激進主義**（Left-wing radicalism）的口號是原則上反對任何妥協。列寧的駁斥非常堅決地指出，這種反對妥協的觀點**迴避決定性的鬥爭**，背後隱藏着**對革命的一種失敗主義的態度**。因為真正的革命形勢——而且按照列寧的看法，這是我們時代的基本特質——本身是在這樣的事實中表明出來的：沒有任何一塊階級鬥爭的區域是不出現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即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時期，並從這種知識得出實際結論的革命家，總是一定從這種觀點出發，來看社會—歷史現實的整體性，而且一定為了革命的利益，按照或只按照事件對革命的重要性如何來嚴密地考慮一切事件——大的或

小的、正常的或不合宜的。在間或把「左派激進主義」稱為「左派機會主義」時，列寧非常正確而深刻地指出了這兩種在其他情況下是相互對抗的傾向的**共同歷史觀點**，對於一種傾向來說，任何妥協都是忌諱的，而對於另一種傾向來說，妥協又體現着**現實政治**的原則，與「嚴格堅持教條主義原則」相對立。換句話說，他指出，二者都是悲觀主義地對待無產階級革命的逼近和現實性。這樣，通過從同一個原則駁斥兩種傾向，列寧把問題弄得很清楚，妥協對於他和妥協對於機會主義者，只是**詞語上的相同**：雙方所使用的這個詞語指的是根本不同的前提，因而涵蓋**兩種根本不同的概念**。

正確地理解列寧關於妥協的含義是什麼，他從理論上建立妥協策略的依據是什麼，不僅對正確地理解他的方法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有深遠的實踐意義。對列寧來說，妥協只有在與嚴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方法這一辯證的互動當中才有可能的；進行妥協總是向我們指出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下一個現實主義的步驟。所以，不管我們如何把這種理論與策略跟僵硬地堅持「純粹」的原則這一作法鮮明地區分開來，我們也必須整個把它們跟所有非原則的、公式化的**現實政治**劃分清楚。換言之，在列寧看來，按照具體形勢、具體的階級關係的現實性來認識和評估所討論的具體形勢，來決定妥協的具體的階級關係，並且引導無產階級運動方向的這一必然發展傾向，這還是不夠的，而且如果不把這種對現實性的正確認識放到對**整個歷史過程**一般正確認識的範圍裡頭，列寧認為這對工人運動就有**巨大的實際危險**。所以，他一方面承認德國共產主義者對於粉碎凱普政變(Kapp Putsch)之後被設計出來的「工人的政府」——所謂的「忠誠的反對派」——所持的實際態度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最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策略，原因就是它

在理論上是以一種錯誤的歷史觀點為基礎的，充滿着民主的幻想②。

一般與特殊辯證地正確的融合，在特殊中(在具體形勢中)認識一般(以一般歷史趨向的意義來認識)，因而產生理論具體化，從而是這種妥協理論的基礎。那些只把列寧看作現實政治的一個聰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導者的人，完全誤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質。而那些以為能在他的決定中為正確而實際的行動找到可適用於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對他的誤解就更深了。列寧從來沒有規定過能夠「適用」於許多不同情況的「一般規則」。他的「真理」是從站在辯證地研究歷史的基礎上，對具體形勢進行具體分析產生出來的。只有笨拙的模仿、庸俗化的列寧主義，才會從對他的見識和決定進行機械的「一般化」中產生出來——比如，就像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答覆「克雷孟梭照會」(Clemenceau Note)時，那些想在一種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按照公式模仿布列斯特和約的匈牙利共產黨員所顯示出來的一樣③。因為，正如馬克思尖銳地責備拉薩爾的那樣：「……辯證的方法被錯誤地應用了。黑格爾從來沒有要求在一個一般的辯證法原則下包括大量的不同『事例』。」

但是，需要考慮到每種具體形勢下所有存在的趨向，這並不意味着所有這些趨向在作出決定時都具有同等的份量。相反地，**每種形勢都包含着一個中心問題**，解決這個中心問題的方案既決定着回答由它同時提出來的其他問題的答案，也決定着未來所有社會趨向的進一步發展。列寧說，「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殊環節，必須全力抓住這個環節，以便抓住整個鏈條並穩定地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同時，在歷史事變發展的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之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

樣簡單，那樣笨拙。」只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通過具體形勢的具體分析，才能夠在社會生活的某一既定時刻確立什麼樣的事實能獲得這種意義。它的主導旋律是作為一個連續發展整體的這一革命的社會概念。因為只有這種跟整體的關係，才使有關的決定性鏈條有這種意義：必須抓住它，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抓住整體本身。列寧在他最後所寫的幾篇文章當中的一篇又一次特別尖銳而具體地強調了這個問題。當時他談到合作制並指出：「舊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義的或庸俗的東西，已經成為毫無粉飾的現實了。」他表示：「實在說，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國居民『文明』到能夠了解人人參加合作社的一切好處，並把參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僅有』這一件事情而已。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目前我們並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別聰明的辦法。可是為要完成這一『僅有』的事情，就必須實行全盤的改革，必須讓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方面經歷整個發展階段。」

遺憾的是，這裏不可能詳細分析整篇論文。這樣一種分析——以及就此而論，分析列寧的任何一個理論見解——能夠表明整體如何總是包含在每個鏈條的環節中；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準則始終在於把最充沛的精力拿出來並集中在歷史過程中的那些環節上，那些環節在任何既定領域或階段，都包含着跟當前的整體、跟對未來是重要的那種發展問題——即處在未來實際有形的整體中的這一未來——的這一關係。所以，這樣全力抓住鏈條的下一個決定性的環節，決不是要從總體中抽出這個環節而犧牲總體中其他環節。相反地，它是指，一旦跟這個中心問題聯繫起來，就能夠正確的理解和解決歷史過程中的所有其他環節。通過這種處理，所有問題相互間的聯繫並沒有鬆弛掉：

而是得到強化了和變得更具體了。

那些環節通過歷史、通過生產力的客觀發展呈現在我們眼前。但是否能夠以及有多大程度能夠認識、把握，並因此而影響到無產階級進一步的發展，則取決於無產階級。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的並且被經常引證的句子，在奪取政權後的革命時期取得了總是愈來愈大的重要性；儘管它的辯證的對應物，即強調不是自由選定條件，也是它的真理性的一個重要部份。這實際上意味着，**黨在革命中的角色**——早期列寧主要的思想——在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比準備時期**更為重要、更有決定意義**。因為無產階級決定歷史進程的能動性影響越大，它的決定對它本身和對整個人類——無論是從好的意義上還是從壞的意義上說——越是命運攸關，它以其最純潔的形式在這巨浪濤天、狂風暴雨的海上維護唯一的南針——**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以及在這場鬥爭中協助這獨一無二的南針取得更大的明確性，就越是重要。無產階級政黨能動的歷史角色這一概念，是列寧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因而也是列寧一方面不厭其煩地一再強調，另一方面又著重指出它對實際決定的重要性的這一政治學的基本原則。因此，在俄國共產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當他抨擊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手時，他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的資本主義，我們能夠確定它的界限。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與國家相聯繫的，而國家是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份、先鋒隊。我們就是國家……。它取決於我們來規定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什麼。」

正是因為如此，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每個轉捩點總是同時就是一個**關鍵性的黨內問題**。總是一種力量的重新組合，是黨組織對新任務的調整：總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發展，它的方向**受到從無產階級的階級觀**

點來對整個歷史過程進行仔細而精確的分析的這一方式所**影響**。正是因為如此，黨在我們**所構成**的國家中坐在決定性力量的層級最高的位置上。因為革命只能在世界的範圍裏取得勝利，因為工人階級只有作為一個世界的無產階級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階級，所以黨本身被組成並收編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機關——共產國際——內部的一個區部。以機械的僵化為特徵的所有機會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將總是在這樣一種關係中看到不可解決的矛盾。這種思想無法理解，即使在「回到了資本主義」之後，布爾什維克如何仍然堅持過去的黨的結構和黨的「不民主的」專政。也無法理解共產國際如何一刻也不放棄世界革命，盡力運用所支配的各種手段來準備和組織革命，而同時俄國的工人國家卻試圖促進跟帝國主義列強和平相處，讓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盡可能參加俄國的經濟建設。這種思想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黨頑固地維護它內部的團結，並盡全力尋求它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鞏固，而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卻急切地捍衛它跟它賴以存在的農民所締結的聯盟，使這一聯盟免受任何侵蝕——因而使它從機會主義者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個農民國家，犧牲了它的無產階級性質，等等，等等。非辯證思想的這種機械僵化狀態是不可能理解到**這些矛盾是現今時期的客觀的、主要的矛盾**；俄國共產黨的政策、列寧的政策，只有在對它**自身社會存在的客觀矛盾尋求和發現辯證的正確解決方法的範圍內**才是矛盾的。

這樣，對列寧政策的分析，就總是使我們回到那個辯證方法的基本問題上面。他整個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終如一地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運用到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中的這一不斷變化、永遠翻新的現象上。但是因為辯證法不是可以機械地運用於一切生活現象的一種終極

的理論，而只是在這種運用中並經過這種運用，作為理論才存在著。所以列寧的實踐就使辯證法比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繼承時，有了一種更廣濶、更完全和理論上更發展的形式。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列寧主義**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列寧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被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弄成淺薄和曲解了幾十年之後，恢復了它的純潔性，而且他也使這一方法本身繼續發展、更加具體化和更加成熟。如果說現在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是繼續沿着列寧的脚步前進，那麼只有在他們試圖像列寧建立他與馬克思的那種積極的關係一樣，建立他們與列寧的關係的那時候，才會有成果。這種能動性的性質和內容是由歷史使馬克思主義面臨的這些問題和任務來決定的。它的成功取決於領導工人階級的政黨裡頭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程度。列寧主義意味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已經更加靠近無產階級的日常戰鬥，它已經變得比在馬克思時代所能達到的更實際。因此，列寧主義的傳統只意謂著不失真地和靈活地保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生動活躍、生長及創造的作用。正因為如此——讓我們再說一遍——共產主義者必須以列寧研究馬克思的那種精神來研究列寧。必須研究他，以便學習如何運用辯證法；學習如何通過對具體形勢的具體分析來發現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學習在形勢的新環節中發現跟以前的發展有關聯的是什麼；學習在歷史發展的規律中發現總是不斷翻新的現象；學習在整體中發現部份和在部份中發現整體；學習在歷史必然性中發現能動性的環節和在能動性中發現跟歷史必然性的聯繫。

列寧主義展現了迄今前所未有的具體、非公式化、非機械化、純粹以實踐為方向的思想的程度。保持這一點是列寧主義者的任務。但



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只有以生動的方式發展的東西才能保持得住。而**這樣保持**列寧主義的傳統，在今天是所有堅信辯證法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的一項武器的人最崇高的職責。

- 
- ❶(第九二頁)列寧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指由工人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和商人，允許他們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一定的界限之內」進行經營。列寧把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嚴格區分開來。
  - ❷(第一〇〇頁)隨着凱普政變——德國的志願軍和其他部隊所搞的未遂軍事政變，四天之後由於一次總罷工而被挫敗——之後，工會領導者勒吉恩(Karl Legien)提出一個工團主義的全黨「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同意只建立一個宣傳機構——換句話說，「忠實的」和非革命的機構——與這樣一個政府相對立。事實上，這個宣傳機構從未存在過。
  - ❸(第一〇〇頁)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份最後通牒——克雷孟梭照會——從凡爾賽(Versailles)送交庫恩(Bela Kun)，要求匈牙利部隊從斯洛伐克(Slovakia)(由匈牙利紅軍成功地反擊外國干涉部隊後佔領)撤退，以作為匈牙利東部的羅馬尼亞部隊從匈牙利東部撤退的交換條件。不顧左派成員的反對，庫恩接受了照會，匈牙利紅軍撤退。而羅馬尼亞部隊則停駐不動，結果被用來扼殺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



## 一九六七年後記

這本小書是在列寧逝世之後不久寫下的，沒作什麼專門的準備，目的是爲了滿足這樣一種自然而然產生的需要：把我當時認爲極爲重要的東西，即列寧性格的精神中心，從理論上確定下來。因此，書的副標題是〈關於列寧思想統一性的研究〉。它表明我當時關注的不是要複製列寧客觀的理論體系，而毋寧是要說明那些使這種體系化及其在列寧的人格與行動中的體現成爲可能的這些客觀和主觀條件。問題甚至不是在想分析整個他的生平和著作中的這種能動的統一性。

相當多的同時代人對這樣的一些著作有興趣，這首先是一種時代的特徵。自從出現了對史大林時代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以來，人們對於二〇年代中那些反對派傾向也重新產生了興趣。如果從一種非常誇大的理論和客觀的觀點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不論史大林和他的追隨者爲革命發展中的危機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有多麼錯誤，那個時期的其他任何人無疑也可能已經提出過能夠給後來各個階段的問題一種理論指導路線的分析或看法了。要想對馬克思主義復興作出有成果的貢獻，就需要純粹以歷史角度把二〇年代看成是現已完全停止的一段革命工人運動的過去時期。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與目前主要的新階段正確地聯繫起來。但列寧，像是兼具偉人身

份的統治者一樣，是這樣體現他的時代，因此他所說過的話和所做過的事，這些成果——但是特別是方法——即使在已經變動很大的環境下，還是能夠保持一定的同時代性。

這本書是二〇年代中期單純的產物。它作為一份文獻，記錄一群並非很少數的那群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列寧的性格和任務，如何看待他在世界事變進程中的地位，因而肯定不會是枯燥無味的。但是必須始終記得，本書的思想是比列寧本人一生的理論工作更受到那個時期的概念——包括關於那個時期概念的幻想與過份的地方——所制約。第一句話本身就證明了當時的偏見：「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毫無疑問，這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的表述。但同樣可以肯定，它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本質唯一的規定，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規定。而且列寧——對他來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形成思想和實踐的紅線——會因為這樣的「定義」，無論怎樣也要提出最激烈的抗議，反對任何想把歷史唯物主義真正的和方法論的財富——社會的普遍性——歸結成一種簡單的面向並加以束縛的嘗試。

按照列寧的精神所進行的批評，可以適用於這本小書中的許許多多的段落。我將只限於指出這種評論的正當性和方向，因為我希望清醒、善於思考的讀者會自己保持一種批評的距離。我認為重要的，是強調這個地方：我從列寧那裡得到的看法產生了一些結論，在清除史大林主義的這些時候，這些結論仍然具有某些方法論上的妥當性；換句話說，作者對列寧人格和著作的熱誠畢竟沒有走上歧途。因為我對列寧的行為所做的某些評論，隱約包含著對史大林後來的發展所做的某種正確的批評，史大林的這種發展當時除了在季諾維也夫所領導的

共產國際中驚鴻一瞥以外，仍然是隱而不彰的。比如，在史大林領導下所有組織問題的日益僵化：不管當時的情況如何，不管政治的要求是什麼，黨組織被塑造成一種永遠不變的拜物——甚至訴諸列寧的權威。我在這裡引證一下列寧的警言：「政治問題不能機械地脫離組織問題」，而且下面的評論，正是根據這樣一種列寧主義的政治能動性精神作出的：「所以，一切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組織上的僵化對黨都是有害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說：『任何一種新的鬥爭形式，都會遇到新的危險，遭到新的犧牲，因而不免會使對這種新的鬥爭形式準備不足的組織受到「破壞」』。黨的任務就是公開地和自覺地——首先是對自身而言——尋求它的必然途徑，以便可以在破壞的危險變成現實以前改造自身，並通過這種改造促進群眾的改造和前進。」當然，當時這在客觀上只是偉大年代中具體的革命騷動的一種後衛行動，目的在反對官僚主義和機械的一致性的侵蝕。

但是，如果今天需要在一切領域成功地抵制教條地奉命辦事，那麼要是承認二〇年代的結論是過去的一部份的話，二〇年代的結論將只有兜一個圈子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推動力量。為此，清楚地、批判地認識二〇年代和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時期之間的差別，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言而喻，我們也必須以同樣要緊的明確性來研究列寧的著作。對於那些根本無意從這種著作中得出某種「一貫正確」的教條集成的人來說，這樣做絲毫無損於他在現世的偉大。比如說，今天我們知道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導致世界戰爭的這一論點，現在已失去了它一般的妥當性。當然，只是這種發展的必然性已經失去妥當性；不過它變成爲一種可能性，這改變了它的理論意義以及——特別是——它的實際結果。同樣地，列寧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戰爭

的發生是某種神秘莫測的東西」——推廣至未來的帝國主義戰爭，在這裡，未來則出現了一種非常不同的狀況。

我提出這些事例，正是想揭示列寧真正非凡的地方，這種真正非凡的地方跟史大林主義一貫正確的不朽事蹟這一官僚主義理想無關，而且絕對無關。自然，論述列寧真正偉大之處，遠遠超出本書的範圍，本書遠比它的主題還受到時間的限制。在列寧在世的最後幾年中，他以研究他的本書所無法企及的明晰性，已預見到了一九一七年開始的那個時期正接近結束。

儘管如此，本書仍不時暗示列寧真正的精神發展成長狀況，而且我想從我當時所領悟到的這些少許真理開始說明。它確定在經濟學方面列寧不是可與他的同時代人希法亭，尤其是羅莎·盧森堡相比擬的專家。但在評估整個時期當中，他是遠比他們優越。這種「過人之處——而且這是無與倫比的理論成就——在於他把帝國主義的經濟理論與目前時代的各種政治問題具體地結合起來，從而使這個新階段的經濟學成爲這種關鍵場合中的一切具體行動的準則。」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也注意到這一點：不論是朋友或者敵人，他們經常都談到他的策略藝術和對**現實政治**的掌握。

但是這種論斷沒有抓住事情的核心。這個核心更多地是在對整個過程進行評估時的純粹理論上的過人之處。列寧從理論上給這種過人之處提供了深刻而豐實的基礎。他所謂**現實政治**，絕不是經驗的實用主義者的現實政治，而是一種基本的理論態度在實踐中的最高極致。對他來說，現實政治的目標始終是理解必須採取行動的既定形勢這一社會歷史的特殊性。對作爲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來說，「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並不是『純』理論的對立物；相反地，這是道道地地的理論

最精彩的部份，是理論在現實中實現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論在實踐中產生轉變的所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論費爾巴哈的最後明確的論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在列寧和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馬克思自己擊敗了挑戰，在理論領域提出解答。他對社會現實所做的解釋，給改變社會現實提供了合適的理論基礎。但是只有在列寧那裡，這種新世界觀的理論實踐的本質才——沒有放棄或壓制理論——變成積極地體現在歷史的現實中。

當然，本書對於了解列寧的真實性格只是作了一點樸實的貢獻。它在理論上缺乏深厚的基礎，它也沒能把列寧作為一種人的典型加以論述。我只能在這裡指出這一點。在現代的民主革命的鏈條中，革命領袖的典型常常被極端化了；諸如丹東(Georges Danton)和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這類人物在現實和偉大的文學作品中，都體現為這種極端的形象(我們想一想畢希納 Georg Büchner)。就連工人革命的偉大演說家，如拉薩爾和托洛茨基，也具有某些丹東式的特點。

在列寧身上，才第一次出現了某種完全新的東西，出現了兩個極端是一種中間型。在列寧自然本性的底子裡，他對以往偉大的革命苦行者的原則是忠實的——但在他的性格中却沒有苦行主義的影子。他是活躍而幽默的；他享受著每一種生活所賦予的東西，從打獵、釣魚、下棋到讀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托爾斯泰(Aleksey Konstantinovich Graf Tolstoy)的作品；他對於真誠的人滿懷熱誠。這種對原則的忠誠在國內戰爭中會成為堅若磐石的不寬容性；但它並不包含任何仇恨。列寧是在同制度鬥爭——自然地，也是同代表這些制

度的人鬥爭——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把他們完全消滅。但他把這看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客觀必然性，從人的角度看這是悲慘的事情，但在現實一定的具體鬥爭中他不能從這裡退縮。高爾基(Maxim Gorky)記下了列寧在聽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熱情奏鳴曲》(*Appassionata*)時富有特色的評論：「『《熱情奏鳴曲》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東西；我願每天聽到它，多好啊，簡直是超人的音樂！我總帶著也許是幼稚的驕傲想：人類能作出多麼令人驚奇的事情呵！』於是他睜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樂地補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聽音樂，它會刺激神經，使我想說一些漂亮的蠢話，撫摸人們的腦袋，因為他們住在骯髒的地獄裡，却能創造出這樣美麗的東西來。但是現在却不能撫摸任何人的腦袋——手會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腦袋，毫不留情地敲，雖然按理想來說，我們是不贊成對人們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任務艱巨得很！』」

即使就列寧這種自然的情緒言詞來說，應該看得出來，這並不是與列寧的「生活方式」相抵觸的他的天性的突然表露，而應該看得出來，在這裡也是一樣，他是嚴格地堅持自己的世界觀所提出的要求。這個插曲發生前的幾十年，年輕的列寧是正在撰文抨擊民粹派和他們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在對後者進行分析時，列寧指出了關於他們給「一系列既定事實的必然性」提出證明的這一客觀作法，而且指出因此這種客觀作法如何容易有提供他們「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的危險。對於列寧來說，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更加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把握客觀現實和揭露事實本身的真正社會根源方面的一貫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優於純粹客觀主義者的地方，就在於這種一貫性；他「更深刻、更嚴格地運用他的客觀作法」。只有這種過人的客觀性才能夠成為列寧



所謂信奉的源泉——「表明你自己，在對任何事變做任何估計時，直率而公開地把自己置於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主觀的態度因而總是由客觀現實引起而後又回到客觀現實。

如果現實的矛盾達到互相排斥的對立程度就會產生衝突，而每個獻身的人必須為自己解決這種衝突。但是，紮根於現實的信念與感情的衝突——在一種個人的關係中——跟在處處衝突中感到自己作為一個人這一的內在存在是有危機的人之間，是有著一種基本的差別。後者決不是列寧的真實情況。哈姆雷特(Hamlet)在高度稱讚霍拉旭(Horatio)時說：

……能夠把感情和理智調整得那麼適當，  
命運不能把他玩弄於指掌之間，  
那樣的人是有福的。

感情與理智：它們的對立和它們的統一只是從作為人類存在的直接和一般基礎的生物學領域引申出來的。具體地說，二者都在實踐上和理論上表述一個人的社會存在與歷史時刻的和諧或不和諧。感情與理智在列寧身上溶合得很好，因為他隨時都把他的社會知識擺在從社會層面來說對當時是需要的行動方向上，而且因為他的實踐總是必然從迄今積累起來的這一真正見識的總和與體系得出的。

因此，在列寧身上，根本找不出還可能看來是自滿的東西。成功不會使他自負，失敗不會使他灰心。他堅持沒有任何情況人是不能夠作出實踐上的反應的。他是那些——正是在本人的生活實踐中——獲得較多成就，包括最重要成就的偉大人物之一。儘管如此——或者或許因此——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清醒而不帶感傷地談到可能的或實

際的失敗：「聰明人不是不犯錯誤的人，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人。聰明人是不犯基本的錯誤，並且知道如何立刻地、無痛苦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這種關於行動藝術極為樸實的論述，是比任何誇張的信仰表白還更適切地表達了他的基本態度。他的生活是在這樣的世界裡的一種持久的行動、不斷的鬥爭在這種世界裡，他深信對他或他的對手而言，是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的。因此，他一生中的主導旋律就是：始終武裝起來準備行動——準備正確的行動。

列寧嚴肅的純樸性因而對群眾有著強有力的影響。而且與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民衆領袖，沒耍半點花腔（與拉薩爾或托洛茨基相比較）。在私人場合與在公共生活中一樣，他對一切玩弄漂亮詞藻、裝腔作勢和夸夸其談的作法深惡痛絕。值得注意的還有，對於任何「過份的」東西表露出來的人的、政治的厭惡，他賦予一種客觀的哲學根據：「……任何真理，……如果加以誇大，把它運用到實際所能應用的範圍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必然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

這就意味著，對列寧來說，即使最普通的哲學範疇，也從來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為理論上準備實踐的工具，它們總是適合實踐的。在關於工會的論戰中，他反對布哈林依仗整體範疇的這一兩面的、調和的折衷主義。正是列寧特別的特色，才有可能用這種方式來應用一種哲學範疇：「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有啓發意義的是，在這裡考察支配著抽象哲學範疇應用的這一認識論條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學範疇，如何直接作為修正實踐的無上命令。

列寧的這種態度，可能在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論戰中表達得更為清楚。列寧在他的**現實政治**方面是正確的。他反對站在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堅決主張以革命戰爭支援即將到來的德國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能不能存在來打賭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現在這句話是歷史上的平凡話。但是列寧的正確實踐在這裡正是仰賴理論上深入分析整個革命發展的特殊性。他說：「如果我們不打算忽視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是漫長而艱巨的道路」，世界革命優於任何個別事件就是一個真正的（因而是實踐的）真理。但是，他補充說，就那種具體情況在理論上的特殊性而言，「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來應用於**每一種具體情況**，都會變成空談。」因此，真理和作為實踐基礎的革命詞句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從當時必要和可能的革命鬥爭的確切狀態推衍出來的，後者則不是。如果關於形勢的理論本質（它的特殊性）不允許真正的革命實踐，那麼，最崇高的感情，最無私的奉獻，都只會變成無謂的詞句。這樣一種實踐並不一定必須成功。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列寧激烈地反對普列漢諾夫關於莫斯科武裝起義失敗的意見：「我們本不應該拿起武器的」。列寧的根據是，這種失敗自身推動著整個革命過程。抽象與具體、普遍與現實的任何類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談；比如，在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論戰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國總是被拿來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國相比較。同樣地，當德國共產主義者在一九二〇年的凱普政變之後，擬定了一些極富才智的、自我批評的論點，作為這樣一種政變萬一再次發生時的指導路線時，據說列寧曾問過他們：你們怎麼知道德國反動力量會完全重複這樣一種突然的襲擊呢？

這種答覆的背後還有列寧生活中不斷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戰

爭爆發，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險之後，他去了瑞士。一到那裡，他就決定他的首要任務是充分地利用這個「假期」，研究黑格爾的《邏輯學》(Logic)。同樣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之後，當他非法匿居在一個工人的家裡時，他注意到這個工人如何稱讚午餐前的麵包：「所以現在『他們』不敢給我們壞麵包。」列寧因為這種「對七月的日子所進行的階級評價」感到驚奇和高興。他想到自己對這次事件和它們所提任務所做的綜合分析。「至於說到麵包，我沒有了解需求，沒有去思考它……。精神探討每個事物的基礎，為爭取麵包的階級鬥爭，通過極為複雜而曲折的道路進行政治分析。」列寧畢生都在學習，不論是從黑格爾的《邏輯學》，或是從一個工人關於麵包的意見中。

不斷的自我教育，始終接受新的經驗教訓，是列寧生活中實踐絕對占第一性的一個基本面向。這一點——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經驗主義者或強權政治家之間產生了無法溝通的鴻溝。因為他不僅僅是從爭論與教育的角度來表述他對作為政治基礎和尺度的這一總體範疇的主張。他對自己的要求比他對他最彌足珍貴的伙伴的要求還要嚴厲。普遍性、總體和具體的獨特性是應該的而且必須採取行動的現實的關鍵性質；了解這些性質的程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實踐真正效用的標準。

當然，歷史可能產生與原先認識的理論相矛盾的情況。甚至也可能出現無法按照正確的或被認為是正確的原則行事的情況。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列寧正確地預見到，由於俄國的經濟落後，一種過渡的形式，像後來成為新經濟政策的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國內戰爭和外國干涉迫使蘇維埃實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列寧向這種事實的必要性讓步——但沒有放棄他的理論信念。他盡可能有效地執

行形勢所要求的所有戰時共產主義的命令，甚至沒有——不像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那樣——片刻把戰時共產主義看成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而且一旦國內戰爭和外國干涉結束，就果斷地決定回復到理論上正確的新經濟政策路線。在這兩種情況下他既不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是一個實踐的理論家，一個理論的實踐者。

正如《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是他整個寫作活動的一個象徵標題一樣，這部著作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整個世界觀的一個初步論點。他證實，自發性的罷工的階級鬥爭，即使是適當地組織起來的，也只能在無產階級當中產生階級意識的胚芽。工人還沒有「認識到他們的利益與當前整個政治和社會統治的不可調和的對立」。還有，正是這種總體才給以革命實踐為方向的階級意識正確地指出道路。沒有走向總體的這一方向，就沒有歷史上真正的實踐。但是關於總體的知識從來都不是自發的，它總是必須「從外面」——也就是從理論上——引入活動中。

因此，實踐占主導地位，只有站在目標是放在全面把握的這一理論基礎上，才能夠實現。不過，正如列寧知之甚詳的一樣，存在的總體當它以客觀的方式展開來的時候，是無限的，因而永遠都不可能加以適當地把握。在知識的無限性以及總是呈現出來的正確的、直接行動的命令之間，像是有一個惡性的循環在發展著。但是，這種抽象的理論上無法解決的難題能夠——就像棘手的問題一樣——從實踐上解開。唯一合用的利刃，就是人的態度，對這種態度我們必須再次提到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準備就緒就是一切。」列寧最富有特性和創造性的性格之一，就是他從理論上不斷地向現實學習，同

時仍然不斷地爲行動進行準備。這決定了他的理論作風最引人注目而又明顯自相矛盾的一種屬性：他從不把從現實中取得的教訓看作是封閉的，不過他已經從現實中學到的東西，在他的頭腦中又是如此有條理的和方向明確的，因此在任何時刻都能夠付諸行動。

在這樣無以數計的時刻當中，有一次我十分幸運地親眼見到了列寧。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捷克委員會開會的一次會議上。會上問題極爲複雜，各種意見難以調和。突然，列寧進來了。大家都問他對捷克問題的意見。他拒絕回答。他說他原打算專心注意那份資料，不過國務如此繁忙使他無法這樣做，因此他只把隨身帶著塞在外衣口袋裏的兩份報紙匆匆瀏覽了一遍，就沒多看了。幾經懇求之下，他才同意至少就他對這些報紙的印象交換一下看法。列寧從口袋裏拿出報紙，開始作一種非常沒有系統的、臨時準備的分析，從主要文章開始談起，最後以當日的新聞收尾。這種即興而作的概述變成了對捷克形勢和捷克共產黨的任務最深刻的分析。

顯然，作爲一個敏捷而始終如一的人物，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關係上列寧總是優先選擇實踐。在革命第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結尾，他的作法使人們印象極深。這本書寫於七月事變之後的隱匿時期，他怎麼也寫不完論述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經驗的最後一章；革命的發展不允許他這樣做。在該書初版後記中他寫道：「做出『革命的經驗』總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他這樣說是發自內心的。我們知道，他總是盡力彌補自己錯過的這個機會。然而不是他本人而是事變的進程，才使這件事成爲不可能的。

人們對待上個世紀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聖哲」斯多噶-伊壁

鳩魯(Stoic-Epicurean)的思想對我們的倫理、政治和社會見解有過強烈的影響，大大超出了學院派哲學的界限。但是這種影響同樣是一種內在的改造：在這個典型中的能動-實踐的因素已變得比在古代還更強而有力。列寧不斷的準備就緒是這種發展最後和迄今最高、最重要的階段。今天，當操縱同化實踐，「意識形態的完結」同化理論的時候，這種理想在某些「專家」的眼裡聲譽不高的這一事實跟世界歷史的進程相較量，只不過是個插曲。除了列寧的活動與著作的重要意義外，列寧這號人物作為不斷地準備就緒的這個化身，展現出了不可磨滅的價值——一種對待現實的模範態度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

布達佩斯(Budapest)





附錄：

## 列寧的性格\*

您同列寧有過個人接觸嗎？

我同列寧的唯一一次接觸是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我作為匈牙利黨的代表向他作了介紹。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當時，對共產國際內部發生的宗派主義傾向正在進行猛烈的鬥爭。我是一個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成員，列寧對我不會有好的評價，因為他一般對宗派主義份子都沒有好的評價。我根本不想把自己同當時偉大的義大利黨內宗派主義的代表波第加(Amadeo Bordiga)相比。當然，列寧不會如此重視不合法的匈牙利黨內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員。

有這樣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在維也納一家雜誌《共產主義》上，表示反對共產黨人參加議會。列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說我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非常激進的、甚至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件事對我很有啓發，因為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差不

---

\*匈牙利著名電影導演科瓦奇(András Kovács)在盧卡奇逝世前幾個月對他進行了一次電視採訪。這次電視採訪的部份內容在盧卡奇尚在世時放映過，並在他逝世幾天後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人民自由報》(Népszabadság)上發表出來。本文是其中涉及他和列寧關係的一個片斷。

多與這篇文章同時發表。他在這部著作中，詳細論述了議會制度問題。他指出，議會制度在世界史上已經是一個過時的發展階段，但這並不是說，議會制度在策略上就可以不必加以重視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我是如何認識列寧的。有一次，在會議休息時，有人把我介紹給列寧，於是我們就寒暄了幾句。應該知道，出席代表大會的有好幾百人，但列寧只對二三十人感興趣。所以可以想見，對一個普通的大會代表，列寧只能作禮貌性的寒暄。這就是我同列寧個人接觸的情況。

不過，作為一名代表，我有機會觀察列寧。在這方面，我也許可以講一個頗有教益的小故事。當時，主席團並非像現在這樣不可一世，他們不講究禮節，也沒有主席團委員們端坐的大講台，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會議室，有一個講台，其形狀與大學或中學裏授課的講台類似。台上有一條長板凳，還有一張桌子，周圍坐著四五個主持會議的人。有一次，列寧走進會場，幾位主席團委員想站起來，給他在桌子邊騰個地方。列寧做了一個手勢，請他們原位坐下，自己則坐在講台的台階上，掏出筆記本，開始記錄發言人的說話內容。一直到散會以前，他始終坐在那個台階上。我想，這是列寧性格的典型表現。

您第一次真正聽到列寧的名字是在什麼時候？

很晚。要知道，在專政<sup>①</sup>以前，我沒有參加過工人運動，我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參加了共產黨，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政黨。

您是否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不，不，不，……在共產黨成立四個禮拜之後，我參加了這個組織。雖然當時我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廣義地說，我很熟悉德國、

法國和英國的理論家。我讀過考茨基和梅林的作品，但我主要研究索列爾(Georges Sorel)，因為薩博(Ervin Szabo)引起了我對他的重視。我們對俄國工人運動一無所知，至多只知道普列漢諾夫的某些著作。我在報紙上看到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起的作用時，列寧的名字才多少引起我的重視。在流亡維也納期間，我才懂得了列寧的真正意義。

作為一位列寧的同時代人，列寧身上什麼東西對您的影響最深？

我開始知道一位完全新型的革命者。在權力轉移時，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很多人自然從右邊轉向左邊，但是他們仍然帶著右翼的一切特點，過去他們就是依靠這些特點使自己適應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我不喜歡這種類型的革命者。我喜歡而且在思想上接近某種苦行僧式的革命者，這類革命者首先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出現在雅克賓派羅伯斯庇爾周圍。對這類革命者描寫得最精確的是在慕尼黑被處死的麥克思·列維納(Max Levine)，他說：「我們共產黨人隨時準備犧牲」。匈牙利有不少這類著名的革命者。我不想在這裏開一張清單，但我想提一下苦行僧式革命者科爾文(Otto Korvin)的名字。與這兩類革命者不同，列寧體現了某些全新的東西。他把自己完全貢獻給了革命事業。甚至可以這樣說，他是為革命而生的。不過，他決不是一個苦行僧。他適合於充滿各種矛盾的生活，甚至可以說，他喜歡這種生活。他的行為在客觀上似乎是一個苦行僧，但在他身上却毫無苦行主義的痕迹。當我把關於列寧個性的形象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時候，我就發現，他是一位社會主義革命偉人的典型。

自馬克思以後，是列寧第一次嚴肅地提出了主觀因素在革命中的意義問題。他對革命形勢所下的定義是衆所周知的，這就是統治階級再也不能用老的觀念來進行統治，而被壓迫階級再也不願按老的方式

生活下去。他的某些繼承人在接受這個觀念時，作了「稍微」不同的解釋。他們說，所謂「不願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就是指經濟發展會自動地使人民變成革命者。列寧知道，「不願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的問題，具有很強烈的辯證含意，是一種多作用的社會傾向。

請允許我用一個十分重要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在有關十月革命問題展開爭論時，季諾維也夫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沒有出現真正的革命形勢，因為在被壓迫群眾中，存在著十分強烈的反革命傾向，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俄國最反動的「黑幫」的控制。列寧尖銳地反對季諾維也夫的估計。列寧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如果出現了嚴重社會危機，這就是說，人民再也不願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這種想法可能、甚至一定會用革命的或反動的方式表現出來。這裏，主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很大作用，黨的任務就是要明確地對主觀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提供的可能性施加影響。

列寧更喜歡一種激進的觀點和一個關於社會形勢的極其現實的定義。當然，列寧並沒有接受任何無政府主義觀點，說什麼革命的先決條件是人們從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合作過渡。列寧常常說：社會主義革命應該由資本主義提供的、很多方面受到了資本主義損害的人來實現。這就是說，列寧是現實主義的，他把社會必要性和各不相同的人的行動協調起來。從這種現實主義的協調關係出發，他設法用這樣一種方法來決定迫切的革命任務，即必須對具體形勢進行具體分析。在這種具體分析中，也包括對人的分析。

這種辯證法是否也適用於個人？

列寧認為布哈林的性格是最有吸引力的，他強調指出，他應該在黨內受到大家的愛戴。但在所謂的列寧遺囑中，他也指出，布哈林從

來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也清楚地看到，在內戰情況下，所有的活動不可能都是合理的和公正的。有一次，列寧以其特有的堅定性，對抱怨這一情況的高爾基說，他應該想像一下小酒館裏的打架。從打架的雙方來說，誰能說，哪一下打擊是必要的，哪一下打擊是不必要的呢？他接著指出，重要的是，組織反擊反革命的領導人（捷爾任斯基 Felix E. Dzerzhinsky）必須具有鑒別事實的能力和辦事公正。這就是說，總體總是要通過複雜的、多方面的辯證關係表現出來，不管它是重要的政治決策，還是對處在成敗關頭的個人的評價。

盧卡奇引用列寧和高爾基之間的關係當作另外一個例子，他說：「列寧高度評價高爾基的才能，但是從他的書信中可以看出，當高爾基犯錯誤時，他對高爾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列寧認為，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毫無優點的人。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十分明確地指出，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列寧說，聰明的人是那些不犯大錯誤和犯了錯誤又能立即改正的人。這也充分證明，列寧在個人身上看到了很多活的辯證法。列寧要求人們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這在他與他認為是重要人物的交往中，無論在個人問題上還是在政治問題上都有所反映。」

---

❶ 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 譯名索引

## B

|                       |                       |
|-----------------------|-----------------------|
| Bauer, Otto           | 鮑威爾 83,88 n           |
| Bebel, August         | 倍倍爾 33,40 n           |
| Beethoven, Ludwig van | 貝多芬 112               |
| <i>Appassionata</i>   | 《熱情奏鳴曲》 112           |
| Bernstein, Eduard     | 伯恩施坦 7,28,41,77-78,87 |
| Blanqui, Auguste      | 布朗癸 43                |
| Blanquism             | 布朗癸主義 28,42           |
| Bordiga, Amadeo       | 波第加 121               |
| Büchner, Georg        | 畢希納 111               |
| Bukharin, Nikolai I.  | 布哈林 9,114,124-125     |

## C

|                           |                    |
|---------------------------|--------------------|
| Cheravanin, Menshevik     | 徹拉瓦寧 72            |
| Chernyshevsky, Nikolai G. | 車爾尼雪夫斯基 10         |
| Clausewitz, Carl von      | 克勞塞維茨 68           |
| Clemenceau Note           | 「克雷孟梭照會」 100,105 n |

## D

- Danton, Georges 丹東 111  
 Dzerzhinsky, Felix E. 捷爾任本基 125

## E

-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 32,77-79

## F

- Feuerch, Ludwig 費爾巴哈 53  
 Fourier, Francois-Charles 傅立葉 89

## G

- Gorky, Maxim 高爾基 111-112,125  
*Gruppe Internationale* 「國際團體」75 n

## H

- Hegel, Georg W.F. 黑格爾 1,4-6,8,18,100,115-116  
*Logic* 《邏輯學》 115-116  
*Phenomemnology of Mind* 《精神現象學》 6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亨 7,57,110  
*Internationale, Die* 《國際》 75 n



J

Jacobin

雅克賓 53

K

Kapp Putsch

凱普政變 99,105 n,115

Kautsky, Karl

考茨基 7,11,28,48,58,60,72,74 n,75 n,

77-78,88 n,123

*Kommunismus*

《共產主義》 2,121

Korsch, Karl

科西 1

Korvin, Ottó 科爾文 123

Kovács, András

科瓦奇 121

Kun, Béla

庫恩 105 n

L

Lassalle, Ferdinand

拉薩爾 33,40 n,111,114

Lassallism

拉薩爾主義 33,40 n

Legien, Karl

勒吉恩 105 n

Lenin, Vladimir I.

列寧 2-19,23,25-29,34-39,42-44,

46-47,50,52-53,54 n,56-59,

62-67,69,74,74 n,75 n,78-79,86,

90-93,95-104,105 n,107-119,

121-125

-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75 n
- 'Left-Wing' Communism, and Infantile Disorder*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3,54 n,121,125
- Our Revolution* 《論我國革命》 11
-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哲學筆記》 1,7-8,10,18
- State and Revolution* 《國家與革命》 118
- What is to be Done?* 《怎麼辦？》 117
- Leninism 列寧主義 3,6-13,15-18,35,42,45,49, 53, 69,97-98,104-105, 109
- Levine, Max 列維納 123
- Liebknecht, Wilhelm 威廉·李卜克內西 33,40 n
-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內西 40 n,75 n
- Lukács, Georg 盧卡奇 1-9,11-19
- Blum Theses* 《布洛姆論綱》 18
- Zur Frage des Parlamentarismus* 〈論議會制問題〉 3
- Georg Lukács Werke* 《盧卡奇全集》 19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歷史與階級意識》 1-6,8,17
- Lenin* 《列寧》 1-9,11,13,17
- Tactics and Ethics* 〈策略和倫理〉 2
- The Young Hegel* 《青年黑格爾》 18

- Luxemberg, Rosa 羅莎·盧森堡 7,41,48-49,56-59,63,69,  
74 n,75 n,110
-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資本的積累》 58,75 n
- Juniusbroschüre* 《雅努斯手冊》 58,75 n
- M**
- Martov, J. A. 馬爾托夫 80
- Marx, Karl 馬克思 6,9,11-12,16-18,25-29,34,42,  
52-53,57,59,62-63,75 n,  
77-79,86,90-91,100,104,111,  
123
- Capital* 《資本論》 6
- Cou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 44,69
- Kritik des Gothaer Pro-* 《哥達綱領批判》 79,91  
*gramms*
-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1-2,4-6,8-10,13-14,16,  
18-19,27-29,34,36,41,53,  
58-59,63,69,90,95-97,99,  
101-104,107-108,110,  
112,125
- Mehring, Franz 梅林 69,75 n,123
- Merleau-Ponty, Maurice 梅洛—龐蒂 1,17
-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辯證法的歷險》 1,17

## N

- Napolen 拿破崙 97  
 Narodniks 民粹派 34,38-39,63,112  
*Népszabadsag* 《人民自由報》121

## O

- Otzovism 召回派 50,54 n

## P

- Palmer, Alexander Mitchell 帕默 75 n  
 Pannekoek, Anton 潘涅庫克 58,75 n  
 Phalanstères 法倫漢諾夫 11,67,70,115  
 Pushkin, Alexander S. 普希金 111

## R

- Robespierre, Maximilien de 羅伯斯庇爾 111,123

## S

- Scheidemann, Philipp 謝德曼 69-70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施韋澤 33,40 n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亞 117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s 「社會化委員會」 87  
 Sorel, Georges 索列爾 123

- 
- |                        |  |
|------------------------|--|
| Spartakus Leage        | 斯巴達卡斯聯盟 75 n   |
| Stalin, Joseph         | 史大林 9-11,15,17-19,107-108<br>《悼列寧》 9<br>《論列寧》 9<br>《論列寧主義基礎》 9 |
| Stalinism              | 史大林主義 12,17-18,108,110   |
| Shkhanov, Nikolai N.   | 蘇漢諾夫 11  |
| Szabó, Ervin           | 薩博 123   |
| T                      |  |
| Talleyrand, Charles M. | 塔列蘭德 82  |
| Tolstoy, Leo           | 托爾斯泰 111   |
| Trotsky, Leon          | 托洛茨基 9,18,111,114  |
| V                      |  |
| Vandervelde, Émile     | 王德威爾德 70   |
| W                      |  |
| Western Marxism        | 西方馬克思主義 1,17   |
| Wilson, James H.       | 威爾遜 75 n   |
| Z                      |  |
| Zinoviev, Gregory      | 季諾維也夫 1,9,124  |